三句不离本杭

西湖文化博览丛书

阮毅成 著



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别来相忆，

堤上花，湖中月，江边柳。

言不离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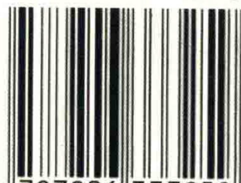
文必及杭州。

往事悠悠乡愁浓，

夜夜梦中游。

西　湖　文　化　博　览　丛　书





ISBN 7-80633-325-8/G · 208

定价：1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句不离本杭 / 阮毅成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9

ISBN 7-80633-325-8

Ⅰ.三… Ⅱ.阮… Ⅲ.杭州市－概况 Ⅳ.K9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166 号

三句不离本杭（西湖文化博览丛书）

著作者 阮毅成
责任编辑 今 扬
美术编辑 赵 辛
责任校对 李青唐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社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286号
邮编 310003
电话 （0571）85066305（编辑部）
（0571）85066612（发行部）
印刷 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2 千
印张 8.25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33-325-8/G·208
定价 18.00 元

西　湖　文　化　博　览　丛　书

《三句不离本杭》杭州版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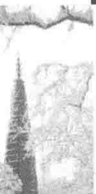
俞剑明

林语堂云:“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那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法。读书须先知味。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

杭州——这座令人自豪的城市,我生于斯,长于斯,热爱之情,难以言表。几十年来,对有关杭州的书,无论是木刻本、石印本、线装本、“洋”装本,我见了总是“胃口”大开,读起来也总是津津有味。1993年由香港未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阮毅成先生《三句不离本“杭”》,少说也读了数十遍。有时读着读着,忽有所感,于是拿起笔来,批、注、评点,横涂竖抹,点朱加墨,好不惬意。此种情趣,或谓之“眉批”。虽然这两字并不能涵盖其全部内容,更无法包容其间的无限情趣。

“书卷多情似古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于谦诗句)。浩浩书海中,确有不少教人清心寡欲、养生怡情的篇章。一书在握,往往爱不释手而烦恼顿消。英国哲学家宾穆尔说:“一间没有书的屋子,正如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与书为友,便有幸居于窗明几净、空气清新的雅室,而不致坠入黄庭坚所谓“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之秽境。

读书是对人生的完善,而身心皆健应是人生的最佳状态。西汉枚乘的名赋《七发》中那位楚太子,“久耽安乐”,以致“百病咸生”。倘若他对物质享受有所节制,抽点时间,找



点空闲，常将书看看，通“天下之精微”，晓“万物之是非”，岂会有“大命乃倾”之厄运？

话得说回来，有些书如一条矫情的小溪，却诱发出读者心中滔滔洪流；有些书本身是一道大江，读者却只能舀出一杯混浊的泥水，这和读者阅读的质量有关。若是自己心浮气躁，过于浅薄，有什么理由抱怨书呢？

《三句不离本杭》，是我建议杭州出版社重辑再版的。陈林木社长和钟高渊副社长说我出了个“金点子”。我说“金点子”断断不敢，“馊点子”则断断不会。读书如望月，月还是那轮月，书还是那本书，只不过人生阅历之异，也就给每个人以不同的感慨。读完此书，但愿读者的感慨是充实的，而不至于留下一份遗憾。

2001年7月24夜于杭州六得斋

为《三句不离本杭》在杭州出版申谢

《三句不离本“杭”》是先父于1949年离开杭州之后，在海内外报章杂志发表的散文、随笔，积稿成册，于1973年9月，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多年来，该书一再增印，是畅销书之一。

说起来，我们阮家这一支，原籍河南陈留，是跟着宋室渡江的“南下干部”。明朝时，先祖辈追随戚继光将军抵御倭寇而落籍浙江余姚临山。先曾祖晋朋公于前清太平天国时代，在战时受知于左宗棠，任江苏阜宁知县，后寄居于兴化。先祖父荀伯公、先父毅成公，都出生在兴化，而均以杭州为毕生志业所在的故乡。

荀伯公于清末留日，习法，返国后，在杭州创办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校，北伐前夕，与汤寿潜、陈英士诸先生密晤于西湖湖心亭，谋驱逐军阀，光复杭州，时蒋介石为之持枪警卫于亭外。北伐完成，荀伯公出任浙江省司法厅长，殁于任所，国民政府以其字，取法院路之一段，命名为性存路，以资纪念。荀伯公葬于石莲亭，余绍宋先生为题碑撰铭，二人同学共事，生死不渝。

毅成公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返国执教。抗战军兴，受命出长浙江省民政厅，在任十年。胜利回杭，先父见西湖白堤被日寇遍植樱花，严令拔去，并改种桃柳相间的行道树，大部分迄今犹存。我近年常常到白堤散步，感怀先人遗泽，真真体会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古话的

真谛。

先父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平生出版的各类著述，有83种，数百万言，而最受他喜爱和重视的，就是这本《三句不离本“杭”》。他于1988年7月28日凌晨猝逝，我为他整理遗物，书桌上还摊着《三句不离本“杭”》增补版的手稿。因为此书初版于1973年，其间15年，他又陆续撰写了不少关于杭州的文字，所以与书局约定再出增补版，而未能竟愿。

我于1992年返乡祭祖，应杭州市政府之请，配合“通过一个项目，改善一片环境”政策，继承先人建设桑梓遗志，成立杭州大安停车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灵隐停车场暨商业配套设施”项目灵隐商业旅游中心，却因实施道路工程，必须将灵隐小学的围墙拆除，违反了先父当年希望在灵隐设立小学、教育农家子弟的初衷，十分内疚。

新版《三句不离本杭》书中的杭州，是先父生前梦牵魂萦的杭州。如今物换星移，人事全非，捧读此书，或许能使今人感悟：昨日之杭州原来是这样的！如是，则杭州的将来，必不是三句就可以说完的了。

先父遗作出版，遗愿得践，儿辈不敢着墨，只有衷心感谢。谨为识。

阮大方谨诚

2001年6月15日



作者画像(1946 年)

造像:王小摩

山水:余绍宋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自 序

1950年新春，我在香港。朋友们每逢星期日，在中安台有诗文之会。其时大陆离别不久，乡思甚切。我每次均以杭州的风景与故事，作为吟咏的题材，于是熊天翼（式辉）先生乃谓我三句不离本“杭”。我甚喜其语，曾以之为题，写一文在老友赵君豪兄主编的“自由谈”发表。

1969年夏秋之交，我到台北木栅沟子口天主堂，访候方豪神父。浙江省有两位方豪，一位是金华人，字俶新，身材高大。“五四”运动时期，他正在北京大学求学，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到杭州来讲演。我其时尚在杭州大方伯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读二年级，到平海路浙江省教育会大礼堂听讲。于是杭州学生联合会成立了，我当选为本校的代表，在学生联合会任干事。其时同在会中任职而现在在台湾的，尚有毛彦文女士与罗霞天兄。

抗战时期，我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方豪任省立金华中学校长。他约我到校中讲授公民，我答应了。我因之得有机会，任中学教员。抗战胜利之后，我又担任过杭州私立新群高级中学的董事长兼校长，这是我一生中两次为中等教育服务的记录。可惜的是战时空袭频繁，金华中学疏散到缙云的壶镇，省政府也迁移到永康的方岩。两地相距，虽只有数十华里，而我公务太忙，就未能继续担任教课。但我每次到壶镇去，必应方校长之约，到校中作专题讲演。方在抗战胜利以后，当选为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在



杭州的时候居多，我们仍时常见面。

而这位方豪神父，字杰人，却是诸暨人，在杭州西湖葛岭山下出生。他在抗战初期，也在金华，而我们并未能多见面。他身材不高，但富研究，勤写作，真是著作等身。他自己选定的六十生日文集，厚厚的三大册，皆是在学术上极有贡献的文章。

我每到木栅沟子口，常去访候方神父。我不是天主教的教友，我们不谈宗教，我们所谈的，多为近代的史料，或是有关浙江与杭州的掌故。这一次，方神父谈到，大家离乡日久，乡愁日浓，何不约几位杭州同乡，聚在一起，一同来三句不离本“杭”。我当即表示赞同。于是，我便先后征求了祝芾南（绍周）、蒋慰堂（复聪）、陈定山、金越光、蒋彦士、潘敦义、吴颖士（智）、盛礼约诸位先生，作不定期的聚会。在这几位之中，蒋慰堂先生是海宁硖石人，不过他是在清宣统二年，到杭州读小学，陈定山先生原籍是安徽徽州，他家自明朝的玉泉公迁杭，到他已经是第十五世。金越光先生原籍是於潜，却已在杭州多年。盛礼约先生的原籍是浦江，我的原籍是余姚，而都是在杭州读书的。其中真正杭州人，实在只有祝、蒋、潘、吴四位。祝世居在杭州清波门头铁崖路，蒋世居在积善坊巷，潘世居在丰乐桥与炭桥之间，吴世居在南班巷。

我们每次聚谈，并无预定的题材，也无发言的次序，真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祝先生年龄最长，杭州的乡音最浓。他曾经出了一个题目，说是杭州话语对于名词，总要加一“儿”字，譬如说帽儿、扇儿、鞋儿、袜儿、帕儿、针儿、线儿皆是。但却另有十几件东西，将儿字放在当中，大家能否列举出来？

大家经过了一番搜索，居然想出来14种。其中以吴、盛两位先生所提供的为最多：

筒儿骨。筒儿面。枣儿瓜。椿儿肉。件儿肉。枣儿糕。髦儿戏。

画儿匠。帽儿头。豆儿鬼。瓢儿菜。门儿布。片儿川。扒儿手。

这里要稍加说明的，是筒儿骨与椿儿肉，都是火腿的上腰方。在杭州，到清河坊的方裕和去买火腿，可以只买上腰方，店员就知道是内行人。“椿”字是否如此写，不敢断定。筒儿面就是挂面。髦儿戏，是全部由女子担任演员的戏。画儿匠，是专为死人画遗容的。帽儿头，是指钉在帽子正中的金片或玉块。门儿布，是指做布鞋的鞋面布。豆儿鬼，是指小孩。件儿肉，是大方块肉加盐白煮，论件计值，以大井巷的王润兴所制者，为最有名。王润兴，又名王饭儿，鱼头豆腐与虾仁跑蛋，也皆是该店的名菜。清朝末年，陈英士先生到杭州，策动革命。每在其地，约会同志进餐。楼上悬有沈玄庐（定一）先生所书五言大字联：“肚饥饭碗小，鱼美酒觞宽。”扒儿手，即系小偷。

祝芾南先生是清末仁和小学堂的学生，校址在太庙巷，校长姓袁。该校在民国成立后，改名为杭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蒋慰堂与陈定山两位，是清末钱塘小学堂的同学。校址原来预定在西湖苏堤之旁的金沙港崇文书院，面对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后因该地改设蚕桑学堂，乃在城内周公井，租用民房开学，而将曲院风荷，作为该校在西湖上的校园。每年春秋两季，学生远足，必到园中游览。创校时的校长为汪嵚，字曼锋。辛亥以后，他先任杭州军政分府的民政长，后任杭县知县。学校也改名为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址迁到佑圣观巷正蒙学堂的原址，隔壁就是同善堂，校长改由程佑甫担任。我于1915年入二高的一年级肄业，是他们两位的后期同学。校长已是程培



甫，为原任校长之弟。迨杭州市政府成立后，又改名为市立佑圣观巷小学。抗战胜利以后，我每天从家中到浙江省政府去办公，必经过该校门前，看到背了书包在校门口的小学生，仿佛就是当年的自己。1946年与1947年的校庆，我都以毕业生资格去参加。校长为宣其恭，是我当初同班的校友。吴颖士先生也是九小与二高毕业的，他在校的时间要比我长；在台湾尚有缪超风先生，是1920年在二高毕业，自皆是我的后期同学了。

潘敦义与盛礼约两位，是私立盐务中学的同学，校址在梅登高桥。校长程耿，金华人。杭州另有私立鹾（cuó，盐）务小学，校址在珠宝巷。校长周承德，海宁人，是当时杭州有名的书法家。二弟笃成，就是在该校毕业的。盐中与鹾小，均有浙江盐运使署的经费补助，原意为北京的盐务学校准备人才，日后可以在盐政方面担任工作。结果是毕业生各自按其志愿，自行发展。如先后任职我国驻外大使的邵毓麟、许绍昌、陈嘉尚，就都是在鹾务小学毕业的。

杭州在太平天国起事后，最出名的人物是胡雪岩。胡原名光墉，钱塘人。近年以来，高阳（许晏骈）先生在《经济日报》副刊撰写以胡雪岩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其中夹杂了许多杭州风物与土话，读来颇感兴趣。胡在杭州元宝街，建了一座很大的花园住宅，门前的街巷，两头高，中间低，形似元宝，意谓聚财。胡已属富有，仍复图此吉利地名。胡创办了钱塘江的义渡，对过江的旅客不收费用。又开设了胡庆余堂药店，每月朔望，购药者可享受折扣优待。这两件事，对平民的嘉惠甚多。但胡自己却因经营事业太多，又受了外国商人的打击，竟致及身而败，完全破产。民国初年，祝芾南先生任职浙军，曾以其宅为司令部。抗战期中，日本军队也曾驻扎，胜利以后又驻过军



红顶商人胡雪岩

队。因以房屋花园，均已破败不堪。我朋友中的胡亚光、胡裕禄、胡文祯，都是胡雪岩的后人。陈定山先生近来也正在写一本以胡雪岩的爱妾螺蛳阿太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不久即可完成。据蒋彦士先生说：胡雪岩家的房子，在其失败后，就由蒋家承购。其中楠木大厅的楠木，于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三元坊建筑杭州分行行址时，都拆到行中，作为大办公厅与柜台之用，这是由蒋家卖给该行的。

杭州城系南北长而东西短，向分为上下两城。上城靠南部，下城靠北部。共有十座城门，那就是：

北关坝子正阳门，螺蛳蜒过草桥门。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共太平。

有须说明的，北关门的正式名称是武林门，坝子门是艮山门，正阳门是凤山门，螺蛳门是清泰门，草桥门是望江门。但在沪杭铁路建筑之时，最初杭人因为迷信，不许



火车进城，故车站设在清泰门外。后来在清泰门之旁，另开一门，专驶火车，车过即将其关闭，火车站方得设于现在的城站。盖在甲午战争之后，我国许日本在杭州、苏州开辟商埠。苏州在城外的青阳地，杭州即在城外的拱宸桥。但是这两处的日本商埠，始终没有能够繁荣。据祝、蒋两位先生说，当时沪杭铁路当局，不同意日本人的要求，以拱宸桥为终点站，只答应另建一支线以达拱宸桥。一方面开发城站附近，建设新兴市场。我幼时，曾随先祖母到城站迎轩茶馆楼上饮茶，目的是去看火车。其时城站两旁的新建筑，有城站旅馆与清泰旅馆，有大舞台，有楼外楼游乐场，有聚丰园京菜馆，有二我轩照相馆等。因之，拱宸桥就一直不能繁盛。

杭州城内有两条河，一条溪。一条河是贯穿中国大陆南北的大运河，其南端的终点，在杭州城内菜市桥断河头。菜市桥旁有万安桥，是城内最高的以巨石建筑的桥。一条是市河，则贯穿杭州城的南北，其上共有33座石桥，24座在城内，9座在城外。自北而南，依次为梅登高桥、云青桥、西桥、登云桥、仙林寺桥、盐桥、油局桥、丰乐桥、回回新桥、荐桥、柴垛桥、府桥、铁佛寺桥、三圣桥、新宫桥、望仙桥、通江桥、黑桥、嵇接骨桥、仓桥、六部桥、炭桥、南星桥、梁桥，以上均在城内。城外的为：朱家桥、美政桥、洋泮桥、海月桥、化仙桥、水澄桥、小桥、大车桥、大通江桥。这些桥名是住在香港的徐正旅兄，写给我的。

一条溪，是在新市场内的浣纱溪。自闹市口直到众安桥，沿溪有东西两浣纱路，遍植杨柳。每天清晨，家庭妇女持着衣篮与木杵，沿溪蹲着洗衣。微风吹发，笑语轻盈。两条河均能行舟，而溪则不能。

我们当然也谈到西湖、钱塘江与杭州许多名胜古迹，

说不尽，也写不完。除此之外，我也常凭我的回忆，与随时发现的资料，撰写有关杭州的文字。多年以来，积稿不少。适钮先铭兄新任正中书局总编辑，面约我写一本散文集。即将旧稿整理交之，并仍以三句不离本“杭”为书名。因为我并不是写杭州的志书，或游览指南，故不必一定要将杭州全部写到。又已列入我的其他单行本者，也不再编入，以免重复。

1973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三日）于台北

编者按：《三句不离本“杭”》面世后，阮先生的友人纷纷赋诗词相贺，其中张佛千先生赋词五十首，现分附于各章后，以成珠联璧合之美。

张佛千先生题词首篇：

三句不离本杭，写成十万言。“杭”“行”谐音，书名妙可传。　　话故乡，集群贤。更诗人娓娓，史家侃侃，老将桓桓。

杭州语软，筒儿骨，件儿肉，片儿川。说到欲流涎，他乡无此鲜。　　王饭儿，名菜传。有楼头志士留联：“肚饥饭碗小，鱼美酒觞宽。”

三句不离本“杭”

我生长杭州，常写有关杭州的文字，朋友们便说我三句不离本“杭”，我颇引为荣幸。通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之可以与天堂相比，乃完全得力于西湖。苏东坡曾将西湖比作西子，倪思曾说西湖有类贤者，孙一元曾着高士服隐于湖上，所以西湖又有西子湖贤者湖高士湖之称。

西湖在杭州城西，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西湖与杭州人民生活最主要的关系，是水利。历代曾发生过多次的水患旱灾，端赖西湖为之调节。白居易在开湖记上说：“湖水蓄泄及时，可溉田千顷。”白又说：“每减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顷之多。每一复时，可溉五十多顷，如是堤防蓄泄，都能得法，则濒湖千余顷田，就永不会再有凶年。”苏东坡知杭州，曾列举五项理由，上言浚湖。他说：“西湖深广，则运河取藉于湖水；如其湖水不足，则必取藉于江潮，泥水狼藉，成为居民大患。”其他历代到杭州服官的人，莫不以浚湖为第一要务。浚湖的功用在为杭州兴修水利，直到现在，每年夏季亢旱的时候，杭州市政府照例要开放西湖的水闸，使湖水下注，以解救余杭海宁各县的农田荒旱。除此而外，浚湖还有两个副作用：一、杭州人民，素饮江水，卤恶不堪。自从唐时刺史李泌，在城内凿六井，引湖内灌而后，方才有了好的饮料。二、宋时，杭州酒税达二十余万缗。水泉之用，皆仰给于湖。

西湖在历史上的第二个关系，是含有宗教意味的。其

一是和尚尼姑，都先后来湖上建造寺院。西湖的事迹，在唐以前，除去我们知道灵隐有过谢灵运的亭子而外，其余都无可征。惟有南高峰上的塔，是晋天福间建的；烟霞洞，是晋开运间辟的，都可以证明僧尼到达西湖之早。此后，吴越王时，偏安一隅，财力殷实，于是城郭内外，寺庙增建者以百数。南宋偏安，君臣宴乐，不想复仇，湖上也增建了寺庙不少。南宋时期，常有火灾，但是除去有一次延烧到万松岭而外，都还未牵连到西湖上的建筑。到了元顺帝至正二年壬午，又十二年壬辰，两次大火，于是西湖上多年的建筑，都付之一炬。第二次在九月十一日，红巾入城，大放其火，并南北高峰的塔都烧毁了，这是最可惜的事。当年建筑的不易，自不必说，而于登临远眺，双塔凌霄的种种美景，从此也都得不到了。清朝因为康乾南巡，湖上着实增修一下，到了太平天国之役，又几乎烧个干净。

其二，便是西湖从宋代起，作为放生池。宋真宗天熙四年，杭州郡守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民采捕，目的是为皇帝延寿。于是每年四月八日，杭人空巷而出，都到湖上放生，所放羽毛鳞介，以百万数。南宋宁宗庆元初年，京尹赵思罩，请尽以西湖为放生池。入民国后，最初因为湖中葑草过多，放下鱼秧，使之食草，后来便应了一般佛学家之请，作为放生，不准捞捉。于是大者日大，大又生小，所以近年的西湖湖水，不见得十分澄清，所谓春水碧波，清可见底，只在一部分的湖面上，还可以见到。其余的多数湖面，扁舟放棹，都常使人有出山水浊的感觉。有人常将此归咎于建筑环湖马路行驶汽车，说是："若把西湖比西子，而今西子着西装。"我在1928年6月，曾在杭州民国日报，写了为西湖伸冤短文，加以驳正。

西湖的最后而现在认为最紧要的，才是游览上的关

系。西湖风景之所以会出名，湖上之所以会热闹，全是下列三个时代之赐：

吴越——那时偏安在一隅，保境安民，民康物阜，现在西湖上的寺院，以及雷峰保俶两塔，都是那时所建。

白苏——白居易与苏东坡，先后任杭州太守，浚湖筑堤。又都徜徉于山水之间，吟诗醉酒。湖上的幽胜，搜索殆遍。原来西湖在唐以前，本不甚出名。自从相里君韩仆射辈，建筑五亭，而灵隐天竺的深处，方始为人所知。白居易来了以后，便把所有的山水，搜奇索隐，一一品题。苏东坡更是极力揄扬西湖之美，甚至比做历史上最美的西子。于是一般文学之士，读了他们的诗文，早已心领神往。等到一旦有机会到了西湖，更是叹观止矣。归去更是一传十百，西湖之美，乃为天下所共知。

南宋——在北宋时，西湖上空地很多。宝莲山、吴山、万松岭一带，林木茂盛，无人居住。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没有什么障碍。自从宋室南迁，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绵不断。其时有诗道："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可以想见当年之胜况了。

宋朝的时候，杭州人都被视为轻浮之辈，别地方人讥笑那些浮薄的人，说是"杭州风"。又如西湖，从古便有销金锅之名，又有西湖日销寸金日生寸金之谚语。

西湖现在是一个便于游览的地方，从上海到杭州，路近，不须多少时间便可到了。邻省以及本省的人，因为杭州附近的长途汽车路很多，来去便利。西湖有山有水，而且相靠得很近，不似其他的地方，单有山或是水；或是虽有山有水，而离得很远。西湖的名胜古迹，也比较的集中，可以有一定的路线去玩，而且可以自便的玩山或是玩水，时间精神都很经济。不像他处可玩的地方，散在各处，一天只好玩得一二个地方，而且疲于奔波，时间甚为

消耗得可惜。加以杭州的市场在城内，而且西湖的边上，就有市场。西湖与市场毫无阻隔，湖也好似在城内。不像他处、可玩的地方和市场，隔得太远，不甚便利。

西湖的水，固然可爱；而且西湖的山，更可爱。沿湖的山，或者多竹林，或者有楠木，或者满植茶树，都是碧绿青葱。宋范景文有诗道："湖边多少游观者，半在断桥烟雨间。尽逐东风看歌舞，几人著眼到青山？"因此，游湖的人，一定不要忘记同时游山。

说到西湖，不能不提起西湖船，所谓瓜皮小艇，的确玲珑精致。不要说秦淮河上的大船，运河上的无锡快，比起来显然地有雅俗之分，就是南湖的小舟，尽管以船娘著名，而低篷压背，哪可以与西湖船的明爽清快相比？在西湖泛舟，最要紧的是不可性急。最好是一入湖中，便关照舟子，不必再用力，任其随波所之。好在西湖中没有风浪，即使由他漂，也不会漂出问题来。

20年代之西湖游船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可以说共有三处。用法律名词说：

一、依出生地主义，是江苏省兴化县城内乡水桥谁园。

二、依血统主义，是浙江省余姚县临山卫。

三、依住所地主义，是浙江省杭州市新市场，在西湖之滨，也就是杭州人通称的“旗下”。

所以，从江北到江南，皆有我的故乡。

先说兴化，那是里下河的鱼米之乡。

宋天圣年间，范仲淹曾任兴化知县。修筑堤防，竟通泰海三州，长数百里，民呼曰“范公堤”。范在兴化的遗迹，有他所建的沧浪亭、濯缨亭与文会堂，以及他在文正书院古香堂前所手植的梅花。

宋建炎四年，岳飞任通泰镇抚使，驻师在兴化的旗干荡。金兵攻楚州（今淮安），岳飞往救，三战三捷。

清代的画家禹之鼎，与书家郑板桥，都是兴化人。

禹之鼎工人物，写真多白描，而用吴生兰叶法。两颊用赪颃晕之，娟娟古雅。

郑板桥在山东做过12年知县，无留牍，无冤民。乞休归，囊橐萧然，恃卖书画以自给。他在兴化城南的别业，名曰拥绿园。于浮沤仅开之地，树柳种蔬，栽荷艺菊。草亭翼然于其上，萧疏远致。

兴化系一水乡，势如锅。因而没有山阜，也没有丘陵。只城北有拱极台，倚城而建，上有海光楼，为全邑最高处。清初，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因奉命督修水利，曾在

楼中居住，并留有题诗数首。

再说余姚。我们阮姓，系出河南省的陈留郡。宋高宗南渡时，随同迁至浙江。我的祖先，初迁在浙江省的仙居县。明洪武间，因征调入伍，到余姚县的临山卫，戍守海防。倭寇来侵，我的祖先，乃成为最早的抗日战士。

余姚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在县政府门前，有四方大石碑，上书先贤严子陵、王阳明、黄梨洲、朱舜水先生故里。严的高风亮节，王的知行合一，黄的民族大义，朱的教化日本，皆为我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我余姚精神的所在。

余姚盛产盐及棉花，两者皆为白色。我常说余姚人皆志行高洁，心胸坦白。

余姚地近绍兴。最早，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大结合。其后，晋人王羲之，修禊于山阴之兰亭，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文人大结合。两次地点，均在绍兴。我余姚人士，皆曾躬与其盛。而东山丝竹的谢安，其故里即在余姚第四门，与临山卫只隔三华里。

我平生只到过余姚三次，其中临山卫只到过二次。最长的一次，也只住过几天。有一次，只得半日。但先君与我，均担任过余姚旅杭同乡会会长。我又在台参加余姚光绪县志的影印，并为撰序。主编过在台出版的余姚史料，征集了不少的乡邦文献。

最后，再说杭州。

知道杭州的人太多了。唐人的四句诗，却已说尽了杭州的美丽。

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傍湖。
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柳树一千株。



白居易与苏东坡，先后任杭州太守，浚湖筑堤。又皆徜徉于山水之间，吟诗醉酒。西湖上的幽胜，搜索殆遍。但是白居易守杭州，早于苏东坡270年。所以苏东坡曾有句谓："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杭州春季多雨，但却是万花齐放，柳绿桃红。陆放翁有句谓："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我曾考证出放翁所说的小楼原址，在现在的孩儿巷。但是，此楼早已无存了。

夏季苦热，但却是荷花盛开。乘朝露初起，就雇一瓜皮小艇，到三潭印月或是到里西湖，泊在荷花丛中，可以折新莲蓬，切新藕，并将新鲜的荷叶，戴在头上，以当帽子。最好是在孤山放鹤亭的长椅子上，补睡一个早觉。亭的后面，长眠着梅妻鹤子的林和靖。亭的旁边，长埋着"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的冯小青。再过去，便是写《断鸿零雁记》的苏曼殊的千古佳城。对岸不远，就是"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的苏小小的芳冢，和尽忠报国的岳武穆的祠墓。这一睡，睡在英雄、美人、高士、诗僧之间，却往往至人无梦。

西湖三面环山，夏季，山中特别凉爽。有的是著名的大丛林，更有无数的庵、堂、寺、观。大多是庭院宽广，树木成阴。看和尚们晚课晨钟，焚香扫地，真是清凉世界。

我爱西湖的山，尤过于西湖的水。而南路诸山的可爱，则又过于北路诸山。至于寺庙，在北山的，我喜欢招贤寺。寺中有一座玉佛，慈悲、庄严、圣洁，都到了极点。在南山的，我喜欢龙井寺。那是产茶的区域，采茶儿女，人人皆眉清目秀，识礼知书。

秋季，则是游观最佳的季节，吴山可以登高，满觉陇

可以看桂花，吃栗子。加以菊花盛开，嘉兴的蟹上市，绍兴酒随处可得。一杯在手，持螯对菊，人生尚有何求？至于中秋之夜，则沿湖的近水楼台，皆是得月的佳处。而湖中游艇，或到三潭印月，或到平湖秋月，真是“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花好最宜秋”。

冬季，下雪了！踏雪寻梅，乃一大乐事。孤山、灵峰寺、超山，都以梅花著名。绿萼红心，在琉璃世界中，衬托得更为秀雅。我喜欢在梅树丛中，设一茶桌，泡上一壶好茶，热气沸腾。刚一开盖，则雪瓣与梅瓣，就纷纷跌入，成为天然的香雪茶。

郑板桥是兴化县人，他曾有《沁园春》词：

西湖夜月，有怀扬州旧游

飞镜悬空，万叠秋山，一片晴湖。望远林灯火，乍明还灭；近堤人影，似有如无。马上提壶，沙边奏曲，芳草迷人卧莫扶。非无故，为青春不再，著意萧疏。　　十年梦破江都，奈梦里繁华费扫除。更红楼夜宴，千条绛蜡，采船春泛，四座名姝。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我辈多情有是夫？今宵月，问江南江北，风景何如？

1973年夏日，我自台湾到香港。马汉狱（南宫博）与胡健人两兄约我同进午饭，适值大雨。我曾有句谓：“天教海上留双岛，人别江南已十年。”又谓：“乡思欲化楼前雨，点滴心头共酒添。”现在，人别江南，已经过了二十年了。诚如郑板桥词句所说：“今宵月，问江南江北，风景何如？”

兴化、余姚，与杭州，都是民殷物阜之地，也都是人才辈出之区。我何幸而有此美秀的故乡？又何不幸有乡而不得归？

儿时门巷

我虽是浙江人，却在江苏省兴化县出生。儿时随依先祖母的膝下，常到杭州。直至11岁，始由兴化到杭州入小学读书，此后便在杭州时多，回兴化去的时候甚少了。

就我幼时从先祖母口中所听到的，以及自己解事以后所能记到的，我在11岁以前，曾两次到过杭州。第一次我方4岁，时为清宣统元年。先父住在横河桥小粉墙。第二次我8岁，时为1913年，住在酱园弄。这两处都是杭州的中心区域。抗战胜利以后，我曾去访问过儿时门巷。小粉墙的房屋，已经不可复识。酱园弄的，则设了一家手工织布厂。我家从酱园弄又曾迁居到三圣巷，那是比较的偏在下城。这三处的房屋都是租的，不一定完全适用。杭州自入民国以后，主要的街道都改修了马路。小粉墙在东街路上，老屋也许因为修路拆让的关系，改变了外形。三圣巷则在盐桥大街以北，如何走法最为便捷，我已记不清楚。酱园弄则在马市街与田家园之间，离开由直大方伯改建成功的新民路，有一些距离，所以房屋未因修路而受到影响。

小粉墙与三圣巷的房屋，都是旧式的平房。一进又一进的分成几个厅，最后才是住屋。酱园弄的房屋，在当时是列为新式的，有楼。楼上，有走廊和栏杆，有天花板，并有灰幔。窗子上面有百页窗，可以启闭。酱园弄的房东，是当时杭州的一个新式木匠包头，名叫金阿钦，绍兴人。杭州之有新式洋房的建筑，始于英国人梅藤更医生。他凭着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在杭州市中心大方伯，开设广

济医院，这是杭州有新式医院之始。广济医院逐渐扩充，后来西至马市街，东至直大方伯，南至方谷园，梅藤更买进了这个区域内的许多民房，拆除之后，改建洋房，并且开了许多太平门，以便出入。又在直大方伯建筑了一所礼堂，名为协和讲堂，作为传教之用。杭州最早演电影，便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在协和讲堂放映的。因为广济医院的关系，其附近也多了许多西式的建筑。如马市街内的盐务稽核所，民国成立后改的外交特派员公署，胜利后成为民生中学。以及张葆庆医院等都是。至于中国政府的新建筑，则先后有谘议局，地址在茅廊巷与高乔巷之间。有高等学堂，地址在蒲场巷。也都在城中心区，距广济医院不远。这两所建筑，都相当恢宏。尤其谘议局的屋顶，采用各国国会常用的圆顶，开杭州未有的新例。谘议局入民国后，改为省议会。北伐后，为国民党省党部。抗战胜利后，为省参议会。1921年左右，浙人在此制定省宪，成为与军阀斗智的中心。对于浙江数十年来政局最有关系的，当首推这个圆顶的民主会场。高等学堂的校舍，入民国后，曾一度为省长公署，后来便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其时还有一所新式的大建筑，便是就贡院地基地，改建的浙江省优级师范学堂。这所校舍也非常广大，并且附有礼堂，晴雨操场及附属小学等。最前面一排房屋，便是昔日的明远楼。贡院地处下城，距市中心稍远。学校两旁，均隔有小河，东面小河的对岸为梅登高桥，又称大营盘，系军队驻防的区域。1923年春，一师发生晚饭集体中毒案，此案迄今40年，仍为疑狱。

毒案发生的时候，驻扎在大营盘的，是浙江省陆军第一师。因此，河的两岸，都简称一师。因以有人说，当时放毒者的目的，或系在于军队的“一师”，而执行的人，误放到学校的“一师”饭锅中去。尤其两个“一师”的厨



房，只隔一小河，平时淘米洗菜，都在同一条河中。双方的厨役伙夫，也甚为熟悉。临时换错了米箩，也不是没有可能。其时，浙江省的每年全省运动会，都在梅登高桥大营盘举行，“一师”学生因为近水楼台，平时就在大营盘练习。因以每次运动会的许多锦标，都为“一师”学生所得。我于1921年下半年及1922年全年，曾在“一师”旁听过一年半。每天早上，要走三四里路，穿越许多大街小巷，才能到达校中。无论晴雨寒暖，我都要踏着高低不平的石板路，经过无数的大小门墙。

我11岁再到杭州，家中已迁住在青年里。青年里在所谓“旗下”，是民国以后，将旗营拆除了所开辟的新市场。1912年，浙江光复，褚辅成氏担任民政长，他便决心拆除旗城，将原有清驻防营，开辟为杭州的新市区。旗营的位置，正当西湖的东面，因此杭州人平时看不到西湖，要游西湖，必须绕道出涌金门。旗城拆除以后，西湖便和整个的杭州复合，任何人都可站在湖滨，赏玩湖景。褚先生的远见与廉洁，是值得佩服的。他拆除了旗城之后，便在菩提寺路，建造了200间的平房，供原有的旗人居住，不要任何费用，连房屋都奉送。一面将原有的旗城，定了一个都市计划，开辟马路，在沿湖建筑了6个公园，由北而南，每一个的布置，都不相同。又将所有基地，重行划分编号，公开标卖。所得之款，作为建设道路及疏浚西湖之用。他所规划的道路都采取田字形，四条大的干道，曰迎紫路（即现今解放路。编者注）、曰延龄路、曰平海路、曰湖滨路，都甚为广阔。这在50余年以前，实在是难有的大计。湖滨路建筑完成的时候，发觉测量有了错误，路旁的新业主吃了亏。乃立即准许建筑骑楼，作为补偿。所以杭州只有湖滨路的房屋有骑楼，固然是便于看湖，但在当时却是政府勇于补过的所赐。旗营土地编号标卖的时候，

最初没有人买，一则杭州的世家，都自己有房屋可住，也没有一定要住到湖滨来的必要。二则杭州不是一个工商业的都市，人口增加甚缓。但是褚先生自己，却并没有买一寸土地。他只是多方鼓励朋友们买地，并设法欢迎旅沪同乡到杭州来投资。先父买的一块地，在官巷口，是迎紫路的头上，他买地的时候，已经在1914年，尚是第十号。其时基督教青年会已经买了一大块地，准备建筑会所。先父特别选择在青年会的后面，隐有择邻之意。并因之将自己的里名，取名为青年里。军阀时期，工务局忽将里名改为惠兴西三弄，先父颇不以为然。盖里并不在惠兴路上，一弄二弄又不相连接，称为三弄，亦无根据。但当时军阀气焰甚盛，无法与争。直至北伐以后，始由杭州市政府，仍为恢复青年里原名。

我初入小学，是入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地址在佑圣观巷。从我家青年里步行到荐桥直街，过了新水漾桥，有平行的许多小巷，都可以通达学校门口。一同步行的同学们，便常常变换路线，以免走得次数太多了，觉得单调。后来，荐桥直街也修筑了马路，我们穿越小巷的必要，就减少了，总是由柴木巷进出的时候多。那时候杭州常有改变，街巷中每由住户自己集资装设木栅，一遇到风声不好，便将栅门关闭，彼此不能通行。我在二高的有一段时期，正值袁世凯称帝，浙江反对帝制，宣布独立，由吕公望担任督军兼省长，他家就住在柴木巷樊家大屋内。我们每天经过，常看见他轻车简从，在巷中出进。袁氏逝世以后，浙江取消独立，吕氏因当时的省会警察局长夏超，心有异志，便将夏氏免职。夏表面上接受，暗中却唆使杭州全城的警察罢岗，因以人心惶恐。不久，吕只好撤回了免夏的命令。夏乃向北洋军阀政府投靠，并勾结浙江军人周凤歧，逼吕氏辞职。那几天，杭州的秩序极为不



安，许多街巷中的木栅，都关闭了。我们每天上学，要多绕许多路。有一天，夏、周派兵将吕宅围住，柴木巷也不能通过。我们在学校中放了学，无法回家，有些胆小的同学便哭了起来。幸而僵持到晚上，吕氏表示让步，将督军兼省长的职务，全部交出，夏、周方才撤兵，我们才能回家。吕氏让步的结果，夏、周毫无所得，盖北洋政府却另派了两个北方人，带了两师兵入浙，分任军民两政，这是北洋军阀的力量入浙之始。从此，我们每天上课，就可以在街上看见“北佬儿”站岗，大家都远远地避着他们走。

我幼时在杭州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几位亲长的家中，有的在旗下，有的在中城。那时候，杭州人力车还不多，有些人出外要坐轿子，我们小孩子则照例走路。我记得我最喜欢走的，有两段路：一是东西两浣纱路，从青年里到新建的浙江省教育会，一定要走浣纱路。省教育会一度是浙江青年人活动的中心地点，常有演讲会与话剧上演。那时候地方人士因不赞成基督教青年会对于教友与非教友同样收费而权利各异的作风，曾另行组织浙江青年团，团址便设在省教育会。中国之有青年团，这应该是最早的一次。东西浣纱路，夹河并行，沿河种有杨柳。春深的时候，柳枝会在水面上拂荡。无论是花晨，是月夕，都最宜于散步。清早，则有许多的少女幼妇，跪在河岸上洗衣服。微风吹乱了她们的秀发，水沫溅湿了她们的面庞。当她们立起身来，一手挽着竹篮，篮中散堆着刚洗过的衣服；一手持着木杵，也为河水洗涤得一尘不染。三三两两，结着伴，沿着河，轻轻地谈着家常，缓缓地各自回去。在那一种悠闲的情趣之下，我常想将字典中的忙字删去。

东浣纱路过了迎紫路之后，因为为杭县县政府所阻，中间有一段不能连接。我儿时走过，总觉得这是一件美中

不足之事。抗战胜利之后，回去一看，杭县县政府的老屋，被敌伪拆成了平地。我便和杭州市政府商量，利用空地，将东浣纱路的中间一段接通，了却了我多年来的心愿。除浣纱路外，那时候，我们最爱走的是从兴武路（后改名开元路）弯过柳营路而到湖滨路。兴武路本来是利用旗城的城基建筑的，不知道为什么在马路中却有几株大树。这几株树的树下，是我们儿时在夏夜最可以纳凉的地方，后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伐去了。柳营路在那时没有人家，却有极好的道路。转过湖滨，就可到公共体育场，那也是杭州的新建筑，北伐以后的各种纪念集会及民众大会，都是在这个场地上举行。场中还有一所民众教育馆，也是新的房屋，经常有各种展览会及音乐会，也是我们平时常到的地方。那时候，澄庐和大华饭店等都没有建筑，过了涌金桥，还有杭州旧城的城墙，一直到清波门，都异常荒凉。所以我们散步便只到涌金桥为止。其时杭州尚无汽车，曾一度出现过马车，也只一二辆。而道路宽广，树木成阴，人人在道中任意来去，安步当车，充分地表现出潇洒出尘的情趣。

我除去在杭州读过三年小学三年中学之外，以后在杭州的机会，就并不多。抗战胜利以后，只又在杭州住了三年。一个人的儿时钓游之地，印象最深，怀念最切。我于杭州，自难例外。每一念及，诚为之魂牵梦萦不已。

杭州全图

多年以来，我想找一份杭州市地图，总是未能寻得。台湾有许多图书馆，皆偏重于藏书，而忽略于藏图。但既名曰图书馆，则应该是图与书并重的。我国向有左图右史之说，可见两者系同等重要。抗战时期，浙江行政学会设立图书馆，即多方搜集地图，专室庋藏，随时展览。而现在，我手边没有杭州市的地图可以查阅了。

1972年4月，有一位曾在我所创办的新群高中肄业的学生，在台北市牯岭街的旧书摊上，找到了一张杭州全图，系套色印刷，就买了来送给我。真使我有如回故乡与如见故人的快乐，十分高兴。此图当系“七七”抗战后不久所印，因图上已有钱江大桥，而大桥乃系1937年9月筑成通车。同时，亦尚有博览会桥与杭县县政府，而此两处，却已在日寇占领时期拆毁。

杭州市与杭州城，皆系南北长而东西窄。现有的杭州城，系元代至正十六年，由张士诚所建，周长为15·8公里，也就是30华里。从这张杭州全图上，可以看出除自武林门经钱塘门、涌金门到清波门的城墙，业已拆除外，其余的城墙，均尚存在。

杭州市分为八个区，第一区俗称为上城，第二区为新市场，第三区俗称下城，此三个区均在城内。第四区为西湖，第五区为江干，第六区为艮山门外，第七区为笕桥，第八区为拱宸桥，均在城外。

杭州为我国大运河的终点，运河经拱宸桥北入城，止于菜市桥之断河头。杭州城内另有城河，自涌金闸引西湖

水入城。自南而北，上有无数的桥梁。虽则也到了江干，却因与钱塘江的水位，相差一公尺至六公尺，两者无法通航。城外则有护城河，先是自西而东，从武林门到艮山门。再自北而南，从艮山门经庆春门与清泰门，而到凤山门。在新市场则有浣纱溪，也是自北而南，由武林门经新市场而到涌金门。其余的小河流甚多，真是港汊纷歧，宛如蛛网。

杭州城内的街道，主要为南北向的两条大街，一条是从清河坊经过太平坊、保佑坊、三元坊、寿安坊、弼教坊，一直到武林门与艮山门之间的大道。一条是从望江门旁，一直到东街，经过招宝堂、批验所前、天汉州桥，直达艮山门的大道。前者全部是商业区，两旁皆为店铺，包括四拐角与羊坝头在内。后者则为住宅区与文化区，包括若干学校与天主堂在内。另有一条半在城内半在城外的大街，也是南北向的，就是从钱塘门到武林门的西大街，以及出了武林门之后，经过湖墅卖鱼桥，直达拱宸桥的大道。至于东西向的道路皆较短，最北的是从武林门到艮山门之间的环城路，路在城内，较为荒僻。次北的是性存路、法院路到众安桥。这在南宋定都的时候，是刑部的所在。岳飞父子就义的风波亭，就在路的西端。此路如能再向东打通，就可直达庆春门。再次北的是迎紫路，起于湖滨，经过官巷口，横大方伯，直达城站，也就是杭州市的火车站。最南面是河坊街，自清波门，可直达望江门，恰在城隍山，也就是吴山之下。

杭州因为曾在南宋时期，作过国都100多年，所以许多街巷的名称，尚是从南宋时期沿用下来的。有些，是宫中的街巷，虽则宫殿早已无存，而街巷尚在。

钱士青（文选）先生曾藏有杭州坊巷志的手抄本，抗战时期藏在上海租界，幸未损失。他曾说过要去取回来送



给我，人事蹉跎，未曾实现，真是太可惜了。

佛千先生词云：

杭州城

杭州城，南北长，上下分。巍巍十座门，有诗咏嘉名。　　西城外，即西湖，美无伦。步出涌金门，柳浪集黄莺。

杭州城，美难描。大河两条，三十三桥。浣纱溪，似词中小调。　　浣纱东西大道，千株垂柳舞柔腰。浣纱女，风吹秀发飘，风送笑语娇。

（我们特意选一张民国时期的杭州地图附于书后，供读者参阅——编者。）

杭州大观

1972年3月12日早晨，王序兄来访，谓在台北书摊上，看到一册杭州大观，亟为购得送阅。其中尚有若干插图，更可供回忆之助。王兄去后，我当日即将原书读毕，此书未有作者姓名，亦未有出版年月。但就其内容以观，有“日寇八年之荼毒”一节，末谓：“……以致元气大伤，今重光虽已三年，仍未复旧观也。”可见此书系在胜利之后编印，并在1948年出版。惟我在杭州时，曾否看到过这本书，或是曾经看过而忘却了，则不敢断定。

本书内容，似系就各种原有资料，汇辑而成，并未经过剪裁。但其所收集之方面颇广，亦可谓为小型的杭州志书。每页均分两栏，上栏用四号字，载杭州的史略、地理形势、河流、气压、温度、雨量、风向、区域、交通、教育文化、学术团体，工商实业、特产介绍、杭州饮食、及西湖胜概，附游览指南等。下栏用新5号字，载名人掌故、湖山史话、风流遗韵、英风义烈、佛国志异、历代题咏、楹联选萃等。书内并印有风景照片十数张，及各名胜区简图。我离开杭州20多年，还是第一次重温到整个的杭州心影。

本书教育栏，载有设在西湖汪庄的私立新群中学。又在杂志栏，载有《胜流》半月刊，这皆是我在抗战时期所创办，而于胜利后移到杭州的。

本书教育栏，又载有杭州当时大中小学及幼稚园校名及地址，真是洋洋大观，可以看出杭州教育发达的情况。其中的私立树范中学，设在中正街，就是我少时就读的浙



江省立第一中学原址，地名原为大方伯。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设在贡院前，也就是昔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我曾在其地做过一年半的旁听生。杭州市立佑圣观路中心国民学校，设在佑圣观路14号，就是我幼时就读的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当时称为佑圣观巷，尚未改筑为马路，这皆是我的母校。凡此昔时经行之地，而在数十年后的今日，仍多亲切之感。

本书文化栏，载有杭州8家报纸、35家通讯社与16家杂志的名单，也可想见杭州当时的新闻事业的发达。我因为在浙江省政府任职，经常与新闻界接触，也经常为记者所访问的对象。现在看到这一份名单，真是有说不尽的感触。

本书工商实业栏，载杭州当时有商店10363家，分为113业。银行23家，皆系本国银行，无外国人投资经营者。钱庄34家。可见杭州的富庶，与民生的乐利。但抗战胜利之后，因为受到全国性经济风浪的袭击，这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也不能独善其地。

本书杭州饮食栏，对杭州名菜，记载甚详。尤其是春初，正是春笋上市之时。杭州菜中，以麻酱油拌春笋块与春笋鲊鱼之味，最为鲜美。鲊鱼在上海与苏州，名曰塘里鱼，但以杭州所产者为最佳。所用春笋，须新出土如指尖大小者，方能显出其鲜嫩。自从离开了杭州，久未得此珍味了。



孔 庙

杭州在清代为府治，辖仁和钱塘两县。故杭城有府学一，县学二，共有三处孔庙。民国成立，府制废除，仁钱两县合并为杭县。原设之仁和小学，改为县立第一高小；钱塘小学，改为第二高小。二高在佑圣观巷，距水亭址之钱塘县学甚近。职司教育行政之劝学所，似即在水亭址县学办公。

1915年夏季，我初入二高。每日到校与放学，必须先向孔子牌位行礼。每年春秋两祭，府县学尚分别举行。水亭址孔庙之八佾舞，例由二高学生担任。学期开始不久，即于每日放学前，在自修室前面大石板天井中练习。但我在校三年，迄未被选为舞生，故我每次均只能在旁参观。被选为舞生者，于祭孔后，例得分领祭肉一斤，凭条向肉肆自领。同学中每以领条传观，得者颇引以为荣。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初下令废止祀孔，杭市绅儒，乃自行组设孔圣纪念会，推曾任浙江省长之浙人张暄初（载阳）任会长。自行筹款，办理春秋两次丁祭，惟只在府学举行。"九一八"以后，政府又恢复祭孔，规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由地方官举行祭典。杭州既为省会，乃由浙江省政府会同杭州市政府与杭县县政府办理。但地方官祭孔之时，地方人士不能参加。故在政府人员祭毕之后，孔圣纪念会同人，再继续举行祭典。

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孔圣纪念会一应账册款项存单，均由经营人何竞明（绍韩）先生携回其东阳原籍，毫无损失。抗战胜利，重回杭州，始知仁和钱塘两县学均已



被毁，只留空地。府学原在运司河下，为自闹市口通上城直至吴山之大道。两旁皆为巨室，堂构宽宏。抗战以前，由浙江省政府公务员，利用劳动服务，改筑为马路。并将河填平，加铺柏油，命名为劳动路。我亲往察看，则原有之大成殿，系南宋时建筑，全部皆为楠木，已在沦陷时期，为汉奸王五权以修理为名，咸予拆毁转售图利。盖战时浙东封锁木材下运，杭市遂十分缺少燃料与棺木制材。若干房屋，因之为奸商所盗拆。楠木在平时已甚名贵，战时其价值尤昂。孔庙楠木，后经查明系为菜市桥旁一棺材店所收买，分制成棺木出售。王五权在胜利后业已正法，我仍将棺木店店主移送法院讯办。但杭县地方法院检察处，其后竟不予起诉。其理由为该店主并不知该项楠木，系自孔庙大成殿所拆除者。地方人士闻讯大哗，谓杭州只有府学大成殿系用楠木建筑，且有担任拆除之营造厂证明由其收买，该店主何得为谓不知其来历？法院又焉可轻加宽纵，我力劝应尊重法院之决定，群情始渐平复。

王五权将府学楠木大成殿拆除后，另在泮池之前另建一殿，材料既差，且不成格局。余樾园（绍宋）先生后往观及，谓应名之曰“小成殿”。我并在孔庙中见地下横卧一碑，系新刻者，尚未竖立。察其碑文，系伪浙江省政府叙述拆修经过者，王五权等皆列名其上。张载阳氏于抗战胜利后，回至杭州，不久即行逝世。何竞明先生于胜利后来杭，将孔圣纪念会存折文件等，送至浙江省民政厅，请政府接管。何谓年已七十，战乱之余，不能再任保管之责。我谓纪念会原系民间组织，仍应由民间继续之。遂于1946年孔子诞辰纪念会之后，举行孔圣纪念会战后第一次会员大会，除战前原有之会员外，凡杭州绅儒，均邀请入会。推钱士青先生为会长，钟毓龙先生为副会长。钱为武肃王之第三十二世孙，曾任云南省盐运使，时亦已七十，

但热心地方公益之事。因善勘舆术，常自携罗盘，遍历西湖诸山。步履之健，为常人所不及。钟毕生从事教育，任杭州私立宗文中学校长多年。1918年，我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曾任我之地理教师。能随手以粉笔，在黑板上绘各省地图，凡山川、城邑、铁路、港口，均位置正确。其时亦已70岁。我并以孔圣纪念会原有存款，因法币贬值，已等于零。既已偏劳诸老出力，自不能再使其出钱。故孔庙修复之款，必须出自省库。遂另由省政府成立孔庙整理委员会，党政民意机关首长均参加，但仍以钱钟二老兼正副主任委员，以期事权统一，工作易于进行。

整理孔庙之首要工作，为重新制备祭器乐器。盖孔庙房屋，甫经伪省府修理，除大成殿被拆外，其他均尚可用。至圣先师及四圣七十二贤与配享各人牌位，经检点后，所缺不多，易于补充。而祭器乐器，在抗战初期杭州撤守时，当时之省市政府，均未有人注意，未经携走，战时遂告失落。钱钟二老与我，皆为之焦虑异常，不特重新制办，须费款甚多。且须至曲阜孔庙，先画样本。而战乱之后，有无熟练技术人员，能予仿制，亦属问题。

我乃托钱士青先生，先访查原有祭器乐器下落。幸由其觅得战前在杭州孔庙中任工友之吴石琴，始知并未损失。盖在杭州危急时，吴因未得政府指示，不知应如何处理。日本军队进占杭州，彼尚在庙中。吴知祭器乐器价值较高，乃每晚在庙中空地掘土，一一埋于地下。日军初入杭时，尚未注意孔庙。偶有军队来庙中察看，亦未注意祭器乐器。及伪政府成立，渐有人来孔庙索祭器乐器，吴皆谓早为乱民莠民抢走。时日既久，吴深以埋在庙中为不妥，必须逐步移至城外，埋入西湖山中，方可策长久之安全。但城门有日军守卫，携有物件必须检查。吴知日军嗜香烟，但吴其时并无收入，三餐为难，又焉有余资购买香



烟？遂与庙前设香烟摊之老翁商量，以在街头拾得之剩余香烟，与之交换。其后老翁知其系用以贿赂日军，亦加资助。吴乃每次以布包或纸包乐器祭器一件，步行出城。行至日军之前，除例行深度鞠躬外，并敬以香烟若干支，果然未予检查，得以携至城外。吴谓此不能每日为之，致日军起疑。数年之间已移出者，皆埋于南山之下。尚未运完，战事已告胜利。故尚有一部分，仍在庙中地下。今闻政府整理孔庙，自当全数缴呈，请派员会同发掘，重新置于庙中。我闻之，对吴不禁肃然起敬。论其位，只孔庙中一工友耳。论其学，则识字无多。论其忠义，其智勇，诚为多少自命为孔子之徒者所不能及。我乃仍请钱士青先生，由吴石琴陪同赴南山及庙中发掘，果然全璧归来。我遂请省府予吴以重赏，吴力辞。我乃派其任孔庙管理员，叙委任一级俸。我又亲至庙前，访问摆设香烟摊之老翁。长须飘拂，两目炯炯有神，自称不识字。赏之以金，亦不受。我乃派其任孔庙工友。

抗战以前，浙江省教育厅利用孔庙后院空地，设立省立杭州师范学校，简称杭师。杭州市政府适将自涌金门至清波门城墙拆除，并就城基改建马路，命名谓南山路。抗战胜利以后，改称为膺白路。杭师乃面对新路，另开大门，不再与孔庙共出入。但杭师又在庙中另建一幼稚园，此为地方人士所深为不满者。因幼稚生不免嬉戏吵闹，不能使孔庙保持肃穆也。

孔庙纪念会既恢复，整理委员会亦既已成立。均先后提出孔庙与杭师之间，必须建一隔墙，幼稚园亦必须另迁。时杭师校长姓孔，适为圣人后裔。对建墙表赞同，而迁移幼稚园则谓无款。我乃与财政教育两厅厅长会商，由省库另拨3000万元（此系当时法币，因在贬值期中，故数字甚大），在陆军同袍社内另建幼稚园。另由杭州市参议

会通过，在市预算内列2000万元，为修庙建墙之费。并由三厅共同提出省政府委员会议通过。并决定庙中所有倾圮之古碑，建一碑林，重新排列。庙门口住有难民，概由省区救济院予以收容。

1947年2月27日，上丁祭孔，此为抗战胜利以后之第一次。庙貌重新，古乐齐奏。我意，地方官与孔圣纪念会会员及地方绅儒，共同参加祭典，官民不必分别举行。到者数百人，我任分献官。因八佾之舞训练不及，故只有迎神、献爵、读祝、送神等项。于战乱八年之后，得以重见祀孔大典。及今回思，犹觉其有深长之意义也。

其后，浙江省政府曾拟以水亭址县学原址，改建为职员宿舍，由建设厅主持其事。因省库支绌，人事纷更，迄未有成。

佛千先生词云：

孔　庙

重建大成殿，感慨话劫余。祭器乐器，鬼蜮觊觎。保之藏之，南山之隅。跋涉忘力征，危险罔顾躯。虽一穷工友耳，非圣人之徒欤。　　助之者谁，德必不孤；香烟摊，老翁癯，目炯炯，飘银须；虽然不识字，远胜小人儒。斯二人者，功皆不居。喜有大宪贤，奖之有以夫。

钱王祠

幼时居杭，每至西湖，过柳浪闻莺，必系舟登岸，谒钱王祠。盖武肃王于海内大乱之时，能揭保境安民之旨，使吴越十四州之地，因而不披兵甲。复筑海塘，修水利，兴教育，劝农桑，江南得以繁茂。人物山川，并见毓秀。德泽之深，无与伦比。1923年冬，我婚于钱氏，先岳父逸尘公见告：武肃王有子30人，分布东南各省。支派日多，乃遍及全国。现共有百余支，达20余万人。而昭穆始终一统，此与孔氏同。先岳之系，支祖为文僖公。九世祖讳源，字西贤，号乐泉。元末，兄渊任晋隆尹，从之官，遂隐于武进南夏墅镇。先岳之高祖，讳景星，字二白，有《存雅堂诗文集》行世，德配庄氏。曾祖讳荣第，字实甫，清儒学，德配卞氏。祖讳渊，字晓窗，官江西临川知县。邑多水患，首捐三千金，倡筑堤防，邑人名为钱公堤，勒青天碑以记功德。全邑人士，又请奏入祀名宦祠。晚在南昌筑憨园，日锄花吟诗于其中。德配杨氏。父讳本煌，字济清，官湖北知县，德配黄氏，为仲则公之后。先岳为第三十四世，昆仲二人。

1925年，武肃王三十二世孙文选，字士青，以所编印之钱氏家乘见示，除历代序文外，编为宸翰、像赞、图考、年表、家训、传记、遗文、艺苑、古迹、祠产、世系、支派等，共12卷。用仿宋体大字排印，合为线装本6巨册。内容美备，为他族所难能。抗战军兴，我奉命供职浙江省政府，深知人口迁移，对文化经济影响至巨。而欲明了生聚教训之迹，典籍之记载无多。则各族之家谱，当

钱镠像



为最正确之参考资料。因此由浙江行政学会图书馆，发起征集。惟时值战乱，各家家谱多年未修。即有修订，所印部数，皆有限制。除本族外，概不赠送外人。盖恐有篡改，易启宗祧纷争也。10年之中，征得者，不及50部。以论体例，均较钱氏家乘为逊。

及至胜利旋杭，士青先生卜居西浣纱路，颜曰诵芬堂，与我家为近邻。时先生已逾七十，善堪舆之学，须发飘然而步履清健。我以杭州孔庙岳庙，皆于沦陷期中，遭受敌伪破坏。非发动地方人士共同修护不易恢复，乃礼请先生参与其事。先生亦以钱王祠迭为日伪及我军队占用，破损已极，亦须请政府资助，乞我先容。我乃于1947年8月，提请浙江省政府，拨款5000万元，为庙貌重新之用。惟修复之后，如仍闲置不用，难免再行被占。适浙江省地政局，初由我兼局长，嗣因事忙辞去，由副局长洪季川继任，尚无适当办公地址。我乃劝先生以王祠两厢，借与该局。俾保管有人，修护有责，先生慨然允之。自是春秋两祭，我既以钱氏婿得列阶前。而公务接洽，亦获常到祠宇。



武肃王墓在临安县，1947年5月10日，因视政之便，初得展拜。两山夹峙，偃盖青松。王祠与祭堂，系1913年，武进钱某，任临安县知县时所修建。虽经战乱，堂墓尚属完整。益见王之功业，虽经千百年而尚在人心。祠中祠墓管理，皆系钱氏子孙。我见祠内驻有县保警队，当嘱县警察局设法迁让。并面嘱县长杨维礼，改为县卫生院之用，以免再为其他单位占据。

士青先生又于1948年冬，编印表忠小志一册。叔岳厚哉公为之作序，谓："创业难。而能终达成功，为后世景仰，则尤难。盖自古伟人，乘一时际会，展个人才智，而创造惊世之勋业，其成固极艰辛。然大业草创之后，往往因私见太深，俯视流辈，自以为天下事，均得以强力取之。于是不畏民怨，不纳忠告，终至手创之业，仍毁于瞬

钱王祠功德坊

息，甚且为后世诟病，此贾谊过秦论所以作也。是以历史英雄，不难于始创之业，而艰于终成之功。必也，除私见，以民意为归。袪私利，以民利为先。亲贤远佞，审时度势。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明乎此，庶足以成不世之勋业也。吾祖武肃王，奠定吴越。历五王，传世百年。丰功伟烈，炳于史册。自宋迄今，文章钜子，更代有歌颂，固无待缕述矣。然有谓吾祖不以兵力定汴京，而成大一统者。不知五代之季，列国纷争，生民涂炭。惟我先王，保境安民，以民生为重，奠吴越千万年富庶之基。故传世虽仅百年，然其利溥于民，至今千余年，民犹戴德铭恩。使当时先王好大喜功，惟求国境之扩展，而不顾念民生之痛苦，吾知纵幸先宋而成一统，然其为后人所铭戴，或竟不如吴越十四州也。否则，何以至今，后人惟崇祀表忠观，而宋室之君，竟无寸椽，亦无人追忆宋一统之恩德也。吾故曰，不难于始创之业，而难于终成之功也。”

佛千先生词云：

钱王祠

吴越有人杰，起据十四州。历五王，传百年，庙食享千秋。　　子孙繁衍，家乘百修。谱志皆关历史，缥帙与扬麻。

岳坟与岳庙

我第一次到杭州，只有4岁。先祖母便带我到西湖岳坟，拜谒岳王祠墓，并为我讲武穆故事。第二次再到杭州，已7岁，又带我去岳坟参拜，并授我先祖父晋朋公在其所著《谁园诗钞》中的咏宋高宗的律诗：

直许徽钦奉上皇，自家仍不失君王。
河山轻弃非吾土，丞相忠言有别肠。
归北归南天下定，称臣称侄表文忙。
朝廷虽小西湖大，留与儿孙作战场。

又咏岳武穆王的一律：

临安斗大好山河，如此朝廷奈若何。
两字精忠光日月，一朝冤狱起风波。
心知二圣无还想，谈到中原有壮歌。
不信请看坟上树，北枝高处向南多。

此后，11岁，第三次到杭州，即在杭州入小学读书。我们的校园，就是曲院风荷。每年春秋两季，校中远足，一定要从城内，沿西湖的湖滨，过白堤，走到校园。也一定再从校园，走到岳坟，拜谒岳王。

从11岁起，到45岁从杭州来台湾止，在这30多年之中，不知到过岳坟多少次。杭州人游西湖，没有不以岳坟为中途站的。外地人来游西湖，也没有不先到岳坟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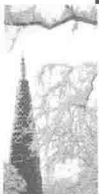


湖滨公园乘瓜皮小艇游湖，舟子便在湖滨码头先喊道："岳坟去吗?"除专雇者外，又有坐满若干人就开船的。在抗战以前，从湖滨到岳坟的舟资，每人只不过铜元数枚。待小舟放乎中流，舟子就开始讲岳爷爷的故事。他们所讲的，多本诸《说岳精忠演义》，再加上民间流传的神话。说的人很认真，听的人也很认真。说的人百说不厌，听的人也百听不倦。岳武穆史事的感人之深而且久，于此可见。

岳武穆生前住于杭州，其宅第在今性存路。性存是我父亲，于1928年1月逝世。杭州市政府因应杭州律师公会之请，将原法院路的一段改名，以纪念其对浙江司法的贡献。浙江高等法院与杭州律师公会，均在性存路，两者系斜对门。法院原址，即为武穆当时的故第。按，自高宗南渡，文武百官皆移家杭州，多广置田宅，而武穆所居则甚狭隘。绍兴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省札，有"奉旨：岳飞所居屋宇不足，今临安府应副添造"之语。可见武穆自奉之俭，与宋高宗当时对其礼遇之隆。

武穆死于杭州，此为千古莫须有之冤狱。秦桧必杀武穆，系宋高宗所授意。因武穆日日以奉迎二帝还朝为言，徽钦二帝如南迁，则宋高宗的帝位必将不保。岳墓前有石刻对联"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已明白指出宋高宗赵构与秦桧，同为杀害岳飞的主谋。武穆死时，为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先君病故，亦系是日。先君生前在武穆当年宅第及其附近，为浙江建立新司法制度，逝世又与武穆同月同日。虽时隔数百年，亦可谓为巧合。

武穆葬于杭州，其地在众安桥。今由性存路向东为法院路，法院路尽头即为众安桥。杭人将杭城分为上中下三城，众安桥系由新市场赴下城之孔道，因此行人众多，向称热闹。我少时每日步行赴贡院第一师范求学，有时经弼



教坊，有时即经众安桥。故对桥前的岳庙与岳墓，均常常瞻拜。北伐以后，杭州市政府于庙中设众安桥小学。

现在人所共知的岳墓，在西湖栖霞岭之阳，杭人均称之为岳坟，闻系衣冠冢。盖宋孝宗即位，始下诏复武穆原官，命以礼改葬武穆父子。其时距武穆之被冤杀，已22年。故后人有诗谓："如此绝代英雄将，怎不迟生付孝宗。"初，武穆被杀于风波亭，即今日杭州第一监狱内，在性存路西尽头。狱门前为北浣纱溪，架有小桥。大概南宋时，系大理寺寺址所在。传说谓武穆奉诏班师，经过镇江金山寺，遇道月禅师，劝其不可回杭州，曾赠诗为别，有"风波亭下水滔滔"之语。可见武穆之被杀于风波亭，早为禅师之所料及。武穆死后，由狱卒隗顺负其尸而出，密葬于北山之麓，或谓葬在钱塘门外，或谓葬在某菜园中。总之，当时秦桧当权，无人敢泄漏其葬地。传说有一士人，篑螺蛳壳掩蔽武穆之墓，坚如墙壁。现众安桥旁尚有螺蛳山，扁担岭，即系其地。孝宗下诏改葬，因原葬处甚坚固，无法移动，故只能以其衣冠为葬，即现在西湖上之岳坟。坟前有两列碑林，多刻有岳王的手迹。

岳坟适在苏堤尽头，游湖者每至此舍舟登陆。迎面为石制的牌坊，上面横刻着"碧血丹心"四个大红字。从牌坊直到岳庙的大门，是一条短而阔的大道。两旁都是茶店、饭店，与出售西湖特产的店，为自湖滨出发后的第一处市场。据说，开店的多姓岳，也就多是岳王的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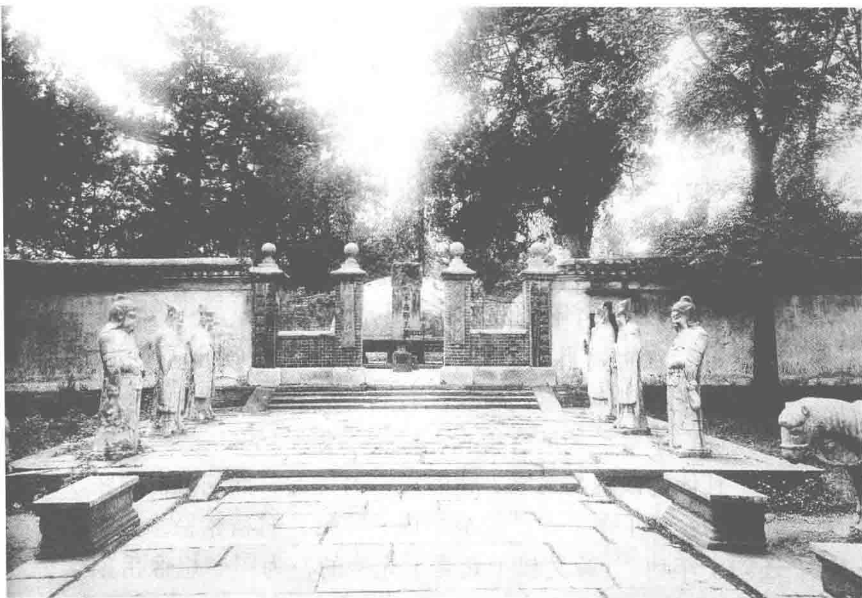
岳坟旁为岳庙，自南宋孝宗以来，历经无数次兵燹与火灾。现有者，系1918年重修。

1928年春季，为了建筑先君的墓园，我几乎每天要到石莲亭，去看工人施工。来去都是先乘舟到岳坟，再从岳坟步行，过九里松，而到墓地。每次来去，也都是在岳庙门前的茶店或饭店休息。或吃茶，或吃饭。无论天晴下

雨，看到参拜岳坟的人，总是早晚不绝于途的。

1937年10月初，上海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两个月，浙江省政府在里西湖的孤云草舍，召开会议。会后，到杏花村吃晚饭。晚饭之后，到岳庙去参拜。大家知道抗日战争一定要延长，杭州也必将沦陷。但是没有办法将岳坟迁走，也不能将岳庙拆毁。大家站在岳坟的前面，行了三鞠躬礼，表示向岳王辞行。并默祷岳王英灵呵护，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行礼之后，大家又走到墙边，对刻在墙上的“尽忠报国”与“还我河山”八个大字，看了许久。这等于我们在岳王之前，作了一次宣誓。那一晚，我们在岳庙中徘徊了许久，才在黑夜中，分别归去。

从那一晚以后，一直到1945年10月中旬，才因抗战胜利，回到杭州，我也才再得到岳坟去。我与杭州市市长周企虞（象贤）兄，一同从湖滨，乘小舟，划到碧血丹心牌



岳坟



坊，而后一同走到岳庙。其时，从湖滨到岳坟，已经有了公路，汽车可以直达。但是我要重走少年时代的路，一定要坐船，周市长也只得陪我一同走。我们进入庙中，先到岳王像前行礼，再到墓前参拜。意思是告知岳王，河山已经还我了！黄龙也痛饮了！我们也回来了！周市长是基督徒，一向不拜偶像，但他也和我一同行礼。他说："这是崇拜爱国的英雄，上帝是可以允许的。"此后，我每到西湖，就必到岳坟。有时乘船，有时乘车。

我们那一次在庙中看了将近两小时，岳王的许多后裔也都来了。我们一路看，一路走，当时就商定了三件事：

一、战时及占据时期毁坏的房屋、围墙，以及失修的部分，立即由杭州市政府，派工修复。1947年10月26日，举行管理委员会会议时，张包增元报告修缮工程，共用去1亿元。捐款所得，为浙江省政府拨2200万元，杭州市政府拨3000万元，另由民间募得2800万元，合共为8000万元。另有上海友声旅行团，负责捐修启忠祠，亦已完工。

二、岳庙在沦陷期中，多了若干方匾额，也多了若干副对联。有日本人送的，也有汉奸送的，并且都挂在最醒目的地方。我和周市长，便一一指明，限岳王的后裔，于一天之内，全部除下。因为岳王是最忠于国家民族的，怎么可以允许敌人与汉奸，在庙中悬挂匾对？同时，选了王卓夫先生的一副对联，挂到庙门的正中柱子上。联句是："天下太平，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乾坤正气，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王先生名荦，浙江省仙居县人，曾任私立浙江体育专门学校的校长。陈辞修（诚）先生在未入保定军官学校前，曾先在该校毕业。

其他的横匾与对联，也有很多可诵的。如刘大白的联句，为："子孝臣忠，决战早成三字狱；君猜相忌，偏安还赖十年功。"黄文叔（元秀）先生的，为："想像岳家

军，敌忾同仇，肯遂令外族横行，中原板荡；苍凉南渡事，伤心异代，且莫话西湖歌舞，大将风流。”我们乃请了杭州耆绅黄文叔、钟毓龙、高鱼占、钱士青各位先生，会同审查，重新排定位置，予以调整。后来在管理委员会开会时，黄文叔先生提出，此后新增联匾，必须先行调查：（一）其人曾否于战时参加伪组织？（二）其所用字句，是否妥当？黄举领事例谓最近有人送一匾额来，系请杭州耆老高鱼占所书，文为“重兴永佑”，即有为个人求福之意，与武穆王尽忠报国之旨不合，我谓将文字颠倒，改为“永佑重兴”，即有为国家祈求中兴之意，勉可悬挂。

三、组织岳庙管理委员会。岳庙保管委员会1931年本已成立，呈准政府有案。当时委员为32人，以张暄初（载阳）先生为主席。抗战期中，工作停顿。此时岳氏子孙，教育程度既不高，经济力量又薄弱。且人数众多，意见不一，难以胜任管理之事。地方人士则拟推我主持。我以其时在省政府任事，一则公忙，二则政府人事常有变动，不如仍在地方父老中选择，遂推举黄文叔先生任主任委员。黄是浙江省的革命前辈，曾参加辛亥年的杭州光复之役，平时热心地方公益。寓涌金门外99号，面临西湖，自题曰“放庐”。其地为清末三雅园的旧址，为杭州文人雅士聚会之所。委员增为77人，由杭州储丰银行经理张旭人先生，任委员兼会计。清泰第二旅馆主人张包增元先生，任委员兼庶务。张包系双姓，字子俊，为新光邮票会会长。在抗战以前，即为著名之集邮家。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樾园（绍宋）先生，任委员兼文牍。现在重阅名单，委员中在台者只得7人。其余或已作古人，或仍居杭州，生死不明。

此后我和周市长，还为岳庙做了几件事：

（一）恢复每年的春秋两祭，我每次皆到。1947年两祭，均系冒风雨前往。先祭启忠祠，次岳王夫妇，次五公



子及五夫人，次辅文侯与典烈文侯。每次推管理委员一人，往祭张宪、牛皋、李宝、张保、王横等五人的坟墓。

1948年4月23日，为农历三月上戊日，岳庙举行春祭。先一日，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氏给我电话，谓拟亲任主祭，并嘱准备三牲、军乐队与花圈。我谓祭岳例只能用少牢，祭孔方可用三牲。且向用国乐，似不宜用军乐。至花圈则以往并未用，但用之自亦无妨。沈乃从我议。祭礼于上午8时开始，与祭者甚多。盖值仲春，惠风和畅，正为游湖最佳季节。待至10月21日，举行秋祭，我已离开省政府，但仍往参加，则政府中无一人到者。

（二）仿钱王祠例，免除岳庙财产的地价税五分之四。

岳庙正门

并由管理委员会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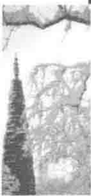
产业契据图照，由管理委员会集中保管。岳氏子孙只有收益权，并无处分权。亦不得任意与他人作永租之约定，已订约者，由管理委员会交涉收回。

又，众安桥岳庙及其产业，现由杭州市政府公款公产整理委员会保管，应一并移归岳庙管理委员会，统一保管。

（三）1948年4月，管理委员会开会时，我提议编印岳王庙志，当推定钱士青、黄文叔、凌砺深（士钧）及陆佑之（启）四位，担任编辑。6月15日下午4时，浙江省政府举行临时会议，通过拨1.6亿元，为印刷费。10月，由陆编成精忠小志初稿，提出管理委员会审查。吕戴之（公望）先生谓应将岳庙财产，详列清单，印入志内，以免日后发生被人侵占情事。10月6日，黄文叔先生来访，请我为该志写一序文，我未及交卷。1949年春，书方印成，我已来台湾，钱士青先生自杭州寄我一册。我于9月27日，赠送给台湾省立图书馆，俾岳武穆王之史迹，可得流传于台省。1971年9月，我以此事告知李子平（安）先生，他乃再向该馆借出，由我商得王云五先生同意，交台湾商务印书馆，照原书影印，公开发行。

我还记得少时有一次，侍先父到岳坟。他当时执业律师，常为刑事被告任辩护人。他说："有一次，法官一定要造成一件冤狱。我就说，一般人不相信法官，而相信城隍菩萨。但如果要知道冤狱对于国家民族的影响之大，最好还是到岳庙去，想想当年'莫须有'三字所造成的后果。法官为我的话所感动，终于将案情平反了！"

关于岳王的史迹，知道的人很多，谈到的人也很多。但当时宋史，系由奸臣秦桧监修，当然颠倒黑白，与事实不符。民间传说，又多带有神话色彩，失之夸张。而今在



岳王被冤杀之后的830年，由其河南省汤阴县的同乡李子平先生，著述了一部50多万言的岳飞史绩考，才算是有了信史。这不但可告慰于岳王在天之灵，也为了我们史学界，完成了一件大事。至于其所发生的鉴往知来的作用，其关系之大，更不用说。

李先生曾到过杭州，瞻拜过岳庙。但我于1956年秋，才在台湾认识他。此后，我们同事10多年。我们常常谈到有关写作的事，因而引起他写岳飞史绩考的兴趣与志愿。其间他每有成篇，必先送给我看。我对于他的搜集资料之勤，论述史事之当，甚为佩服。我相信，由于李先生的这一本书，将历史上多少年的悬疑，都获得了正确的答案。

岳王是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值得我们崇敬。李先生的这一本史绩考，是学术界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值得我们细读。

佛千先生词云：

岳坟与岳庙

石坊为门，抬头见，碧血丹心。两行丰碑如林。“尽忠报国”“还我河山”，飞翰见精神。　　此是游湖第一程，人人拜，岳王坟。浩气自长存。百世烝尝不绝，千秋庙貌常新。



旗营与新市场

清兵入关之后，于顺治二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占领杭州。五年，议设驻防官兵，共3900余人。七年冬，筑营城，是为旗营，杭州人则称之为“旗下”。营城内外，计有1436.4亩。周围9里，穿城2里。以不足4000之人，而占住若是广大之地区，当时杭州人民，怨愤可想。

不但此也，旗营地址，系在杭州的西部，亦即西湖的湖滨地带。南自涌金门起，北至钱塘门止。复自钱塘门而北，而东南，又辟五门。于是西湖与杭州，乃因旗营营城的建筑，致遭隔断。从此杭人游湖，必须穿过旗营，且多只能由涌金门出入。除每年农历六月十八日，为观音大士诞辰前夕，旗营终夜开放，杭人得以有一次游夜湖的机会外，平时旗营城门，入晚关闭，金吾严禁，杭人即不得进出。即在白天，杭人穿越旗营游湖，亦常受到驻防旗兵的欺凌侮辱。妇女即使乘轿经过，也常会遇到旗人掀开轿帘，任意调笑。

杭人传说在设置旗营之初，系由旗兵一人，手执红旗，骑肥马驰行，并任马所之。凡马行经过之地，沿途插上红旗，即定为建筑营城的界线。我意，此说未必可靠。因旗营乃一整齐的方形，且屏山带水，占有杭州的风景名区。当系事先有意规划，并非听由马蹄任意决定。现在可以体念得到的，就是当旗营界线划定之后，凡在所划区域中的住民，自必全部赶走。土地房产，悉被没收。财产损失，难以胜计。

旗营的最北端，是现在的性存路，也就是南宋时岳飞



赐第的所在。向东，一直到众安桥。经过开元宫，为南宋宁宗的潜邸。向南，有长生桥及学士桥，乃韩世忠赐第的所在。南宋时，名为前坪街，宋高宗曾亲书“懋功”二字，以名其园。学士系指明朝的江晓，曾有江学士坊。

旗营的北门，名为延龄门。自延龄门大街向西，有延龄桥。桥旁原为梅青书院，乃宋林和靖未隐时的故居。再向南为龙翔宫，系南宋理宗的潜邸。为分箕兜，系宋贾似道的故居。向东，为宝康巷，系女词人朱淑真的故居。因筑旗营东城，该巷乃被断成两截。

旗营的东门，名为迎紫门。迎紫门直街，在南宋时为花园团，鬻花者居之，遂为著名的花市。朱淑真的词句谓：“今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旧。”即是指的此处。迎紫门直街古名冠巷，又名官巷。旗营建城之后，门外乃称为官巷口。

杭州在南宋时为国都，岳飞与韩世忠皆为名将，各有赐第。贾似道曾为宰相，林和靖为逸士，朱淑真系美人。凡其所居之原址，并理宗与宁宗的潜邸，皆被划入旗营之内。难怪满族人三多（字六桥）于光绪十五年，作柳营谣一百首，谓：“湖山之秀，汇于西城，吾营尽占其胜。吾师王梦薇先生，尝题柳营八景，曰：梅院探春，倚院消夏，西山残雪，南闸春淙，吴荡浴鹅，井亭放鸭，仓河泛月，花市迎灯。并绘图征诗，一时传为美谈。”也更可证明当时划定旗营范围，乃是事先有计划的行动。

柳营谣曾由俞曲园（樾）先生，为之作序，于光绪十六年，用石印印行，署曰《可园外集》。现在杭州尚有柳营路，在旧旗营的南端，当开元路与湖滨路之间。

杭州驻防旗的最高长官，称为镇浙将军。将军署在延龄门内大街之西，墙外即为西湖。有基地127.3亩，房舍164间，可见其宏伟。署中右方有西园，相传为宋富室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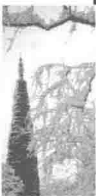
氏的故第。明代，则为柴孝廉的故宅。奇石林立，树木古秀，皆系南宋旧物。张大昌在其所辑的《杭州八旗驻防志略》中，谓："桥亭池榭，足备宴赏。登楼凭眺，则湖山晴雨，浓淡多宜。花竹蔚然，鱼鸟翔泳。"西园于清中叶，经修葺后，易名为倚园。

民国成立，旗城拆除。将军署乃改为浙江的都督府，直至抗战发生，皆为浙江省的最高军事机关所在地。抗战胜利，改为浙江省训练团的团址。花木凌夷，亭台倾毁，迄无力修复。

旗营不但占有了沿西湖湖滨的风景名区，也包括了浣纱溪的沿岸。盖西湖湖水，经涌金门水门入杭城，原为东西向者，在到达闹市口旁，即转为南北向，称为浣纱溪，直至旗营的东北端的众安桥，溪上共有11座桥梁。在现在的板桥路旁，有一折向西，溪上另有4座桥梁。另一折向北，溪上又另有7座桥梁。虽则浣纱溪溪水甚浅，并不能航行舟楫,但自清光绪元年起，沿岸皆植有杨柳。枝垂水面，风物宜人。

我少时常沿浣纱溪步行，最常经过的有泗水芳桥，并有泗水路。古名处水坊桥，清代名施水坊桥。民国后何以改为今名，不知其详。又有井亭桥，井为唐李邺所开的杭州六井之一。南宋绍兴三年，丞相梁克家在井上建亭，乃以之名桥。现在桥在迎紫路，井仍在路旁，用红砖围成六角形，亭则早已不在了。又有平海桥，即在我家门前。其他如板桥、学士桥、长生桥、龙翔桥、延龄桥，也皆是我常常经过的名桥。凡此诸桥，皆并不长大，但因路阔溪清，花柳相映，故走来甚为舒适。

著《杭州八旗驻防志略》的张大昌，系仁和人，也就是汉人。书分25卷，于清光绪十九年出版，而张已逝世。书前也有俞曲园（樾）的序，并有当时浙江巡抚叶赫瓜尔



佳崧骏的序。此书距三多所撰的柳营谣出版的时间，只相差3年。因此两书的内容，颇多雷同。现在驻防志略，有台北文海出版社的影印本。柳营谣则见于《一士类稿》，题为《杭州旗营掌故》，由徐一士于1942年所写。文海书局亦已将《一士类稿》予以影印，读者称便。

民国成立，浙江民政长褚慧僧（辅成）先生首先将旗营拆除，改建为新市场。使西湖与杭州，重新合而为一。当时并无土地重划、都市计划，与新社区等名称，而褚先生则规模宏远，布置美丽，使其成为江南最佳的名都。尤其难得的，是不藉外力，不借外款，不用外人而全部由国人自行建设的新都市。

褚先生将旗营原有的土地，先规划建成为纵横的干线与次宽道路。互相交错，有如棋盘。干线皆宽阔异常，相当于现在的六线道。次要的也一样平坦，其直如矢。东西的干线道路名为迎紫路与平海路；南北的名为延龄路与湖滨路。前三者的路名，皆系旗营原有的城门名字。在湖滨路建筑之时，因测量错误，致沿路地主面积不足，褚乃特准建屋时，加盖骑楼，以面对西湖。此为杭州有骑楼之始，亦为惟一有骑楼之马路。他又自涌金门至钱塘门，沿湖建立了公众运动场、民众教育馆，及6个公园。“五四”以后，直至北伐胜利，杭州市常有群众大会，均在公众运动场举行。至民众教育馆，则常演奏音乐或演出话剧，遂成为青年男女常到之地。6个公园，每个布置不同，所植花木亦异。自南至北，亦即为第一公园至第六公园。临湖设有坐椅，供游人欣赏湖景。在第五公园中，建有禁烟大钟，支以铁架。陷敌期中，为敌人移走。第六公园则设有茶座，供客品茗。近挹湖光，远瞻山色。而在公园与公园之间，建有码头，停泊西湖特有之瓜皮小艇，供客唤乘。自湖滨至岳坟或茅家埠，有区间班船，客满即行。我少时

搭乘，单程只铜元数枚。如须专雇，每半日亦只小洋三四角而已。抗战胜利之后，浙江行政学会自备小艇，名为留春，即常泊于英士街码头，以供会员随时游湖之需。

新市场的次宽道路，其自东而西者，为兴武路（后改名开元路）、泗水路、仁和路、花市路（但花市已早不存在）、学士路、法院路等。自南而北者为杭县路（后改名青年路）、惠兴路、岳王路、菩提寺路、孝女路、东西浣纱路、板桥路、吴山路等。褚先生又在菩提寺路建筑了200间平房，免费供给当时留下来的满族人居住。菩提寺原为杭州的古寺之一，历经兵燹。迨民国成立，寺已无存。寺前路南，原有吴家荡，盛植莲花，也早已成为菜园了。

浣纱路起自开元路，直达众安桥，贯串整个的新市场。河流其中，两岸乃分称为东浣纱路与西浣纱路。沿河



昔日湖滨



两面均种植有杨柳，丝拂水面，老干成阴。缓步其下，虽则看不到浣纱的西施，却多的是洗衣服的家庭少女或幼妇。她们跪在河岸上，微风吹乱了秀发，水沫醮湿了面庞。洗完了，立起身来，一手挽着竹篮，篮中散堆着刚洗过的衣件，一手持着木杵，也为河水洗得一尘不染。三三两两，结着伴，沿着河轻轻地谈着家常，缓缓地各自归去。在她们的字典中，只有一个“闲”字。

民国初年，我的三叔仲眉（性传）公，与六叔石庆（性宜）公合建的桂华里住宅，即在西浣纱路平海路口。因三婶母名桂君，六婶母名璧华，乃各取其一字，合为里名。

东浣纱路自泗水路到迎紫路的一段，为杭县县政府的办公房屋所阻，因而不能贯通。我少时每经其地，辄要改道步行。我常常想，总有一日要将这一段路打通。抗战胜利回到杭州，杭县县政府房屋为敌伪拆成平地，杭州市政府遂趁此将东浣纱路补筑一段，使其得以连贯。我多年的心愿，终告实现。快慰之情，真是非言可宣。每有朋友约我散步，我常带他走这一段新筑的东浣纱路。朋友们甚少知道我少时曾有此愿，但我走在路上，却内心特感愉快。

褚先生又将新市场的全部土地，除道路、公园、学校用地外，划成若干单位，公开标售给人民作住家或开设店铺之用。而褚氏本人，则并没有买一寸土地。

佛千先生词云：

旗营与新市场

百首柳营谣，艳说西城美。西湖十景尽知名，更有杭城八景图堪绘。　　共和继轨，名区重建，风景人文都荟萃。规模宏远，见志士胸中经纬。



浙江病院

杭州之有新式医院，始于英人梅藤更（Main Duncan）所设之广济医院。

自广济医院最早之毕业医生，名张保庆。其时杭人保守，不信西医，更不习西医。张后来在广济之旁，自设保庆医院，并附设药局。此为在杭州由中国人自设中之最早者，但无病房。张因系杭州人，与病人及家属间，言语不生隔阂。及信西医者渐多，其业务乃日益发达。张之公子信培，后亦习医，并在美国留学。抗战前后，任杭州市卫生局局长。后移居香港，近在美国。

民国成立，浙省设省立医药专门学校，造就人才。杭人并着手筹设较具规模之医院，乃在运司河下，就昔日之漕运衙门原地，设立浙江病院。此为民间之公共卫生事业，推先君任董事长，韩清泉（嗣宏）医师任院长，汤尔和亦曾在院中任医师。韩留日习医，人矮，戴银边眼镜。时只30岁左右，而蓄八字须，外貌颇似日人。

浙江病院完全为国人自力所建立，不受政府补助，不请外籍医生。大门及办公室，利用原有官舍，另建有西式楼房两排。楼下为各科门诊与药局，楼上咸为病房。取费低廉，对贫苦者且施诊施药。所有经费，皆由董事会负责劝募。先君及其友人，每年出资甚多。韩院长热心负责，只受极少之待遇，不期积劳成疾，未40岁即行逝世。继任院长为钱泽人（崇润），海宁人，亦系留日习医者，时任省立医专校长。钱于50岁左右，亦因积劳逝世，乃由盛



在珩（佩葱）医师任院长。盛亦系留日者，宁波人，于当时诸人中为最长，而得年最永。1949年盛已近八十，犹健在也。

我幼年多病，乃为浙江病院之常客。尤其一次病猩红热，势甚危险；一次割治扁桃腺；一次割治肥厚性鼻膜炎，均系韩院长为我治愈，或为我施行手术。某次，我在病院住院，适值农历新年，目睹医护人员虽过年亦不得休息，而贫苦求治者众，益深感于公共医药卫生事业之重要。

1937年冬，杭州陷敌，浙江病院所有设备，皆未能撤出，人员亦星散。次年8月，我到浙省府，决先恢复省卫生处，次筹设省立医院。我认为以浙江一省之大，竟无一个省立医院。且在当时，全省政权所及之处，竟无一架X光机，则省府对人民之生命健康，未免太不重视。卫生处恢复案当即实现，而筹设省立医院，因须建筑院址，新置设备，需款较多。几次提出省府会议，均以战时财政困难，而被延搁。1940年，省府会议勉强通过先设筹备处，并拨款1万元。我乃聘林镜清医师任院长，负责规划。林，永嘉人，亦系留日者。素在沪业医，因避战乱返至家中。不料次年5月，敌军流窜，省府迁移，省库紧缩。省立医院筹备处，只得撤销。未用完之款，交还省库。直至抗战胜利，浙江第一所省立医院，始得于1946年，在杭州孝女路成立，由朱国基医师任院长。

我战后返杭，即由盛院长陪同赴浙江病院原址视察，见儿时常到之地，房舍依然完整，至设备则已毫无。究竟何时散佚，为何方取去，无从查考。盛希望由我任董事长，俾先君手创之事业，得以恢复。经同仁等半年多之规划，与多方面之奔走，终于重新开业。我本尚拟有扩建计划，则因牵掣过多，迄未能实现也。

省教育会

浙江省教育会，成立于民国初年，由经子渊（亨颐）先生任会长。经，浙江省上虞县人，时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经先生有同乡陈春兰先生，幼时至为贫苦，因而失学。乡人传其少时恃剥狗皮为生，后赴上海习商，经营颜料进口业。第一次大战时，颜料价格狂涨，陈因而致富。经先生向其募得银洋20万元，在杭州新市场平海路，建省教育会会所。并在上虞县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陈因幼年失学，对教育事业，至为热心，自任中学董事长。经先生于1921年春，辞去一师职务，在春晖自任校长，并聘夏丏尊先生等到校任教。所谓红树青山白马湖，在当时教育界，颇负盛名。经先生之后，由范寿康先生任校长。

浙江省教育会会所，为民初杭州之最新建筑。大门面南，西面为板桥路，东面及北面，均临浣纱溪，占地宽广。沿溪植柳成阴，溪旁绕以短墙，置有石凳。并预留庭园，种植花卉。又在园中建平屋两栋，为会员休沐之所。会所为青砖木造两层楼房，成长方形，东西长而南北浅。有大会堂，可容数百人。有办公屋及小会议室多间，经常为各界所借用。民国初年，杭州各法团每有集会，均在省教育会举行。故省教育会会所，可谓为浙江省之民主会堂。晚间，则常有音乐演奏，或话剧演出。我家其时住青年里，在我青少年时代，常沿浣纱溪步行前往，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1927年以后，浙江省教育厅以省教育会会所为办公地



点。并以园中平屋，为厅长官舍。会所设计，原非作为办公之用，故事实上并不相宜。自此各种集会，乃不能在内举行。而庭园花木，亦不复再由人入内自由观赏。

抗战胜利以后，教育厅迁入杭州梅花碑浙江省政府内，会所发还省教育会，但历任厅长及其眷属，仍住在园中。省教育会会长在经先生离任后，曾由李俊夫担任多年。李，浙江省丽水县人。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理事制。抗战胜利后之常务理事，为叶溯中、许蟠云、方俶新（豪）、郑小杰诸君。

省教育会收回会所之后，即有眷属多家，迁入居住。又将大会堂，租于商人，开设金城影戏院。楼上一部分，则为中央广播电台浙江分台。盖敌伪时期，在此广播，胜利后一仍其旧。台长陈君，浙江省吴兴县人，常约我到台播讲。因此，我虽极少有看电影的机会，但仍常得进入省教育会会所。我家于1925年，移住平海路，即在省教育会斜对门，来往更较我少时为方便。

1947年7月9日午夜10时半，我方自省政府公毕归家。金城戏院门前，忽人声鼎沸，旋见多人由东向西奔跑，且断续有枪声。后始知系青年军职业训练班学员，因看白戏肇事，幸得当地宪兵制止，立捕20余人，秩序乃告恢复。我乃向省教育会各位理事建议，宜体会昔日筹建会所之不易，于租约期满后勿再出租，而多作有关学术文化教育的活动。

1948年11月4日上午11时，金城戏院忽然失火。幸是日为北风，而我家在其东南，未被波及。消防人员迅速到达，复两面临河，板桥路口又有自来水栓，取水方便，易于扑灭。但历经军阀内战又经八年抗战幸得保存之大会堂，已完全焚毁。我于下午一时入内凭吊，真不胜感慨系之。其时有金华师范、绍兴师范、上海大陆师范三校学生



来杭州旅行，借住会内。学生晨起皆往西湖游观，行李全部被焚。我见诸生正在检寻焚余物件，无可为助。闻金城戏院租期即将届满，而竟有此火，原因何在，此后迄未查明。

至陈、经两先生所创办之春晖中学，在抗战胜利之后，由徐子梁（浩）兄任董事长，其长公子如愿任校长。1948年5月10日，我始得前往参观。我于上午9时半，自百官乘乌篷船过崧厦、百丈塘而至驿亭。沿途大雨不止，我在百丈塘坝下，停舟以待天晴不得，只可冒雨前进。于下午5时到驿亭，徐校长在岸相候。我乃登岸，与之一同步行赴校，并与全体师生晤面。本思在白马湖上一试轻舟，以偿宿愿。而风雨不止，天已黄昏。我笑对徐校长说："兄大名为如愿，而我今日竟未能如愿也。"徐亦为之怃然。

杭一中与杭一师

1918年暑假，我自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以第三名毕业，父亲正去普陀旅行。他在动身之前，就对我说：“如果小学可以毕业，就准备投考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其时，杭州尚有私立的宗文、安定、蕙兰各中学，惠兰系基督教教会所办。安定中学校长陈柏园，且系父亲好友，但父亲却只要我投考一中。其他各校，皆不必考。他并预先约定二高的国文教员赵敏栽先生，在暑假中，来家为我补习国文。

暑假中，赵先生每天上午来家为我补习，主要的是讲解《左传》，并且每天要作文。赵先生说：“省立一中的国文教师是杨雪门先生（学洛，杭州人），他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学家。他每次出的题目，都在《论语》或《左传》。”

父亲自宁波回杭，正赶上省立一中的报名。我的报名号码，是第161号，报名者共只300人左右。入学考试，考国文、英文、算术三门。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高等小学，就有英文课程。所以中学入学，要考英文。国文是做一篇作文，题目是：为政在人说。英文是口试几个生字的拼法，及中文的意义。算术是考四则。

考罢出来，先去看赵先生。他一看国文题目，并不出在《论语》或《左传》，而却意外地出在《孟子》。他问我怎么做的，我说写了800字左右，并将内容约略地说了一遍。他沉默了好几分钟，才举起他手中的水烟袋说：“大体不差，但不算最好，因为对题旨未能充分发挥。”我再

回家告诉父亲，并且将赵先生的话，也报告了他。他说："题旨未完全弄清楚，且看运气罢！"我自己也感觉有些紧张，更多的是失望。而父亲却说："你也累了，休息几天。北京清华大学要在杭州招考中学新生，也可以去试一试。"

不久，省立一中放榜了，父亲自己带我到校门口去看榜。共录取了50名，我们从后面倒看上去，久久都没有看到我的名字。父亲却有信心，说："一定在前面。"于是再一一往上看，原来我是取了，是第26名。父亲乃立即带我到赵先生家去报信。他也正在吃水烟，却将水烟袋向茶几上重重的一放，向父亲拱一拱手说："令郎富有才华，前途无量。老朽学力，止于此矣，不能再为其师。而其日后成就，恐年迈，亦不及见也。"我们父子，仍再三致谢，始行辞出。

回家后，先父问我要不要再考清华，我说："要。"而母亲却坚决不赞成。她说："我们只汝一子，汝父身体不好，汝又太年幼，怎可独行千里，到北京去入校。"于是我乃放弃了再考一次的机会。

杭州省立一中校址，在大方伯，分部在南板巷。其前身是养正书塾，乃系当时杭州府知府、福建侯官人林迪臣（启）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所创办。塾址原系圆通寺，因寺僧倚仗官势，胡作非为，为老百姓告发。并有秽行闻于郡中，经林知府查明属实后，将寺僧置之于法，并连夜将寺产查封，撤去佛像。位于寺旁的广济医院，乃英国人梅藤更所创立。梅倚仗不平等条约，见圆通寺建筑不坏，想占为己有，对林知府威胁利诱，一再提出要求。林坚持不允，对梅说："这寺是国家的产业，夺彼教而授彼族，吾无以面杭之父老。我这个官可以不做，要我将寺产，给了外国人，是万万办不到的。"



林迪臣所办的养正书塾，实际上是中等学校。所设的课程，有：国文、小学（《说文解字》)、经学、修身、算术、历史、地理（主要讲《水经注》)。以后，又增设格致（物理）、体操、英文、音乐等。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更名为杭州府学堂，学额100人。管理人潘鸿，杭州人。

林迪臣于光绪二十六年，在杭州逝世，葬于杭州西湖孤山。杭州人士，在孤山建有林社，以资纪念。每年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社祭。我的留法同学林君立兄，即系林迪臣的嫡子孙辈。

民国成立，府制废除，杭州府学堂，再改名为省立一中。父亲写了一篇《少年行》给我，父亲平素不喜做诗，这一篇好像是为了应杭州愉园诗社的征稿而写的，题目也是诗社定的，适在我入中学之始写成。全诗意义，在于勉励少年要自立自强，至今不敢忘记！

少年何所能，能为狎邪游，酣歌更恒舞。少年何所恃，恃有父兄荫，幸福天所予。岂知金乌尚有西堕时，沧海且见扬尘土。尔父尔兄非金石，一旦身亡谁庇汝。学商不识物贵贱，学农不耐胼胝苦。储金挥尽童仆逃，田亩荒芜屋宇火。昔日炙手可热时，抗粮不纳孰敢侮。今日冰山已倾倒，催租吏来如狼虎。无钱无米捉将去，三日一比笞痛苦。笞后仍须力筹缴，投亲访友无人顾。此时深悔少年时，呼天呼父将何补？告尔同胞众少年，及时努力毋自阻。

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杭州大方伯。从我青年里家中步行，过官巷口、炭桥、丰乐桥，就到了，大约有三华里路。1931年以后，这条路改为柏油马路，一直通到城站，也就是杭州的火车站，并改名为新民路。

我在中学一年级的课程是：每周国文8小时，分《左传》、古文、习字、作文及黑板练习五项。英文7小时，分读本、文法、及习字三项。算术5小时，分数学（几何）及簿记两项。体操四小时，分兵式、普通，及拳术三项。本国历史，及本国地理各2小时，图画、手工、与乐歌各1小时。每周共上课36小时。到了二年级，另增加博物与修身两课。

其时校中的教师，是：

校长　吴文开先生　　国文　杨学洛先生

英文　施仁荣先生　　数学　洪镜西先生

历史　钟毓龙先生　　地理　王梦僧先生

博物　宋知方先生　　修身　陈省齐先生

音乐　王华恩先生　　国画　樊希忱先生

手工　王　伍先生　　体操　王擎柱先生

校长吴先生，是嘉兴人。杨先生是杭州的名古文家兼名书法家。民国初年，杭州西湖上的许多联匾，及市内的许多店铺招牌，都是他写的。据说他写字时，先将毛笔的笔尖剪去，所以才会别成一格。我们一批同学也跟他学，剪去了笔尖写字，自然更写不好了。杨先生的弟弟名学浚，字云谷，也长于书翰。1938年8月，我到浙江省政府任事，由刘百闵兄介绍，来任我的秘书，方始认识。抗战期间，同历患难。胜利回杭的第二年某日清晨，忽于如厕时以脑溢血逝世。至于其令兄雪门先生，则在抗战前即已谢世了。

施先生字少明，余姚人，与我家为同乡。他在清朝末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与蒋梦麟先生同乡、同班，又同时考取官费留美。蒋先生出国了，而施先生的双亲，因为不放心他作万里之行，遂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就在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教英文。寒假期中，父亲并曾聘他到我家

中，为我补习。我最初习法文，也是他教的。

钟先生讲中国地理，能在黑板上，随手画出任何一省的地图。凡山川、城邑、铁路、港口，均位置正确，同学都非常佩服。他后来任私立宗文中学的校长，校址在皮市巷，与一中为近邻。抗战胜利之后，杭州市设立市参议会，我请他任议员。其时他已年逾七十，但对于地方的事，仍甚为热心。

樊先生名熙，一字羲臣，是清末的秀才，也是清末名画家戴醇士的得意门生。他的书法与画笔，均与戴相似。但是我们当时这一批中学一年级生，却对于图画，并无兴趣。樊先生每次上课，总是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一幅范本。要学生用铅笔，在白图画纸上临摹。他所画的无非是一座山，一条船，一个亭子，一个人，和几株树。有时候山在左边，亭子在右边，人在亭子里。有时候山在右边，船在左边，人坐在船上。粉笔本不容易画出浓淡，黑板也难以显出远近。他其时已是古稀之年，须发皆白。慈祥恺悌，就是没有教授法。学生也不用心画。于是全班之中，只有几个人会勉强临摹，当场交卷。他就在画纸反面的下角，批了成绩，在下一堂上课时发还。最好的也只是甲下，最差的也有丙上。别的同学乃再将画纸的边裁去，填上名字，又交了上去。如此，一张画至少要裁过三四次，画纸遂愈裁愈小，他仍是照例评定了成绩，一次又一次的发回来。同学们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欺樊先生不知道真相。哪知，到了第二年，在暑假前，上最后一堂图画课的时候，他说："下学期，各位将升上二年级，没有我的课了。我只是在清朝得了一个秀才，而各位则皆是翰林院编修，真是前程无量。"编字，谐边字，原来他早已了然于心。同学们跟他上了一年的课，虽则什么也没有学会，但听了他的话，人人仍不免自愧不已。

王先生也是杭州的名教师，兼了许多学校的课。不但长于手工，且擅长画猫，栩栩如生。有一年寒假，父亲特请他到家中来，为我补习手工。当时还没有双手万能的口号，而父亲却认为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劳动。王先生教我木工、铁工、蜡工及用石膏制像等等。他知道我缺乏绘画的天赋，所以并未教我如何画猫。

洪先生是扬州人，讲的一口江北话。我因为系在江苏省兴化县出生，听来并不费力。而其他的同学，尤其是来自浙东各县的，总觉得不顺耳。洪先生讲授几何，常常在黑板上写公式，当他写上三点时，他总说所以如何如何。因之，同学就在背后称他为“洪所以”，有时就称他为“洪三点”。到了二年级，洪先生走了，改由郭成九先生教几何，郭是杭州人。

陈先生是临平人，讲话喜用成语。1923 年冬季，我的堂姐静成，与陈中孚君结婚，我才知道就是他的令侄，所以两家就成为亲戚了。

我在一中一学期多，生活很平静，成绩也有进步。但图画、手工、音乐、体操等门，只能勉强及格。

杭州一中的校歌，原句如下：

郁郁兮苍苍，虎林佳气扬。圣湖水碧之江黄。跻跻兮跄跄，瞻仰夫子堂，龙飞凤舞到钱塘。道德文章，荏苒几星霜。猛进、猛进，吾敢忘。如雷霆之万发，金石之坚刚，愿我中华万岁长。

“五四”运动一发生，我们平静的学生生活，完全变了！

“五四”运动，实在纯粹是偶发性的单纯爱国运动。既非事先由任何人，或任何党派，在幕后策动，也没有任



何预谋或计划。

首先是大家为了爱国、团结、奋斗，杭州有了学生联合会，学校有了学生自治会。我先当选了学生自治会的评议员，又当选了出席学生联合会出版委员会的代表，常常要忙着开会。当年一同在杭州学生联合会工作的人，现在在台湾的，尚有罗霞天兄与毛彦文女士，罗是立法院立法委员，毛是国民大会代表。

再则是抵制日货的运动，各校学生分组到车站、轮船码头、商店中，去检查日货。原有的加以查封，新运到的加以扣留，送到学生联合会去处理。我被派到南星桥车站，接连多少天，并未查到日货。因为这只是从杭州到江干的一个中间小站，平时就没有多少洋货进出。我们这批中学生，只得在车站上拾石子玩。每天等到最后一列火车过站了，才回家休息。

再则是示威游行。为了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为了支援上海的罢课罢市运动，杭州全城，也于6月9日罢市，至12日复业。又每隔几天，就有一次全城学生大游行。全城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七八千人，一律穿了学生制服，拿着白布旗，到杭州钱塘门外在石塔儿头日本驻杭领事馆门前高呼："还我山东！"我除了要参加游行外，还被推担任草拟传单。传单都是用毛边纸油印的，有标语，有漫画，每次还要有新的内容，和刺激的语句。而各校所发的传单，无形中还有竞争，大家都不愿被人批评为平凡不足道。我曾将当时各校所发的游行传单，汇集起来，钉成一厚本，可惜在抗战期中失去了。

还有就是开会，听演讲。其时北京、天津、上海，不断地有学生代表到杭州来，报告各地学生运动情况。最早到杭州的北京学生代表，是金华人方豪。方字俶新，抗战前后，均担任浙江省立金华中学校长，我常与之见面。5

月22日，方在平海路浙江省教育会大礼堂讲演，轰动了杭州。

于是，自5月起，一直到放暑假，就没有上过几堂课。连学期考试，也在废除考试制度的口号下，没有举行。

过了暑假，我们一班，自然地升为二年级。

现在要说一说白话文运动。

我们的国文教师杨先生，既然是杭州有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应该是不会赞成白话文的。“五四”运动以后，他照常上国文课，照常出题目要学生写作文，而我和少数的几位同学却改用白话文交卷。尤其我在第二高小的时候，就由张元孟先生教过白话文，所以写来更觉方便。最初，我们是试试看，看杨先生会不会责备我们，不该用白话作文。而等到作文发回来的时候，杨先生却一样的予以圈点，一样的予以评语，一样的予以分数，并未有一点呵责，更不曾因为用白话作文而少算了我们的成绩。这在试探的作用上说，我们是胜利了。

在1919年的暑假，杭州一中又招新生。9月开学，校中盛传这一年的新生状元，在应考国文时，是用白话写的试卷，可见杨先生是真正的也赞成白话文了。否则，他怎么会给这位新生最高的分数呢？于是大家都急着要见见这位榜首，哪知道他到校注册时，竟是一位身穿蓝布大褂，鼻加阔边眼镜，足穿老布鞋，并且还有些驼背的老少年。他姓查，名猛济，字宽之，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人。他一向在私塾读书，从未进过小学，所以国文的基础比较好。

查宽之兄虽则比我低一班，但我因十分钦佩他的白话文，所以就常去向他请教，于是我们就想出版一份提倡白话文的刊物。我当时是15岁，宽之比我大，也大不了多少。因父亲在杭州办有浙江印刷公司，是杭州最早的铅印工厂，印刷自然方便。其次便是稿件与经费，稿件决定由



我们自己写，经费则移用我们自己的储金。

我们怎么会有储金呢？原来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初，全国学生有储款赎路的运动。便是要集少成多，将山东省境内的胶济铁路，自日本人手中赎回。我们在校中，遂也有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每人每日或每周须储蓄铜元数枚，交由推定的干事保管。其时大洋一元，可以换铜元300枚。我是走读生，便参加同一个自修室的十人团。家中每天给我的零用钱，都捐作储款。及至暑假以后开学，全国的赎路运动，已趋于冷淡。而我们这一团所收的储金，共只有几元大洋，遂移作为我们自办刊物的印刷费。

杭州省立第一师范校址，在贡院，地处下城，傍梅登高桥。在科举未废前，杭州每场乡试，应考者恒在万人以上。故贡院场地，至为广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兴新学，乃将贡院大门内考棚拆除，两旁植花木，作为甬道。并将原有明远楼，改建为钟楼，另新建大礼堂，及两层楼房多排。一楼为教室与学生自修室，二楼为宿舍，建筑费14万两，是为两级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冬，招优级、初级及体操专修科学生600名。学生仅自备书籍，余者免费。岁拨经常费5.3万余两，课程编制，优级设史地、理化、博物、算学选科。预科一年、正科两年、体育专修科一年、图画手工二年，凡六学级。初级分五级，修业期限二年。第一任监督喻长霖，继之者王廷扬、沈钧儒、夏震武、袁家谷、孙智敏、徐定超，皆系浙江省人。于1913年停办，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喻长霖，字子韶，台州人，进士。王廷扬，字孚川，金华人，举人。沈钧儒，字衡山，浙江省嘉兴县人。光绪二十九年，顺天乡试因辛丑和约规定，肇事省份，皆停止考试，改在河南开封举行。沈以第十九名，得中进士，时年28岁。后赴日本，入法政大学，曾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师校开学

之日，钟楼忽然倒塌。这位进士公监督，以监工不周，被记大过。沈于1963年6月11日，病逝北平，享年90岁。夏震武，浙江省富阳县人，为理学名家，世尊称之为灵峰先生。孙智敏，字廑才，杭州人，21岁即点翰林，为科第之最早者。1927年，父亲任浙江省司法厅厅长，礼聘其任主任职务。徐定超，字班候，永嘉人。1917年，先姑母性姗于归杭州钱氏，借马坡巷丁宅为礼堂，父亲请徐任证婚人。旋自上海返籍，航轮发生海难，徐丧生。现在台湾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徐贤修兄，为其孙辈，因之终身不食海鲜。

两级师范成立时，以经子渊（亨颐）先生任教务长。经，浙江省上虞县驿亭人，曾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毕业。民国成立，两级师范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为首任校长。原有校舍最后两排房屋，划为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堂，由周季纶（锡经）任校长。周，浙江省平阳县人。一师分为三部：第一部系正式的师范生；第二部招收旧制中学毕业生，施以一年的师范教育，均在贡院本校。本校大门内右侧，设有附属小学。附小另在杭州皮市巷，设立分校，是为一师的第三部。

经校长在一师，自教务长至校长，共工作了13年。“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中心，北方在北京大学，南方则在杭州第一师范，经先生的贡献不小。1917年4月25日，他为学校撰成立十周年纪念歌：

清和清和，荏苒韶华，五年又复五年过。
明远旧雨，叙少离多，之江大地乐菁峨。
恨不读书，时乎时，毋令岁月空蹉跎。
相勉相亲来来来，一堂重唱碧梧歌。



1919年11月15日，经校长又为学生，作自治歌：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制。

1919年5月，浙江省第二届省议会，在杭州集会期中，有省议员若干人，自动提案，要增加议员的公费，舆论大哗。父亲当时也是省议员，就与他所领导的“良社”若干议员，提案反对。22日，为北京“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18天，各地学潮，正在热烈。适巧是日上午，北大学生会代表方豪，在杭州教育会讲演，引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下午一时，杭州一师的学生，就自动的列队，到杭州高乔巷省议会请愿，并列席旁听，请愿打消增加议员公费案。议长周萍洄（继潆）对学生出言不逊，于是学生一时冲动，冲入会场，殴打议员。学生见父亲亦端坐在议场中，乃谓：“此主张正义反对加费之阮先生也，不可伤之。”乃护持至大门，登车返家。此事，经校长事先并不知情，更未有预谋。因一师学生从学校出发时，他正在省教育会主持评议员临时会议。会散，回到家中，才得知有此



经亨颐

事。但经先生却早已知道："余所处地位，新旧交接，众矢之的。收放则可，而志不可夺。"一师学生殴打议员事发生，浙江省长张暄初（载阳）出面调停。张，浙江省新昌县人，原任浙军师长。当时虽向省长公署匿名控告经校长者甚多，均经张暄初搁置。

及《浙江新潮》事件发生，浙江省议会议员，为报5月间被一师学生殴打之仇，认为系对付经校长的最好机会。事实上，经校长于是年9月30日，自杭州动身，经上海、南京、北京、石家庄，到山西省省会太原，出席全国各省教育会联合会议，于10月24日离晋，转汉口、九江、南京、上海，于30日返杭，为时一个月。换言之，《浙江新潮》出版之时，经先生人并不在杭州，也更不知有此事也。

浙江省议会当时的议员总额为152人，因《浙江新潮》提出的质问书，共有两件。其一是朱文提出的，连署者51人。其二是阮尚传提出的，连署者14人。又省议员余炳光、陈卫另提出查办一师校长经亨颐的议案一件。

质问书与查办案都针对经校长而发，说他："盘踞造就师资之师范学校，倡最荒谬最枉妄之学说。"又说："《浙江新潮》第三号，有'本刊虽受压迫，但是我们的精神和主张仍旧进行'等语。怙恶不悛，已可概见。"又说："此项报纸，由该校校长在校内发行。""为400兆人民福利计，谨依法提出查办。"省长吉林人齐耀珊，乃派教育厅科员富光年，到一师查办。其时任教育厅厅长者，为伍崇学，江苏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次年即更换为夏剑丞（敬观），江西人。事实上，我们只是提倡白话文，并且早已说明系各校学生以个人名义办理，与各学校无关。

经先生回到杭州之后，省教育厅先要他解聘一师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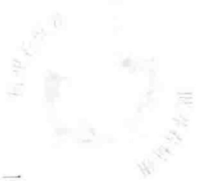


教授白话文的4位国文教员，即日后在文学界俱享盛名的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与李次九。又要他开除参加《浙江新潮》的一师学生。经先生均不允行。待到寒假，省教育厅就将经先生调为厅中的顾问，而以厅中的视学金布，继任校长。经先生辞顾问不就，刘先生等4人，也自动离校他往。但一师学生坚决反对新校长，于是由警察多人，护送新校长到校。学生则在大门内甬道，列队坐地，绝食抗争。杭州其他各中学学生，包括女师、女职等校，则携带食物水果，到一师慰问。杭州学生联合会会刊，及一师原有的学生自治会会刊，均对一师学生，撰文声援。一师学生又临时编印《钱江评论》，每日出版，发动留经运动。教育厅乃下令，解散一师，强迫学生返里度岁。一师学生乃出版了一册《浙江第一潮》，纪述此事。关于《浙江新潮》遭受查禁及经校长受到查办的经过，1919年11月28日、30日，及12月14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均有专文记载。



一师风潮，当局出动警察

经先生为了表明心迹，特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告一师学生书，劝大家以学业为重，早日结束学



潮。这与“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元培）先生的告全国学生书，可以比美。蔡先生的令弟谷卿先生，时任杭州中国银行行长，遂出面调停，由省教育厅另聘留日习教育的姜伯韩（琦）先生，继任一师校长。姜，浙江省永嘉县人。风潮于是平息。经先生则回到他的故乡上虞县，在白马湖，另行创办春晖中学，后亦极负盛名。1938年9月15日，经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62岁。

抗战期间，我在浙江省政府服务，常到各县访问，每遇及当年的省议员，谈起《浙江新潮》事件。他们或曾连署质问，或曾提案查办。我谓：

“经校长当时确实不知道我们办刊物，我们也从未与他见过面，他竟受了我们的连累。而省议会逢迎军阀政府，故意制造政潮与学潮，以打击经先生，更是我们所未曾料及的事。况且我其时只有15岁，系中学二年级学生，哪知道什么政争的背景。其他参加者，最长者也皆未超过20岁。完全凭着自己的热诚，牺牲自己的学业，用自己的精神、时间与金钱，来为新文化铺路。既没有任何背景，未受任何方面的主使，更没有任何不正当的目标。而诸君在查办文中，竟指我们是洪水猛兽，说是为400兆人民福利计，谨依法提出查办。实在太重视了我们。致引起浙江省教育界的莫大风波，株连了许多人。”他们听了，也觉哑然失笑。

至于杭一中方面，则原任校长吴文开被免职。他受到牵连，更是冤枉。他更不知道我们办刊物的事，连我们的面，也未见过。新任校长郭成九，原为校中的数学教师。他就职后，就召开校务会议，议决开除学生10人，查宽之与王乃宽皆在内。王自中学一年级起，就和我在教室中同坐一张长板凳。他是诸暨县牌头镇人，比我大三岁。因为他是住宿生，我是走读生，我有些书籍簿本，不必每天带



来带去，就存在他处。我介绍他看《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他乃也赞成白话文，也参加了《浙江新潮》，并未写过任何文章，竟也被开除了。乃宽兄后来入上海浦东中学，再入南开大学，又到美国习航空，颇有成就。宽之兄就从此未再入学校，抗战时期任国立英士大学国文教授，为自学成功的一人。

至于我呢？却因为父亲当时是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杭县律师公会的会长，在社会上著有声望。据说在校务会议席上曾讨论很久，结果决定只予以训告。父亲听到了，大不以为然。立即写了一信给郭校长，原信如下：

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鉴："五四"以来，各处学生过于活动，诚不免流于一偏。然此乃我国近数年呆板教育之反动力，苟思补救方法，必须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详细筹划。断非一二官吏之武断，所能解决。前闻贵校有斥退学生之议，比以小儿毅成，亦在嫌疑之列，未便置词。兹悉贵校教职员会议议决，将与学生联合会及学生自治会有关系者，斥退十人，小儿仅予训告。教职员诸先生对于小儿，如此成全，讵不心感。然小儿固为学生自治会评议员，且曾为浙江新潮社社员。如以为罪，则不能比其他十人末减。同罪异罚，迹近卖友。小儿立身之始，不愿其蹈此恶习，致负诸先生期望。谨为声请退学，俾其实践牺牲之说，留为"五四"学潮之纪念。老悖之见，当荷鉴谅！

阮性存谨启　民国九年二月十八日

父亲其时才只47岁，自称老悖之见，实系当时最富有新思想的人。他对我所闯的大祸，一点没有责备，还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使杭州的教育界，为之震惊。一中的新任

郭校长与教职员，都感到没趣。亲友则无不为之赞叹，而我乃亦更成为被注意的人物。

1920年2月，我自浙江省立一中退学，但并未因之失学。

父亲决定先在家中，为我补习半年，由他自己讲解文史，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以至《东莱博议》,要逐句圈点，要背诵，要做札记。并且每天要做作文，有文言，有白话，均由他自己批改。另聘请施少明先生，到家中来教英文。晚上，并到基督教青年会去补习英文，那是随班上课的，课本是苏格兰校童自述。至于数学，则请青年会的马宗德先生补习几何，那是每天下午去，单独上课的，课本则用英文原本。

这样在家中补习了半年，功课较在学校中，还要繁重。并且将自“五四”运动以后，因示威、游行、罢课，及办刊物等所耗去的时间，都补了回来。查宽之兄在离开一中后，仍住在杭州，在《之江日报》任编辑，时年尚未到20岁。3月15日，我又与他共同创办《浙人旬刊》，又无其他学校学生参加，共出版了几期，不复能记。我只记得在创刊号上，有宽之写的发刊词，与我写的冬日游湖，原文皆早已无存了！

其时，办刊物实在很方便。印1000份的八开刊物，连纸张在内，只要大洋3元，真是人人可以办也。浙江印刷公司，系父亲于民国初年所创立，工人程度较高，“五四”以后，他们也自写、自编、自印了一份刊物，名为《曲江工潮》。杭州附近的乡镇，也到印刷公司来印行刊物，其中以吴兴县双林镇所出的周刊，内容及编排为最佳，也就是现在所谓社区报纸也。

宽之兄常来我家看我，父亲也很赏识他的文章，常与他谈得很多。我乃对宽之兄说：“我们现在应当觉悟了，



我们太年轻，知道得太少，应该先好好地把书念好才对。”于是，我们乃发起组织一个读书的团体，称为悟社。并且宣布我们的宗旨，是“以知悟人，以力助人”。悟社的成立，距《明星》月刊的出版，为一年差两天。悟社的社员，在各地成立读书会，除各人自己读书之外，还要把每次所读的，于一定时间，用口头或书面，向其他的社员报告。再将这些报告集合起来，用铅印印成丛刊，公开出版。可惜的是悟社丛刊若干册，因连年战乱，都散佚了。

1920年秋季，父亲认为我在家中补习，总不易多得良师益友，还是应该进入学校，乃商得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姜伯韩先生的同意，准我入校为旁听生，这是该校前所未有的特例。因为一师学生全部是公费，并且一定要住在校中。我的志愿既不在师范，而一师照规定又不能收转学生或插班生。我只得每天自家中步行5华里路，到贡院的校中去上课。下午课毕，再步行回家。不论阴、晴、雨、雪，每天都是如此。其时杭州除新市场有新式马路外，仍多为旧式街道，狭窄不平。我每天要走过许多弯曲小巷，才能到达。至于午饭，则我既系旁听生，自不能进入校中的饭厅，与同学们一同享受公费伙食的权利。父亲便到铜匠店中，将其昔年在日本留学时所用过的便当，画了一个图样，交其定做。做是做成了，却又大又重。校中厨房不能为我蒸煮，所以便当中，只能带些面包、牛肉等冷食的食品。便当在今日台湾，十分普遍，但在50年前的杭州，我是最早的，也是惟一的携带便当上学的人。我既要步行上学，要带书包，又要带沉重的便当，下雨时还要带雨伞，负担真是颇为沉重。

一师学生的寝室与自修室，是分开的。我既系走读的旁听生，自不需要寝室，却也没有分配给我自修室。每一间自修室，大约有16位同学，每人有书桌和椅子。我在课

余的时候，只得到熟识的同学房中借坐。他们于午间去饭厅吃饭，我就坐在同学的自修室中，打开便当盒一个人吃冷牛肉与面包。

其时，经校长子渊先生虽已离职，但他所聘的优良教师，还都在校中继续任教。因为我是杭州"五四"时期的人物，其他的各中学都不愿意收容我，这是父亲不得已才使我到一师做旁听生的原因。但一师的教师们，却并不对我见外，反而多方鼓励我努力向学。同学们更不论年级高低，都待我极好。每逢考试，我这个旁听生本来可以不必参加，但是我总自己要求应考。教师照样批改我的考卷，给我分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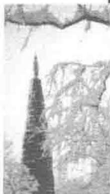
我因为是旁听生，可以不受年级的限制，由我自己选爱听的课。只要时间不冲突，我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不同年级的教室，也因之认识了所有的有名教师，与每一级成绩优良的同学。

其时一师的教师，是：

国　文　朱自清先生　　英　文　刘延陵先生
史　地　郑鹤春先生　　生　物　王　祺先生
化　学　陈邦材先生　　教育学　袁　易先生
　　　　　　　　　　　　　　　陈成仁先生
音　乐　金咨甫先生　　图　画　姜丹书先生

担任国文教师的几位先生，都是当代的名家，也都是写白话文的。我在一师一年半，受到他们的益处最多。他们所手改的我的作文，尤以朱先生，改得最多最勤，我一直保存到抗战，才因杭州沦陷而遭损失。

王祺先生，字淮君，别号思翁，原籍湖南衡阳，1890年生。头大而秃，须密而粗，两眼闪耀有光。眉长面胖，精神充沛，望之似寿者相。留学外国多年，而不着西装。服务军中，而不着军服。长衫布袜，一若乡中老儒。他讲



的一口湖南土话，并不容易听懂。但因其除授生物课外，常指点同学，习诗文字画，因而仍极受学生爱戴。他书宗古篆，杂以北魏。画宗八大山人，得其神韵。同学中凡求其墨宝者，先生概不推辞。其作书作画之时，并许同学在旁观摩，先生并亲加解释。虽彼此之间，言语不甚畅达，但见先生于下笔得意时，常手不停挥，口不停讲，同学则无不感佩赞叹。

先生又常率同学游西湖，是否曾在其班上听讲者概不论。游湖必步行，常去者为烟霞洞。先生之好友刘师复墓在焉。墓碑为先生所书，题曰师复之墓，下署思翁。

抗战以前，我卜居南京，王先生住在碑亭巷，我到中央大学去授课，常经过他门前，乃时有往还。而抗战开始前一个月，先生竟以肺病，在原籍逝世，享年只48岁。

袁易先生字新产，浙江嵊县人。他最关心我的学业与前途。陈先生字纯人，浙江省嘉善县人。在经子渊先生担任一师校长时，曾任附小主任。

金先生与姜先生，都是李叔同先生的好友，姜先生还兼教手工。李先生在一师教过5年书，但是等我到一师做旁听生的时候，他已经于两年前，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成为弘一法师了。而我们上音乐手工图画课的课室，却还是李先生在校时的老教室。尤其是音乐教室，是一座独立的西式洋房。四围花木，一尘不染。教室的四周，皆为走廊，廊上有椭圆形的墙圈。金姜两先生常常提到李先生，说他如何善于教学，如何得学生与校工的爱戴。说教室中的一桌一椅，如何曾为李先生抚摩过。教室外的一花一木，如何曾为李先生栽培过。遗范犹存，余韵不绝。抗战期间，弘一大师驻锡福建省，我托人向他求墨宝。他听说我曾在杭一师肄业，当即允诺，惟声明不书上款。过了很久，我才辗转收到他写赠我的一副对联：

如幻如梦难分别
无垢无碍同虚空

下款是："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十住品，初发心功德品的偈颂。于时后二十年，岁在辛未，三月，调御院沙门不著，集句并书。"此联我现尚保存。

1922年春，我在一师已经旁听了一年半。袁新产先生来拜访父亲说："世兄既志不在师范，而旁听生又无学籍。现在有舒新城先生新应吴淞中国公学附属中学之聘，往担任主任，欲在校中试行道尔顿制，托我在杭州招生，想劝世兄投考。"父亲素来敬重袁先生，因为他是一位讲求朴学的教育家。而且认为我已18岁，可以出外就学，且吴淞离开杭州不远，来往甚为方便，便接受了他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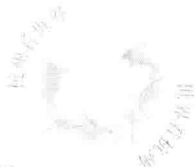
考试的地点就在一师，主试就是袁先生。在杭州报名应考的，只有三个人。考试课目为国文，试题为"我在杭州时的印象"。我记得写得很长。另考英文会话及作文。数学是代数、几何、算术。物理是考力学。皆当天考毕，并举行体格检查。过了几天，袁先生来对父亲说："吴淞校中有通知来，世兄取入旧制中学三年级下学期乙班。"后来我才知道另外两人，也都考取了，一位与我同班，一位比我低一级。我于1918年自小学毕业，在1922年暑假，本应该已可在旧制中学毕业。现在退了一级，也就是要在中学读五年。先父与我自己，都认为自"五四"运动以后，虽则未曾失学，究也已荒废了不少时间。多读一年中学，也是应该的。所以，便欣然地到吴淞去入校了。

一师毒案

1923年3月10日晚，设于杭州贡院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全体师生两百余人饭后中毒。两昼夜间，学生死于非命者22人，校役2人，其余因各界人士，奔走营救，得庆更生。我原亦在一师求学，适于前一年寒假中，考取吴淞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在3月1日赴沪转学，已不在校内。

当时的一师校长，是何柏丞（炳松）先生。他本来在校中，与教职员，一同进餐。是晚因到盐务中学晚餐，未在学校。教职员进餐的时间，例较学生为晚。而在校进膳的学生，一离饭厅，就觉得肚里不舒服。不到半点钟，所有吃过饭的两百多个学生，呕的呕，吐的吐，个个卧倒了。几位教职员，饭未吃饱，也一样的发作了。

何校长在毒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写了一篇“一师毒案之回顾”，希望：“司法官厅对于此案，不求速效，毋枉毋纵。讯研不厌求详，而证据切须确凿。总其水落石出，以快生人，而慰逝者。”但当时的杭州警察与司法机关，只图搪塞破案的责任，糊涂了事。结果是所捕厨役二人钱阿利、毕和尚（一系淘米，一系煮饭）。一个在省会警察厅侦缉队中，受刑讯毕命；一个也因为受刑讯致重伤，未及法院判决，先死于看守所。至所谓主犯俞尔衡，经三审判决，皆为死刑。在杭州第一监狱，被执行绞刑。从犯俞章法原判徒刑，因越狱再度被捕，被执行枪决。故此案连同被毒死学生工役，共死28人。先君时在杭州执业律师，曾自愿地为俞尔衡与俞章法，任义务辩护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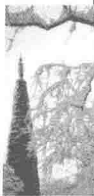


一师毒案，到今天为止，还是疑狱，也是冤狱。谓为疑狱，因为究竟为什么要对一个学校全体教职员、学生、工役，下此毒手？实在想不出其中原因。谓为冤狱，因为俞尔衡等犯罪证据，太不充分。

一师毒案发生的那一天，是星期六。北风，微雨。学生于放寒假后回校，虽已报到，尚未上课。进晚餐时，天已昏黑。毒案发生后，经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鉴定的结果，毒素系来自饭中，并断为砒毒。鉴定书中说："饭每百瓦中，发现砒毒之量，得0.03842瓦，已超过于致死量数倍。"因而就发生两个问题：一、系何人下此毒手？为何要下此毒手？二、此大量砒素，从何而来？

关于第一点，杭州省会警察厅先逮捕了淘米与烧饭的两个厨役，最初并未获得供词。继逮捕了在校学生俞尔衡，乃于刑讯之下，得到两人的供词，谓系俞所主使，得酬洋30元。此款已送交两人中之一的父亲，其人住杭州闸市口。后经调查，并无其事。

至于俞尔衡的被嫌疑下毒，则有三项证据：一、俞是日未在校吃晚饭，并曾在下午约一同学出外晚膳，同学未允约。俞曾警告其谓如不出外去吃饭，必有后悔。是则俞事先已知道，晚上将发生毒案。但此被邀之同学，已在被毒死之22名学生之列。当时的谈话，据云为同室之另一同学所听得者。二、次日早晨，俞尔衡自外回校，全校师生都在悲愤之中，而俞独面有喜色。三、俞在上学期，任全校学生自治会膳食部干事，亏空公款300余元。学生自治会催其缴还不理，在放寒假前开大会时，将其开除会籍。俞因曾主办膳食，故与厨房中工役，向甚熟识。及至俞章法被捕，乃又多一证据，即：四、俞尔衡曾邀俞章法商量下毒之事，时间是某日黄昏后，有微雨，地点在三元坊荐桥街口羊坝头一带，两人且走且谈。俞章法劝俞尔衡不要



下毒，尔衡不听。章法乃谓如一定要做，可在星期六晚饭，因在校进膳的同学较少也。此项谈话，为一师另一同学适坐人力车经过羊坝头，在车上听到者。且因天雨，车旁及车前，均放下油帘。以后俞章法初未判死刑，即系因其最后一语，故量予减轻其刑。

俞章法与俞尔衡，都是诸暨人，为远房本家。章法其时已在一师毕业，在设于东平巷的省教育厅工作。尔衡被捕后，因其平素来往颇密，故到教育厅章法房中搜查。据云在字纸篓中，搜到章法亲书字条："尔衡难逃法网，我将避赴延龄。"从第一句可知其事先知情，从第二句可知其畏罪情虚。但据章法辩称：自尔衡被捕，同乡、本家、亲戚，纷来探询，并集议营救，不胜其烦，想搬到延龄旅馆去住。延龄旅馆在法院前面，足证并非远逃。至第一句系文字欠斟酌，因为随手所写，随即投入字纸篓，并无顾忌，也未烧毁，足见是无心之笔。至二人在闹市步行商量下毒，另一人乘有油帘之人力车拉过，可以听得如此详细，更是情理以外之事。

关于第二点，毒品从何而来？经调查结果，杭沪各大药房，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大批砒素卖出。而且购买砒素，必须由医生签字，分量亦决不能有若是之多。于是便推想到学校中有无砒素，结果是有的。砒素一瓶，系光绪末年筹办优级师范学校时，向日本买来，向放在学校化学室的里面一间。用到1923年，还没有用完。化学室的锁是德国大锁，有两把钥匙。一把由化学教师保管，前一学期教师，是陈邦材（乃恭）先生，他在寒假中辞职，钥匙送还教务处，挂在教务处墙上，毒案发生后已经不见。系何时被何人取去，无人知道。但法院所据以为判决的，并不是这一把钥匙，而是说俞尔衡在新水漾桥一家五金店中新配的。无论不带锁去而配钥匙，不会合用。而且一把特殊

的大锁，五金店中必不能随时可以配到钥匙。后经调查，这一家五金店在毒案发生前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这笔买卖。法院所得的供词，是侦缉队用刑讯而来的。毕和尚与钱阿利送法院后，又为警察厅的侦缉队提回，就是为了在法院不便用刑。还有另一把钥匙，则一向由化学室老勤工保管。该老勤工自学校开办，即到校服役，对于化学，也懂得不少。但不幸这位老勤工，也被毒死。他所保管的钥匙到那儿去了，没有人能够知道。

再据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则在上一学期学校花园中，曾打死一只狐狸。生物教师王淮君（祺）先生，即在大礼堂前面，用砒素将死狐腹内消毒，制成标本。其时俞尔衡年级尚低，上不到化学课。这时因系课外解剖，学生围观者甚多，故亦在旁伫看。王先生当时持砒素瓶，向学生解释其毒性。围观的学生中，就有人说道：像如此毒性，岂不是一瓶药可以毒死许多人。毒案发生后，有人说当时这句话，就是俞尔衡说的，足见其蓄谋已久。但要说俞尔衡知道化学室有砒素，可以说是从这一次起。要说他当时说过那样一句话，可就无法认清，也无法证明。即是他所说，也只是一句戏言。因为法院认定俞尔衡要毒死全体师生，是为了学生自治会开除他的会籍。而解剖死狐，则远在开除会籍之前，因果未免颠倒。1931年以后，我住南京，曾数次问过王淮君先生，他承认剖死狐做成标本，但对于有人说过一瓶药可以毒死许多人，他坚决地说并无其事。因为当时许多学生围观，并不限于上课的一级，完全是好奇心。他一面动手解剖，一面讲解，学生都用心静听。尤其他不认识俞尔衡，他说更不能武断有人在那个时候，就存心要下毒手。

又据法院的认定，俞尔衡既知道化学室中，有一瓶砒素，遂于寒假期满到校后，与厨役商量下毒。他自己向新



水漾桥的五金店，配了钥匙。在放毒的前二天晚上，学校已经熄灯之后，一同到化学室中，去偷取毒药。据说，俞尔衡走在最前面，厨役之一，手持白色洋蜡烛，走在最后，先进入第一间，再进入里面第二间。俞尔衡乃指向厨役说，就是上面橱的某格中的某瓶。于是厨役就用化学室中木梯登高，开了玻璃厨门，将瓶取出打开，倒了许多砒素在预先带去的纸上，而后下梯，相偕走出化学室，仍将门锁好。星期六晚饭米，既淘好下锅，遂在将煮熟的时候，由厨役将砒素放入，并用勺拨匀。因此凡是吃到饭的人，都中了毒。但是经调查结果，这一段完全与事实不符。第一、厨房离化学室很远，而且厨役不只二人。半夜三更，俞尔衡到厨房中，约了两个人，要穿过好几所教职员与学生的宿舍和自修室，何以无人惊醒？又三人并未点灯携火，如此曲折长路，在从无机会到化学室的厨役，又如何摸索？第二、厨役既持蜡烛，何以在入室之后，反走在后面？并且地上没有丝毫蜡烛油的痕迹？化学室的木梯，及玻璃橱，经过两个月寒假，没有动用过，都有了灰尘。如经移动，也决难还原。否则，灰迹也必有深浅。而经检查结果，连所谓放砒素的瓶底圆形灰迹，也都没有移动的迹象。第三、俞尔衡虽则可以知道化学室中有一瓶砒素，但他从未入过化学室，何以会知道在某一橱某一格？又何以知道室中有木梯，并且登梯可以开橱？而在昏暗午夜中，只凭一支烛光，就能指挥若定？还有最使法院判决失却根据的，就是依据化验结果，饭中所含的砒素，总量相当可观。而化学室中的一瓶，从光绪末年学校开办起，一直用到1922年底毒案发生之后，瓶中所剩还有很多，足见饭中的砒素，不是从学校化学室中得来。

我不敢一定为俞尔衡等呼冤，但是天下决没有为了300元钱的事，要毒死全体教职员、学生，以至工役数百

人的道理。何况上面所引证的法院判决依据，的确无法使俞尔衡等折服。在俞尔衡执行绞刑后半年内，承办是案的浙江高等审判厅熊庭长，忽然在龙翔里寓所，得急病而死，一时曾引起许多有关果报的传说，这自然也不足为信。

在毒案经法院判决之后，杭州坊间曾出版有《一师毒案纪实》一书。所谓纪实，也只是将报章杂志的刊载，汇集成篇，编者并非知道实际的真相。1946年7月，于何柏丞先生在上海逝世后的第三天，我在杭州保佑坊的一家旧书店中，买到了这本书。书中载有署名旅沪杭人，责备一师前校长经子渊（亨颐）先生，在校提倡学生自治，因而引发毒案的文章，又载有刘大白先生为学生自治辩护的两篇文章。另有杭州当时的报纸，反对于厨役已送到法院之后，再由侦缉队提回审讯的两篇社论。

一师毒案，至今仍是疑狱。1929年至1930年间，我与吴敬生（春桐）兄，都住在巴黎郊外"加香"村。二屋相距不远，时相过从，也曾屡次谈到毒案的事。敬生兄曾说过，他曾听另一人说，何校长实在知道其中内幕，惟尚不能发表。我因之于回国以后，历次问柏丞先生，他究竟是否知道真相。他一再恳切地说，他实在不知道。1946年6月17日上午11时，我到上海中华学艺社去看他，他已病得不能起床。我再问他毒案的事，我想一则事隔多年，二则他已自知不起，如果他真的知道有什么内容，一定可以对我直说了。而他还是郑重地说，的确不知道。现在，何先生又已去世了多年，则一师毒案，只能永远成为疑狱了。

杭州大学

浙江省的高等教育，始于清季之高等学堂，地址在杭州蒲场巷。陈布雷、蒋梦麟、郑晓沧（宗海）诸先生，皆是该校的高材生。

辛亥光复以后，高等学堂停办，直至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始有浙江大学的设置。因之，在民初10余年中，浙江以一省之大，3000万人口之多，竟迄无一所公立大学。

民初时期，浙江只有四所专门学校，即法政、工业、农业、与医药。另有一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系先君等于清末所创办，并由先君任校长，此为全国最早的一所私立的法政专校，这些专门学校，均设在杭州。公立法政在马坡巷，工专在报国寺，农专在城外笕桥，医专与私立法政均在下城刀茅巷。每校学生人数，均不甚多。各校合计，不致超过1000人。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浙江教育界人士，曾多次努力，思创办一所大学。1923年，蔡孑民（元培）、蒋梦麟先生等回到故乡，向省政当局建议，浙江应该有一所大学，免得想入大学求学的青年，远的要到北京，近的要到上海。路程远，费用多。家境清寒的，实不胜负担。省政当局因为蔡先生的面子，便同意其意见。并由省议会，通过了筹设计划。

不久，由省政当局聘定了筹备委员9人，蔡蒋两位先生与先君，均在内。第一次筹备会，在省长公署举行，决定名称为杭州大学，地址在万松岭敷文书院旧址。先君在

会议中，力主男女同学。省长张暄初（载阳）问：“不防男女学生谈恋爱耶?”先君谓：“男女皆大学生，若成婚配，亦属门当户对之事，又何必防?”

万松岭是由杭州西湖通钱塘江江干的大道。南宋的故宫，在其附近。南宋时，曾在岭上建有孔庙，后毁于兵火。敷文书院也是南宋以来的讲学之地，却也早已片瓦无存。岭上松树特多，与西湖上的九里松，同以松树著名。其地可以左眺钱塘江，右瞰西湖。风景佳胜，确为治学的好地方。

杭州大学只开过一次筹备会，便没有了下文。蔡蒋两先生，又回北京去了。省政当局本无诚意，省议会中也再不提起。这是胎死腹中的一所大学，在历史上，恐很少有人知道。

1927年以后，当局将浙江划为第三中山大学区，合原有的各专门学校而成，以蒋梦麟先生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兼省政府委员，再兼大学校长。并照法国制度，兼掌全省教育行政。不久，恢复成立省教育厅，蒋氏任厅长。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以清末的高等学堂在蒲场巷的原址，为校本部。邵裴子（长光）、程天放、郭任远、竺藕舫（可桢）诸先生，先后担任校长。

抗战胜利之后，蒋慰棠（复聪）兄自重庆回到杭州，为其令先叔百里（方震）先生之灵，察看葬地。我建议葬于万松岭，慰棠兄当表赞同。又，国立浙江大学因原有校址，不足发展，思另行迁地，重新建校。我也曾向竺校长建议，改设于万松岭。并曾数次陪同他去寻访敷文书院旧址，他也表满意。因为我们在岭上登高一望，可见到一面是钱塘江，一面是西湖。一面是蜿蜒曲折，大江东走。一面是湖平如镜，水波不兴。一面是片片帆影，力争上游。一面是款款归舟，随波荡漾。一面是两岸沙平，极目无



际。一面是绕郭参差，楼台上下。一面是深黄，一面是翠绿。而我独立山头，只觉得左右逢源，美不胜收。我想我们假如求得真知实学，也到了这样的程度，那才是最大的幸福，最高的智慧。孔子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并写了一首诗：

江上帆兼湖上舟，风光左右一齐收。
峰高好揽群山“胜”，独立人间第一“流”。

《胜流》原是浙江行政学会于1945年元旦，在浙江省临时省会云和创刊的半月刊，以提倡力学为宗旨。抗战胜利，移杭出版，初在崔家巷，继迁岳王路。在第三卷开始时，编者曾将第一与第二两卷合订本，要我题字，我写了“胜利已临，流风是慎。力争上游，惟学是竞”四句。并加以解释谓：“胜”是竞争的结果，进步的象征，也更是力量的表现。抗战的胜利是如此，刊物的发达是如此，学问的成功也是如此。至于“流”，则是新陈的代谢，向前的行进，百川的汇合。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谓川流不息，所谓流水不腐，意义都是如此。更进一步说，凡能胜人一筹的，流风所被，影响必定较大。凡能流动前进的，也必定较之静止退后的，为胜人一筹也。

我在国立浙江大学

浙江省的高等教育，实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由杭州府知府林迪臣（启）任总办的求是中西书院。校址在杭州蒲场巷的普慈寺，另增建新式洋房数栋。延美国人王令赓授英文格致化学，以华教习授国文算学经史。其时学制未立，课程无一定之标准，学生亦仅三五十人。二十五年，林启辞职，总办改称总理，由杭绅陆懋勋继任，添筑学舍。二十七年，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易总理为监督，以劳乃宣充任。二十八年，改称浙江大学堂，学生增至百余名，岁费库帑1万两有奇。二十九年春，学潮作，学生离校，劳乃宣去职，停顿者数月，是为浙省学潮之第一声。嗣由陶葆廉继任监督，改大学堂名称为浙江高等学堂。三十一年，陶葆廉去，陆懋勋继任监督，扩充学额为200名，分高等预备及师范完全两科，并附设师范传习所，于是学科始备。三十四年秋，师范完全科及高等预备科及高等预备科第一次毕业。添办高等正科，分文、理二系。聘外国教师分任英、法、德、日语文及外国史地物理化学等教科，颇具文理学院之规模矣。其时学生增至300余人，岁费库银2.38万余两，毕业学生3班。监督吴震春、孙智敏，校长邵裴子、胡若愚先后继任。

浙江高等学堂，造就人才甚众。如邵翼如（元冲）、邵飘萍（振青）、陈布雷（训恩）、郑晓沧（宗海）、蒋梦麟，皆是该校的高材生。

辛亥光复以后，浙江高等学堂停办。直至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始有浙江大学。因之，在民初10余年



中，浙江以一省之大，竟迄无一所国立或省立大学。

其间有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初名法政学堂，地址在杭州马坡巷。先父自日本归国，最早即在此校任教。校中分法律政治及法律专修科、政治经济专修科。1927年，浙江临时省政府会议，决议法专停止招生，改名为训政人员养成所。因校中师生反对，遂又决议办至原有学生毕业为止。以后，乃就原址改设地方自治学校，属民政厅，由厅长朱家骅兼任校长。朱同时创办浙江警官学校，亦自兼校长。前者因朱氏调至南京服务而结束，后者则于抗战前二年，归并于南京之中央警校。

1921年，创设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初浙江原有甲种工业学校，在杭州报国寺。至是废甲种名称，即就原校校址改办工专。原有甲种各科，仍附设在内，办电机、机械、应用化学三科。入学资格为旧制中学毕业，修业期限三年。同年，原设在城外笕桥之甲种农业学校，亦改名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设立于1912年6月，先招收医科学生，次年招收药科学生。1920年，拨省款7万元，建筑新校舍。1922年，附设诊察所，供实习之用。1932年，建筑医院。自开办以来，成绩卓著，医药毕业学生之服务于各地者甚众。

另有一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在杭州刀茅巷，系先父等于清末所创办，并由先父任校长，此为全国最早的一所私立的法政专校。却于1922年间停办，因省议会将其省款补助费删除，事实上系执政当局对先父的从事革命运动，有所疑忌，授意省议会删除的。

此外，尚有校址在浙江，而非浙江省政府所设者：一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曰私立之江文理学院。艺专

初名艺术院，创设于1928年8月，次年10月改今名。之江文理学院，为美国教会所设立，其前身为清道光二十五年创立于宁波之崇信义塾。同治六年，迁至杭州，增设高等班级，改名育英书院。宣统三年，迁钱江边之闸口，遂因地滨钱江，改名之江学校。1920年，改称之江大学。1927年，以其不合省政府所订办法，停顿一年。1929年秋，复校，改今名。仅设文、理二科。1930年，照部章，推举中国人为校长，1931年秋立案。抗战发生，迁至上海租界，易地开学。胜利后，仍迁回杭州。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克杭州，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先成立浙江临时省政府，后改为正式省政府。当时不设教育厅，而用大学区制，浙江为第三中山大学区，由大学校长蒋梦麟，兼司全省教育行政，盖系采自法国制度。

大学区制在南京首遭阻挠，国府本拟将北伐前设于南京大石桥之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区，卒因东大校友坚决反对，以致不成，遂改名为中央大学。在北平亦因北京大学校友，反对合并于北平大学，北京大学，遂亦仍独立设置。各省大学区制，乃亦只得先后撤销，在省政府内恢复设教育厅。在浙江第三中山大学成立时，系合并工专、农专，改组为工学院、农学院，又另设文理学院。第三中山大学撤销，乃改称浙江大学。大学虽为国立，然如校本部及文理学院之所在，原为高等学堂之旧舍。工学院之校舍，原为省立工专之旧宇。工专一切设备，亦均为工学院所利用。而浙江省政府，又每年协助款项。则不可谓与省方无相当关系也。

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后，先后由蒋梦麟、程天放、郭任远、竺可桢任校长，皆系我的好友。抗战期间，浙大后迁至遵义，而在浙南龙泉县的芳野，设立分校。我曾多次应约，前往讲演，并帮助解决经费、食米、校舍、医药卫生



等问题。

抗战胜利，浙江大学于1946年，自贵州迁返杭州。校长竺藕舫（可桢）先生来我家中见访，谓浙大决增设法学院，请我为之筹备，并担任首任法学院院长。我以浙江法政教育，原由先君创始,自公私立两法校停办，浙人每有呼吁复校者，我皆表赞同。英大虽已有法学院，但不在杭州。我为了继志述事，欣然接受。于是我为之草拟设院计划，厘定课程，聘任第一年各课程教授。是年暑假，招收第一班学生。但我在未能将民政厅职务辞去之前，我尚只能在事实上帮忙，不能公开居院长名义。我一面向中央请辞现职，一面经常到浙大去，处理法学院院务，并自兼授法学通论课程。延至1947年暑假，将招第二班新生，我辞现职事，仍未获核可，只得向竺校长辞去院长，竺乃改聘李浩培先生担任。

浙大自迁返杭州以后，因原有大学路（原名蒲场巷）校址不敷发展，亟思觅地另建。我乃向竺校长建议，以万松岭敷文书院旧址，为浙大建校新址。此亦即为1921年，浙人初议创设杭州大学时所预定之校址。我曾陪同竺校长登万松岭数次，察看地势。竺亦以其地左江右湖，且为宋代讲学之地，颇表满意。地系杭州市政府公地，省府可以下令拨用。但浙大系国立，故建筑经费，必须请由教育部拨发。教育部因复员事多，正值法币日益贬值，迄未能办。

私立新群高级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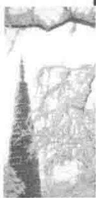
私立新群高级中学，系浙江行政学会同人，于1940年4月，在当时的浙江省临时省会永康县的诗后创立，推我任董事长。6月1日，奉到浙江省教育厅准予立案的命令，校董会乃决定以是日为校庆纪念日。新群当时创办的目的，是为了救济战地的青年，使其免于失学。并请余樾园（绍宋）先生为撰校歌：

一、汪汪学海，广博无垠。今来求学，敢惮苦辛。躬行实践，期作完人。群策群力，作新斯民。群策群力，作新斯民。

二、泱泱祖国，吾辈至亲。欲求光大，舍学奚循。发扬蹈厉，其克艰屯。维新维群，为国之魂。维新维群，为国之魂。

三、新新我校，今喜同群。惟学是务，惟德是尊。兴亡之责，端在一身。宏我新国，范彼群伦。宏我新国，范彼群伦。

抗战胜利，新群高中移至杭州，初借汪庄复校。后在南山路，自行兴建校舍。余樾园（绍宋）先生，为书基石。1948年4月，第一期工程完成，杭州市政府编订门牌为南山路一号。此为抗战以后，杭州市的第一所规模宏伟的新建筑。余先生又为亲书校名，刻于正面的二楼与三楼之间。二楼全部为礼堂，从其西窗而望，全湖在目。湖上的名胜风景，一览无余。再从南窗而望，则吴山、紫阳



山、万松岭、玉皇山、南屏山、南北高峰，适成为一半圆形，环拱而立。有湖不远，可得随时荡漾之乐；有山不近，可免开门见山之讥。而且西湖的风景，本来是南路胜于北路。北路的风景太露，不幽深曲折，少丘壑林树。故历代名人题咏，皆盛道南山之美。从北面而望，则正当已建与待建的五条公路之中。适为南山路的开端，由此经南屏路而达理安，沿途古刹、名山、清泉、高塔、深洞、曲溪，真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而在钱江之滨，越大桥以达浙东，更为两浙交通咽喉之地。东面，则为经万松岭而达南星桥的大道，为以后的京沪杭、浙赣两路联合车站之所在。溯京沪杭铁路而北，可接京沪、津浦、陇海、北宁及国外诸线。更可通韩国、日本、苏联、欧洲。由浙赣路而西，可连粤汉、湘桂、黔桂、川黔、闽赣、闽粤各路，凡长江以南各省，均可计日到达。所以新群校址所兴建，选择的地点，真是得“地”独厚，并非偶然的。

我为礼堂撰联：

握手言欢，皆旧识新知，当湖山佳胜；
会心不远，要合群力学，共风雨中流。

此联不仅含有“学会”与“新群”四字，且含有学会所办的刊物“胜流”二字。

1948年7月1日，我交卸了公职，新群高中校董事会推我兼任校长。我也想全心全力，将新群高中办得更好。故凡南京、上海各地友人约我前往任事者，概予辞谢。1949年初，新建校舍全部竣工。

其时，江南在兵荒马乱之中。2月，我全家来台湾。4月，新群高中停办。

协和讲堂

协和讲堂在杭州大方伯，是英国人梅藤更建筑的。

梅藤更原籍苏格兰，据说是在其本国犯了法，逃到中国来的。

梅藤更于清光绪年间到了杭州，在杭州城中心，开设广济医院，并且自己简称为大英医院，老百姓乃亦随之呼为大英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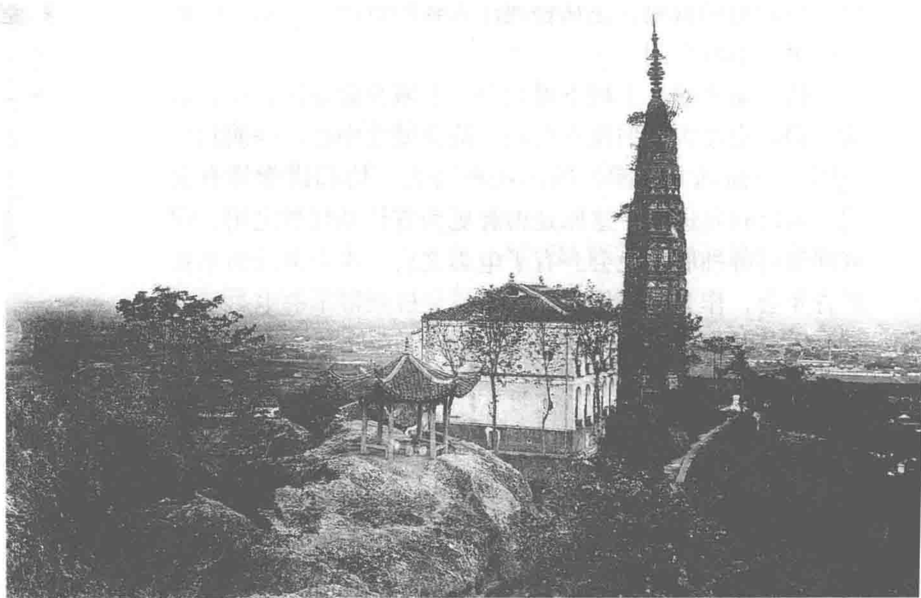
当时因为不平等条约的限制，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内地购置不动产，但医院、教会与学校为例外。梅藤更藉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到了杭州，气焰甚盛。清政府的官吏，正从轻视洋人到畏惧洋人，对于梅藤更的事，不敢多问。

杭州城内原有上城下城之分，上城为商业区，较为繁荣。梅藤更在大方伯设立医院，适在城之中心。一面到马市街，一面到方谷园，所占面积甚大。协和讲堂另有大门，可以独立进出。这原是梅藤更为宣传基督教之用，间或亦举行各种展览晚会。有了电影之后，也常常借给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放映场所，可以说是杭州最早的电影院。

惟其时尚系默片时代，国语片亦尚未出世。片子并无中文字幕，需由另一位先生，坐在放映机旁特备的高椅子上，随着剧情的发展，作口头的说明。所映的片子，以非洲探险或猎奇的为多。常常连演十余天，故事虽则连续，内容却很少变化。后来，基督教青年会在青年路的新会所落成，电影乃改在屋顶平台放映。但限于夏季的晚间，遇到风雨之夜，只有停止。1928年春末，我与朋友们发起，

组织现代剧团，放映《党人魂》影片，仍系借用协和讲堂演出。

清末，梅藤更在西湖宝石山上，保俶塔旁，建筑一所麻疯病院。其理由是麻疯病人需要隔离，所以建在山顶上。杭州士绅以西湖为风景名胜之区，而保俶塔尚系钱武肃王时代所建，已有千年历史，更为古迹所在，自不能在其旁设立麻疯病院。于是群情愤激，要当地官吏与梅氏交涉，将房屋拆除。最初官府畏惧洋人，不敢交涉。后因民间情绪高昂，如不接受士绅请求，将生事端，方向梅藤更提出说情。梅最初以依据条约有权建筑医院，且院屋业已建成，不允拆除。后有鉴于民情激昂，知不可侮，乃允将该屋交还地方，由政府赔还其建筑费用。这是西湖山上最早的一所五开间洋房，立于保俶塔之旁，后乃成为游人休息之所。



塔边的二层建筑便是麻疯病院

梅藤更又自置小型马车，常在杭州城内与西湖上驰骋，这也是杭州最早的马车。车行过处，路人侧目。杭州与苏州，虽则同称为天堂，但苏州阊门外马车特别多，游客可以乘往虎丘，蹄声得得，别有风味。杭州却一直未能扩展马车。民国初年，曾有商营者二三辆，不久即遭淘汰。

20世纪20年代末，梅藤更退休回国，这时他已逾七十，且在中国发了不少财，真是衣锦荣归。临行之前，他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我其时正在中学读书，方年十五六岁，由先君带同，前往参加。梅氏在宴会进行中，用中国话起立致词，谓："杭州人是进步得多了。记得我初来时，大家叫我洋鬼子，后来叫我洋先生，再后来叫我洋大人。"我听了异常气愤，梅氏讲完后，我即起立发言："这是因为梅先生进步了。梅先生初来时，挟帝国主义之力量，欺侮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称你为鬼子。后来梅先生以平等态度对待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称你为先生。至于称梅先生为大人，我没有听见过。况且中国自革命之后，在中国人中早已没有大人的称呼，怎会还称外国人为大人呢？我想，这是梅先生自己杜撰的。"我说完了坐下，先君首先鼓掌，许多父执辈也跟着鼓掌，梅藤更又站了起来，仍用中国话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杭州，特抽暇去参观广济医院与协和讲堂，已改由中国教会人士接管。医院对人民健康是有贡献的，讲堂则因杭州的新建筑增多了，相形之下，已有破败零落之感。

基督教青年会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民国初年，会址原在大方伯，与广济医院为斜对门。会所不大，开大会或放映电影时，要借用协和讲堂。至西湖滨的新市场开辟，乃建筑新会所，大门在泗水路与杭县路转角（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杭县路改名青年路）。大门之上有一钟楼，惜大门太小，汽车不能进入。新会所系四楼洋房，底层为办公室，有杭州当时前所未有的淋浴设备。二楼为教室及餐厅，也是杭州当时少有的西菜与冰淇淋供应之所。三楼为单身宿舍，收费甚廉。四楼为会议室。会所落成之日，浙江私立体育专门学校校长王卓夫，曾撰一联为赠，悬于楼下大厅。句为：

此杭州最新建筑
是青年第二家庭

抗战胜利以后，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因原来在高乔巷的省议会会址，自北伐后，即作为国民党省党部办公之用，先在孔庙，继借青年会为会址。国民党中央派叶楚伧、钮永建两氏宣慰浙江，欢迎大会就是在青年会的楼上举行的。其时叶氏已患病，未能到杭，只有钮先生一位到达。

我重到青年会，见王校长所写的对联，已在抗战中失去。乃请省参议会副议长余樾园（绍宋）先生，照原句重写一副，加上跋语，用木板刻成，送给该会，仍悬在原来位置。

先君是对青年会会务最热心的一人。民国初年，每年征求会员，先君皆是成绩最优的一队。他的名字，常刻在会中的铜牌上。抗战胜利之后，那些铜牌依旧嵌在楼下的墙柱中。先君并非基督徒，他曾屡次向会中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会员既不分教友与否，同样地缴纳会费，为什么会中的选举，只有具有教友身份的会员，才能有权投票？会中负责人谓世界各国青年会，皆系如此。先君认为不公，乃联合地方教育界人士，另组浙江省青年团，以杭州平海路省教育会为团址，此当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我自幼即由先君介绍，为青年会会员，嗣为其所发起的青年团团员。

青年会设有英文补习夜校，我少时曾多次入校补习。教师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同学，则以各银行的行员为多。美国人中有鲍乃德、伍立夫、明思德等，前二人系青年会干事，后一人系教士。抗战胜利后，伍立夫曾到杭州。1956年，鲍乃德曾到台湾，我皆曾欢宴，他们都还记得先君，并且都说老话："从幼年看见你长成的！"

四拐角

四拐角，系杭州清河坊大街与望仙桥直街交叉之十字路口，为杭州最繁盛商业区所在地。清河坊大街，乃系杭州南北向主要大街之一段，出鼓楼即可达江干。右转入大井巷，可登吴山。左转过望仙桥，可达宗阳宫一带。杭州较大商店，多在保佑坊与清河坊之间。

四拐角，有杭州最著名的四家大店铺，各据一方。其一为翁隆盛茶叶店，专售杭茶。杭州茶叶，以产自龙井者为最上。龙井之旁有翁家山，亦以产茶名。龙井茶叶系绿茶，最名贵者，为在每年春季谷雨与清明两节前所采者，称为雨前与明前。产量甚少，而翁隆盛有之。

其二为宓大昌，专售烟丝。在香烟未流行前，民间多吸旱烟与水烟，则以宓大昌所售之烟丝为上品。吸旱烟用细长之竹管，吸水烟则用精制之烟袋，并用纸煤取火。搓纸煤与吹纸煤，皆需特有之熟练技巧。所用之纸，系黄色薄纸，亦系专制。我从不吸烟，不知宓大昌烟丝优点何在。但我在杭州时，外地亲友托购烟丝，必指明非往宓大昌不可。

其三为方裕和，专售火腿、咸肉。浙东各县，皆产火腿，而以东阳县为最多。金华府属各县所产者，皆以金华为集散转运之地，故外间皆名之曰金华火腿。方裕和门内有一既大且高之圆木，备临时斩割火腿之用。所用之大刀亦系特制，一人持之挥舞不停，可见其营业之盛。杭人节俭者多，虽到方裕和购买火腿，每只购一段，尤其以买“上腰方”或“筒儿骨”者为多。此为火腿之最精华部分，价亦稍高。

浙江向有一缸火腿中，必置有狗腿一只之说。金华兰溪一带，以狗属戌，故称为戌腿。我在金兰时曾见之，较一般火腿略小，却未敢尝试。方裕和是否亦售戌腿，则已忘之。又浙东各县，亦有特制竹叶腿者，尤以浦江与松阳两县所制者为著名。此乃家庭副业，用猪腿以竹叶生火熏之，其味特别清香，方裕和似亦有售，因产品不多，故价亦较昂。

其四为孔凤春，为旧式之花粉店。昔年化妆品种类不多，用者亦少。因顾客以女性者为主，我似从未入内，只经过其石库大墙门门前多次而已。1927年春，孔凤春店东孔继荣，已七十岁，忽动官兴。与其老友陈蔼士（其采）先生，适担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思谋一职。陈乃派为萧山县茧捐局局长，此乃临时差使，蚕茧下市，即行裁撤。萧山为当时杭州中国银行行长金润泉（百顺）之故里，金介一人为孔助。而此人沿捐局恶习，向商人索陋规，为乡民检举。浙江省政府组设特别法庭，予以审问，判孔有期徒刑十年，遂病死于看守所中。孔凤春经此打击，营业乃远不如前。

抗战以前，杭州市政府将清河坊大街，自原有之石板路，改筑为柏油大道，路面放宽。因此四拐角之四家大店，均行后让，门面亦皆重新翻建。但孔凤春与方裕和，仍用石库大门，胜利之后，我犹常过清河坊大街，则以向翁隆盛买茶叶之时为多，其他三家，殊少有与之交易也。

佛千先生词云：

四拐角

四拐角，最繁华。翁隆盛，雨前茶。宓大昌，烟丝众口夸。　　方裕和，好火腿，出金华。孔凤春，售脂粉，售绒花。合成四大家。

舒莲记

近年因风扇与冷气过于普遍，故折扇已与我们的生活绝缘。但在我等少时，每逢暑季，则持用之者甚多。最普通的，也必有一柄白纸扇。折扇的长处，是可以折叠，所占空间不多。并且随时可以张开，毫不费力。扇骨多数用竹制，亦有各种特别的制品，并再镶以装饰用品者。扇面则概用纸制，颜色品种，亦有许多差异。

折扇的扇面大小，扇骨的枝数长短，皆有种种不同。一般人每只以之为清风徐来的工具，而文人雅士，则以之为互相馈赠观摩的艺术品。昔时友朋夏日见面，常先请对方准予交换借阅，并相互欣赏扇面上的书画。扇有两面，通常一面为绘画，一面为书法。书画多出于两人之手，亦有由同一人兼为之者。于是各自解释书者何人，画者何人，两者间之关系如何？既有比较，便有批评。往往以一扇之事，可作半日之谈。

杭州所产扇子，为江南所著名，尤以舒莲记所制者，最为上乘。舒莲记在清河坊大街，石库墙门，规模宏大。我在吴淞中国公学求学时期，有同学名舒昌绪者，即系舒莲记之小老板。每逢暑假返杭，舒常约至其店中参观。其时舒之尊翁尚在堂，每导观店后之作坊。始知一扇之成，全恃手工，且过程并不简单，舒有长兄，继承父业，其本人则对于制扇，似兴趣不高。舒莲记所制之扇，并不限于折扇。而在折扇中，有专为和尚使用之大型红油纸扇，可纳于宽大的僧袖之中。有专为置于西服口袋中之小型黑油纸扇，此两者皆不加书画，遂称为素扇。亦有专为女性使

用之檀香扇，则香随风生，人与香至。当时售价，并不便宜。舒君则每年以一扇见赠，式样由我自选。如欲求杭沪名书画家书绘扇面，舒莲记亦可代求。其墙上贴有润格，不另收代求费用。

抗战以前，杭州已另有王星记扇子店，即在舒莲记附近。制品与声誉，渐渐与舒莲记相齐。我以昌绪兄关系，凡外埠亲友托我购扇，仍必到其店中。抗战期中，杭州为敌所占，昌绪兄避难至永康。店为他人侵占，仍行开业，而制品已不如前。胜利回杭，昌绪兄之尊翁已逝世，由其兄收回自营。终因原有设备损失过巨，物价上涨，补充不易。加以技术人员星散，一时难以罗致，出品未能恢复战前水准。

我以平时爱好书画，常觉求人作大幅者不易，一扇之求，易于获得。因之，常到舒莲记购买各种扇面，以便随时应用。如龙游余樾园先生，即曾于战时，为我绘扇面数页。其中一页系用青绿色，绘严陵钓台。扇页虽小，而气势甚伟，堪称难得。来台以后，曾思于每一省中选友人二人，一绘一书，为我合写扇页。每省一扇，亦可得数十面。

某年夏日，见有自港来朋友，手持一扇，谓系最近在市面上所购。察其扇面第一行所印暗字，则固仍为舒莲记之产品，想见该店仍尚存在。惟制作粗糙，大逊昔日，至昌绪兄昆仲，更不知如何矣！

佛千先生词云：

杭州扇子

清河坊，最有名，“舒莲”“王星”。竹为骨，纸为面，清风随手生。　扇中作画，难布局，转能精。临风乡思深，更兴怀古幽情。

机神庙

杭州素以丝绸著名，所产者有绸、缎、锦、绉、纱、罗、绢、绫等类。缎之嵌花者，称为摹本缎。从一花到五花，用吉字好音为图案。如四季富贵、福禄寿喜等。

杭州市缫丝与织绸，原多为家庭手工业，而集中在下城一带。所用工具，皆系木制。缫丝者多为年轻女郎，杭州人称之为“湖丝阿姐”。其法系将丝通于口腔中，藉唇舌之熟练，辨别选择丝质的粗细。因之易有病菌传染，染料亦可能有毒。故于妇女健康，系属有碍。

织绸者，多为青年男子，杭州人称之为“机房司务（师父）”。里巷之中，机杼相闻。民国初年，杭州始有用机器缫丝织绸之工厂，名为纬成公司，亦设于下城，地名刀茅巷。先君亦为发起人之一，并连任董事多年。实际主持其事者，为朱谋先（光焘）先生。抗战期中，停顿八年，战后复工，历经艰苦。

抗战期间，油、茶、棉、丝，为浙江省四大特产。初由省政府设处管理，继由中央直接管制。胜利以后，因育蚕各县桑树，均在沦陷期中，为日人砍伐殆尽，需重加补植。而蚕种须待中国蚕丝公司独家供给，蚕茧则亦须待该公司统一收购。办法多更，币值不定，以致蚕户皆有“作茧自缚”之叹。

杭州以往既盛于织业，故有机神庙。庙在张御史巷，祀褚登善。按，新唐书载登善有二子，名彦甫及彦冲，迁居钱塘，始教民织染，后遂奉为机神，并其父祀之。今犹有褚姓者，为奉祀生，即居庙侧。阮文达撰褚公庙碑，详

载此事，当必有本。苏州亦有机神庙，庙在祥符寺巷，则祀张平子，不知其由。史称平子善机巧，尝作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崔瑗为撰碑文，称其制作侔同造化。又云：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意者。机杼之制，当时或有所发明，而载籍勿详。按，当时以七月七日祭机杼，奉织女为机神，似较有诗意。

杭州从事丝织工作者既众，故皆有公会组织。丝业者，在艮山门外定香寺。丝织工业者，在东清巷59号。绸业者在银洞桥，称为绸业会馆，规模宏大，常为杭人借用为结婚礼堂或宴客之用。胜利以后，举办杭州市参议会议员选举，丝织工会曾选出参议员一名，系真正从事木机织绸之工人。

杭州出售绸、缎、绫、罗之店铺，集中于清河坊一带。另有张允升，则专制售五色丝线，兼营帽子，亦极为著名。

佛千先生词云：

机神庙

杭产最驰名，绸缎锦绉纱罗绫。嵌花嵌字，五色成文。湖丝阿姐如云，名窈窕，忆风情。　机神庙，神为人，具载碑文。七月七，乞巧日，祭机神。诗人美意，机神应是，织女天上星。

商品陈列馆

浙江商品陈列馆，建于1919年。地点在杭州新市场，面临迎紫路。左为延龄路，右为吴山路，其后为泗水路。地形方整，共约9亩。惟泗水路当时未曾全部贯通，行人必须绕行吴山路。我幼时每过其地，深以为憾。抗战胜利后回杭，乃面告杭州市政府，将其完成，并改名为国货街。于是商品陈列馆，乃得四围均有通道。

清末，杭州曾设有第一劝工场，地址在杭州旧府署前。其时提倡实业，为新政之一。各省设劝业道衙门，以有候补道资格者任之。第一劝工场规模狭窄，矮屋林立。门小通人，檐低妨帽。屋之形状，无异蜂巢。因以杭人谓其只可栖鸽，不可以居人，更难以劝工。

民国成立，拆除驻防旗营，开辟新市场，将迎紫路与延龄路之转角地，留作建筑商品陈列馆之用。但至1918年，方始积极计划兴建。在兴建前，先派我的六叔石麟公，赴日本考察建馆式样与布置情形。六叔，系于清末，在日本岩仓铁道学校毕业。返浙后，值兴建沪杭铁路，乃被任为工程师。

六叔自日本考察归来，绘具图说，政府乃拨款兴建。计划两层楼房三列，上下共120余间，为国货商场。其后面另建两层楼房一排，陈列浙省土产，并作办公室。建筑费用，为当时通用大洋37080元。落成之后，即派六叔为馆长。每年预算，为10660元。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入浙。次年春，浙江临时省政府成立，派罗明之（威）接任陈列馆馆长。罗在任只半

年，继之者为许心余（养）。

我少时，常到陈列馆参观购物。尤其每逢农历新正，自元旦至正月十八日，新市场各商店联合举行新春会。火树银花，城开不夜，游人皆以陈列馆为中心。其后递衍为新市场商界联合会，设评议与干事各24人。举先君为评议长，六叔为干事长。因杭州最早之印刷公司，系先君所创办，并自任董事长。公司地址在开元路，虽在旧旗营区之外，但与新市场相邻近。

1937年秋，抗战开始。不久，杭州沦陷，日人将陈列馆原址，开设白木公司。1945年秋，抗战胜利。我于10月中旬，始得复员回杭。闻杭人言，日侨自闻无条件投降，即纷纷在陈列馆门前，摆设地摊，出售衣物。

在抗战胜利之初，商品陈列馆由第三战区第一接管组接收。迨省政府到杭，乃由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接管，以为办公之用。陈列部分，完全取消。商场部分，则该处以靠近大门之一大片房屋，租给商人开设合作食堂。民间结婚庆寿，多假其地宴客。因冠有合作二字，遂得藉以免税。

胜利之后，原在陈列馆设有商肆者，以久在馆中设肆，并曾随政府后迁，要求发还房屋。经一再交涉，合作事业处只允发还楼下17间。迄至1947年2月，杭州国货工厂联合会代表杨克昌、陈容如两君，以我家与陈列馆有历史关系，乃访我请为主持公道。经我往实地察看，遂向建设厅建议，将陈列馆后面空地，建屋以为合管处办公之用。则其现用房屋，即可全数腾空，发还原设店肆之店主。又另商请省保安司令部与省训练团，将在延龄路南端之基地，各让出30公尺，建筑店面，以繁荣市场，问题方得解决。

西湖博览会

浙江省政府于1929年，在杭州举行西湖博览会，这是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举行博览会。虽则是由地方政府举办，但出品的征集，则遍及全国，兼及海外的华侨。并且规定，出品以国货为限。在海外者，则以侨资工厂为限。

博览会原定于3月1日开幕，后延为4月1日，再延为6月6日，而于10月10日闭幕。

博览会共分为八个馆，及两个陈列馆，多系借用里西湖及孤山一带的原有房屋，计为：

一、革命纪念馆　唐庄。

二、博物馆　王电轮庄、林社、放鹤亭，及徐公祠一带。

三、艺术馆　照胆台、三贤祠，及陆宣公祠等处。

四、农业馆　忠烈祠、文澜阁，及外公园。

五、教育馆　省立图书馆、徐潮祠、启贤祠，及朱公祠等处。

六、卫生馆　西泠印社、广化寺、俞楼，及杜月笙寓。

七、丝绸馆　葛荫山庄、杨庄、严庄、惠中旅馆，及地藏寺等处。

八、工业馆　里西湖王庄东边同善堂空地另建馆舍，及玛瑙寺、王庄、菩提精舍、陆军病院等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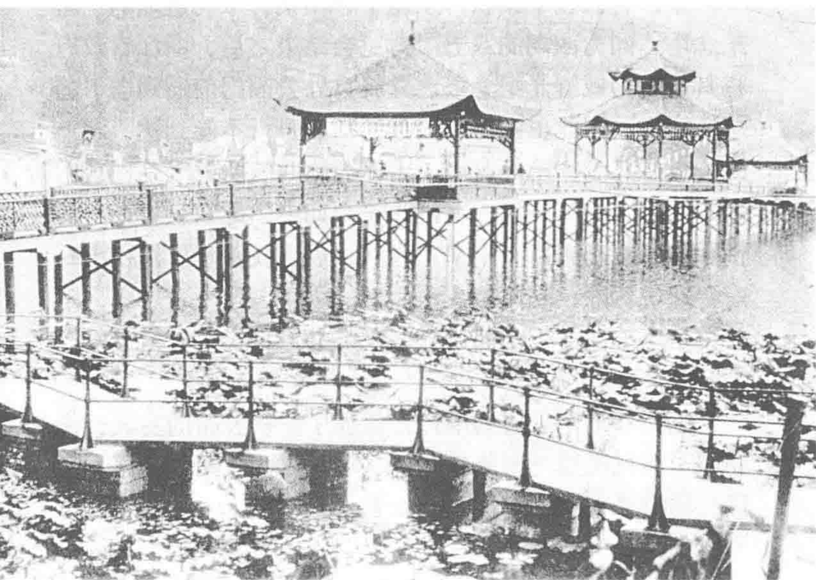
九、特种陈列所　坚匏别墅，及兜率寺。

十、参考陈列所　岳庙。

八馆的陈列内容，顾名思义，即可了然。至特种陈列所，系陈列各机关图表模型，以及不属于其他馆所之物品。参考陈列所，系陈列外国物品，在上海向外商征集。

西湖博览会之新建筑，除工业馆一部分外，尚有大礼堂，在里西湖湖滨。系西式平房，可容纳数百人。

有博览会桥，在里西湖与孤山之间。桥系木制，桥中有一亭。有博览会塔，在外公园门前湖中。塔并不高，但系用钢骨水泥建成。大礼堂在会后，改为放映电影之用。杭州市政府亦有时以其地招待贵宾，举行舞会，为当时杭州的最高级交谊场所。抗战时期，为敌伪拆去，只剩下一片空地。博览会桥对湖上的游人，增加不少方便。因自孤山到里西湖，以往必须乘舟，或绕道西泠桥。暑中，湖面上尽是荷花，小舟必须从荷丛中穿过。有了桥，就可以步行来回。抗战期中，桥也被拆毁。



昔日博览会桥



胜利之后，我每到孤山，总想到当年冒寒风，踏厚雪，到孤山去访寻梅花的情景。在放鹤亭，品尝了热的香茗与藕粉，而后步行过博览会桥，走向里西湖的大礼堂，再绕行湖岸回去。也总想到当年常在夏日的清晨，乘一叶扁舟，穿过断桥，划向里西湖，停在孤山之下，步上博览会桥。看两旁的荷花，清风袭人，直入眉宇。于是，采新莲、剖新藕、头戴新采的荷叶，手捧新折的荷花，坐在桥中的亭子里，犹如观音大士的化身。于是，我想将博览会桥，予以复建。但是提出意见的人很多，尤其是有许多人认为木桥容易损坏，应该有钢骨水泥，或是用巨石建筑。我则以为木桥美观，只要有人经常负责修护，也可以维持长久，这在各地都可以找出例证来。但当时的省市政府，百废待举，财政困难，一时也无暇及此。

至于博览会塔，则在建成之时，杭州人士即认为与1927年，有人在平湖秋月茶座中，用钢骨水泥造成的一座纪念塔，同为西湖的双丑。博览会结束之后，浙江省政府将其命名为戚继光纪念塔。并将自外公园门前通到塔下的木桥拆去，因此虽则距岸甚近，却非舟行不能到达。湖上游人有便急者，乃停舟塔下，作为临时厕所。于是秽气四溢，游客皆掩鼻而过。在杭州陷敌期中，此双丑均未为敌伪除去，真是有幸有不幸。胜利之后，我曾建议杭州市政府将此塔拆除，利用其在水面上的塔基，建一音乐亭，定时由乐队演奏。则水面风来，乐声如传自天上，惜市府迄未能办。

因为西湖博览会的举行，促成了沪杭公路的完成，也促成了京杭国道与浙赣铁路的兴建。这些铁路与公路，对以后的抗战大业，有极大的贡献。

经济调查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省经济所，于1933年，出版《杭州市经济调查》一书，全书共957页。举凡杭州市之史地、市政、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农业、丝绸、工业、商业、金融、社会各端，无不各有详尽之调查，与精当之记载。诚为我国社会调查，及经济统计之难得的完善刊物。承蒙该所送我一本，我以第二故乡，并曾在杭生息多年的关系，尤有重临胜地，不忍释卷之感。

据该书叙文所述，从事调查时之困难甚多。其一，为工商业僻处冷巷，处无招牌，形似居家者，产量之巨，颇足惊人。不逐一登堂入室，则有遗漏之虞。其二，如被调查者苦于政府捐税之繁，凡遇调查者询其营业情形，而疑为政府将有不利于己之苛政。遂厌而畏之，深闭固拒，不以实告。其三，为杭州以蚕桑为大宗。养蚕之时，忌讳极多，遑敢问之以事。蚕汛以后，又不复记忆。问其收茧几何，缫丝几何，皆瞠目不知所对。

调查固已困难，而调查后编辑的工作，也复不易。据序文所述，其一，为调查表必须分类统计。然如棉花与蛋，性质不同。而杭州市，售蛋者必售棉花，售棉花者必售蛋，绝无独立售蛋或售棉花者。徽籍茶商，多兼营生漆，然专营者亦甚多。其资本营业之数，何者属何，店主且难分析。至小手工业之零售商店，自制自卖，谓之为商店也可，谓之为作坊也可，谓之为住户，亦无不可。其二，为经济状况之后果，调查表中不易求之。地方志书侈陈古迹，夸张人物。各机关定期刊物，皆为函、电、公



牍、章程、条例所充塞。询之有关系之父老，则其不负责任之言词，又不尽可恃。故各业之说明，不能繁简一律。其三，如各业表格，综合计之，在商业以为是者，在工业或以为非；在生产之数以为确切不移者，而运销之数或与之绝对矛盾。其四，如调查重在表格，表格仅能在静的方面，为数量之记载；而动的方面事理之叙述，则非其所长。杭州全市，无售盐之店，无储盐之栈。若谓杭人皆不食盐，乃理之绝无者。

以上所举调查与编辑的困难，足以攻破今日只知迷信统计数字者之成见。昔英国某财长出席国会说明议案，命秘书预备统计材料。秘书便问道："要那一方面的呢？赞成的或者反对的？"盖赞成、反对均有统计可引的。

我读了这本《杭州市经济调查》之后，觉得杭州已陷于重大不景气之状态中。举例如下：

一、杭州全市，共有最大的工商业1.6万余家。而全年营业总数，仅10700余万元。平均计之，每家仅6000元左右。其他各业之微渺，更无论矣。

二、杭州产品，本以丝绸为大宗。盖浙江75县，产丝者58。完全以养蚕为业者，30余。每年产额，占全国丝绸三分之一。出口生丝，占全国出口30%。而杭州独有蚕户1.3万余家。人数不可计。丝绸行、绸庄、制种场、经纬厂，机户3900余，职工25400余。其间接依以为生者，不知凡几。今则丝行冷落，丝价不及1931年之半。绸缎完全滞销，丝绸农工失业者，充满市内。

三、杭州人口虽日有增加，市政日有进步，而商业反转逊于往昔。自1931年10月至1932年5月，商店闭歇者500余，店员失业者3890余人。丝绸、交通、金融各业，尚不在内。就全市96业而论，完全属于消耗性之旅馆，日常必需品之米肉，有关文化之书报，均较前增加而有盈余。而

属于生产之丝、绸、茶，无不亏本。未闭歇而亏本者，全市亦已有3283家，几占全数三分之一。

我起初翻开这本经济调查一看，只见杭州市人口之增加，地价之上涨，马路之展长，电灯电话之改进，学校之林立，交通运输之便捷。杭州本有“销金锅”之名，杭人又习于奢侈，则其地之繁华富丽，在在令人想望为仙境。又焉知社会内层中，有多少人欲尽其血汗在图一饱，尚不可得耶?

附注：原书社会篇第638页，载杭市失业工人男6897人，女4898人，占所有劳工人数十分之一，全人口2%。其中尤以丝绸业为多，几及全数十分之九。又第646页，杭州失业与无业的，有277761人，占全人口52.64%。又第649页，杭市自1928年至1931年，自杀者438人。其中因生计困难者97人，因营业失败者4人，因失业者26人。这个自杀统计，恐尚不甚完全。至因生计离杭而在别处自杀者，当更不免。又第652页，杭市穷民人数，据1930年调查，为42800人。其中非乞讨无以为生者，约为0.5%强。

杭州大宅

杭州自太平天国战事后，元气久未恢复。自清末至民初，杭城巨室不出十家。

头发巷丁家，系丁丙丁申二人故居。丁氏昆仲在太平天国战事后，收集散佚于民间之《四库全书》，归还文澜阁，有功于文化。文澜阁在外西湖圣因寺旁。清末为欢迎德国威廉皇太子来访，将圣因寺改建为公园。并在寺之右侧，建一西式图书馆，将四库全书移入。原有阁址，在民国后改为西湖忠烈祠。国民政府成立，又以一部分房屋，设立西湖博物馆。头发巷在杭城中部，通大方伯，巷道均系用巨型青石板铺成，宽广平坦。丝绸为浙西名产，绸业会馆为杭州当时之豪华建筑，亦在头发巷。丁宅内建有嘉惠堂，及八千卷楼，系仿文澜阁款式，又建有善本书室。抗战胜利之后，分隔出租，居户人多，遂类大杂院。友人中有租住其一部分房屋者，我曾多次往访。楼室皆非复旧观，书亦无存。花树山石虽尚有存者，然乏人管理，极为凌乱。

元宝街胡家，系太平天国战事中为官军办理军需补给之胡光墉（雪岩）故宅。胡原籍钱塘，致富后，在杭州清河坊开设胡庆余堂药铺，自养鹿多只，我幼时曾数往店中观鹿。胡在上城元宝街所建住宅，极尽豪阔。

民国尚未成立，胡家即已中落。庆余堂先行出售，胡雪岩之后人，恃每年收取招牌钱以为生。1913年，先君初任律师，曾为庆余堂雪记招牌讼案，任诉讼代理人。至第三审时，并由与先君合组律师事务所之许养颐（壬）老

伯，赴北京大理院呈诉。本案全卷，一向存在我家中。抗战期间，杭州陷敌，遂致遗失。

胡雪岩有姬妾多人，子皆纨绔，又多吸食鸦片。清末盛行捐纳，乃皆为捐班之候补道。民国以后，资历作废，坐吃山空。元宝街住宅，乃亦分割出售。

抗战胜利之后，我于1948年2月12日，往蔡文国与胡冠臣二君家答拜春节，始知所寓之屋，即系胡雪岩旧宅之一部分。乃顺道参观其花园，颓败不堪。内住军官眷属甚多，至为芜杂。园中之假山石笋，嵌壁石刻，尚多佳品。闻尚有左宗棠书碑一方，未曾看到。至当年之画栋雕梁，多已倾圮。而金粉楼台，更皆斑驳不可复见了。

民国初年，先三叔仲眉公移家杭州，初租用新市场见仁里胡姓之屋，房东系胡雪岩之媳。其夫未四十即死，有子名裕禄，在鹾务小学肄业，与二弟笃成为同学。裕禄曾谓其家中供奉祖宗牌位之神龛，系红木雕制。我曾往观，高悬于厅堂正中。杭人亦多知胡雪岩宅中各房神龛，系用红木制成。其后闻裕禄之母，因吸鸦片及赌博倾其家，并红木神龛，亦出售于他人云。



清吟巷王家旧宅

清吟巷王家，在杭州下城，系王文韶之宅第。王因义和团运动，扈驾有功，得为大学士，杭人因称之为相府。王之为官，素以多磕头少说话名，都中称之为琉璃蛋，载于《官场现形记》，其人之圆滑可想。1947年冬季，



我至清吟巷访王养之兄，王为文韶之孙，此为我第一次进入相府。养之堂前悬有红蝠山房横匾，系左宗棠所书。并悬有王文韶大幅画像，已历40年，颜色仍新。画像时，王已年七十三四。再三四年，王即逝世。此两件在抗日战争杭州陷敌八年中，未曾失去，养之兄颇引为幸。养之兄并导观全宅，已一部分易主，大部分分租。租户有纸行、有医生、有散户，零乱不堪。所谓正屋，亦已待修，后园更荒芜已极。某日，我访高梦曾先生，谈及相府。高谓文韶原系嵊县崧厦人，来杭州应乡试。过清吟巷，见瞿宅房屋甚好。乃曰：他日得志，必住此巷。后果拜相，乃购瞿宅之地以建新宅。当时经手者过于讨好，使其正屋面向正南。杭州风俗，谓除皇帝及菩萨外，任何人不宜正面向南而居。因以此屋落成后，文韶只住年余，即行逝世，其子亦多不寿。家道衰落如此之速，与此不无关系云。

双陈巷高家，亦为杭州有名之宅第。民国以后，高宅人才辈出。参加辛亥革命之高尔登（子白），以书画著名之高鱼占，主持私立安定中学校务数十年之高梦曾，乃其著者。高宅与清吟巷王文韶宅，虽并不临大街，但均为杭州著名大宅。1937年冬季，日军占杭州，即用以驻兵。王宅最多时，曾住千余人，两宅因以均遭毁坏。梦曾先生所住部分，因已与别院隔断，得免于难。抗战胜利之后，我曾数度往访，其布置尚能保持上乘也。

佛千先生词云：

杭州大宅

故家乔木感无常。八千卷，堪叹楼空书尽；琉璃蛋，徒留红蝠山房。　　繁华消歇，杰阁废，广园荒。胡家最富，红木祖宗神位，拆售最荒唐。

适庐与静远书屋

适庐是先君为他自建住屋所取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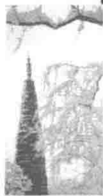
先祖父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省兴化县响水桥边所自建的住宅，命名曰谁园。我是在谁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

先君于清季到杭州，初住横河桥小粉墙。1912年，迁居酱园弄。后来，又迁住三圣巷。这三处房屋，都是租的。

民国初年，先君在新市场青年里自建的新屋落成，取名曰适庐。1917年，他特请曾农髯（熙）先生，写了一方横幅。曾先生写道："人生贵适志耳，能自适则无往不适。庄生逍遥，其适之真筌也欤？丁巳十月，为主人额此。"但是先君既未将曾先生的墨宝，制成匾额，也未将原书悬挂。不知是否因为素习法律，崇尚法家，一向是"口非法不道，身非法不行"，而曾君却引用庄子，不合他的意见？

先君逝世后，曾先生还健在。我有一次过上海去拜访他，谈及为先君故居题额事。曾先生乃又加写了一段跋语，有"先生大隐，继起有人"等语。经过了连年的战乱，我幸得将曾先生1917年所书原件带了出来。后写的跋语，却遗失了。

1917年，是先祖父的七旬冥寿。先君请先祖父生前的好朋友李审言（详）先生，补撰墓志铭，并请曾农髯先生书写，另请李梅庵（清道人）先生题签。适庐横额，当必也是那时一并写的。先祖父之所以将全家移居兴化，是受了李审言先生的敦促。先君对李，一向执礼甚恭。但是李



撰曾书的先祖父墓志铭，先君也并未在兴化百花洲先祖父的墓前刻石立碑。只是影印了若干部，分送亲友，作为纪念。至曾李两先生所书原件，却均在抗战中丧失了！

1912年，杭州光复，拆除旗城，开辟新市场，先君为购地的第十个人。其前为青年会预定地，故自命曰青年里，隐有择邻之意。青年里共只四家，皆先君的好友，大概是先君约同建筑的。适庐地当青年路（北伐前名杭县路）与迎紫路转角，第一进系原有的老式平屋，作为书房、客厅、及客室。第二进，系新建的三楼三底的当时所谓洋房，为餐室及卧室。

1924年秋，北洋军阀齐燮元与卢永祥构兵，杭州接近战地，无人建屋。先君熟识的老包工金阿钦，力劝其趁材料与人工低廉之时，将与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交换所得的平海路空地，加以建筑，次秋落成，适庐遂因而迁移。平海路后改名为英士街，我家门牌为第54号。抗战胜利之后，编组保甲，列为第2区第25保第11甲第13户。

1921年左右，先君又在涌金门旁，买了一块基地，只一亩许。并且预先命名为静远书屋，准备我日后可以自建住宅。

我4岁时在兴化，由祖母开蒙，始行识字。外祖父时在上海，远道来信，为我取名冠华。其时尚在清末，冠华二字，隐有人人皆可为国家主人之意。此后，凡我的弟辈及堂弟，均以华字排行；妹辈及堂妹，均以冠字排行。一直到1917年，我已在杭州第二高等小学二年级肄业，先君才按家谱上预定的“善本性成”顺序，因我是成字辈，命名为毅成，字静生。先君当时对我说：“你做事缺乏毅力，且太好动，故用毅字与静字，使你自己常常知道有所警惕。”静远书屋，系从静生而来，自更含有静生久远不忘书本之意。

自先君逝世，数十年来，我到处迁徙，一直没有力量自行建屋。静远书屋一直是一方空地，既从未设计过建筑图样，也从未请人写好横额备用。抗战前后，这一方空地，都是租给他人作水泥加工之用，制造水管与浴盆。租金极廉，只是可以有人看管基地而已。

静远书屋地临湖滨路，傍涌金桥。在城垣未拆除前，原系涌金门门边。如果静远书屋能够建成，自可近挹湖光，面对山色，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佛千先生词云：

适庐与静远书屋

明法开风气，一老何堂堂。性存名路，众所尊，民不忘。曰静曰远曰毅，大哉垂义方。　　谁园旷达，适庐逍遥，高怀盛德源长。翰墨生香，名家题跋，长者藻鉴，继起有贤郎。

西湖诗词丛话

《西湖诗词丛话》，钱塘厉鹗著。我幼时曾读过，未再见此书者已50余年。某日，遇方杰人（豪）神父，方谓近在台北泉州街旧书摊上，见到此书，已为购归。方亦杭州人，得之如重到故乡。我乃向其借阅，始知系铅印本，用5号字，1929年6月，由六艺书局出版。书局在杭州新市场湖滨路，定价每本大洋四角。

本书末页，附有该局所出版有关西湖的书目，计有《湖山胜概汇编》，全八册。《西湖韵事》八种，合一册。张岱著《西湖梦寻》一册。雪庄《西湖渔唱》一册。《西湖竹枝词》三种，合一册。《金牛湖渔唱》（西湖杂咏）一册。《西湖遗事古今佳话》一册。《西湖三女士传》一册。《西湖楹联新集》一册。《西湖图书博览》，全八册。《西湖旧闻南渡稗史》一册。《湖船正续录》一册。《观涛指南》一册。《西湖西溪南屏四百咏》一册。《湖壖清波笔记》一册。《东湖棹歌》（吴山遗事，南宋杂事）一册。《钱塘逸闻轶事》一册。《杭俗遗风》（江乡节物诗）一册。

以上各书，我有阅过者，有未阅过者。即使阅过，亦属数十年前之事，内容不复能记。如能在台湾有人藏有上列各书，颇思重予细读。

本书所录西湖诗词，多出名家手笔。其咏西湖十景者，亦有多首。方杰人神父曾对我谓西湖十景，可以互对。如苏堤春晓，可对平湖秋月。三潭印月，可对双峰插云。曲院风荷，可对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可对南屏晚

钟。花港观鱼，可对柳浪闻莺。惟咏西湖十景诗，极少佳构。尤其满清乾隆皇帝游湖时，所谓御题之作，刻石于十景之旁，再覆之以亭，名曰御碑亭，更属俗不可耐。

我离开西湖，忽已20余年，况西湖为我父母庐墓所在，儿时游钓之乡。其思念之情，自更胜于他人。

《西湖诗词丛话》所录存之历代佳作，在千首以上，其中又以写景者为最多。其咏为咏梅、咏竹、咏雪、咏月、咏雨、咏茶及咏各种花卉与水果者。我重读之后，可谓每一首，每一句，均引起无限乡思。昔于景瞻《和马浩澜》诗，谓：

> 二十年无此客来，水仙当为洗尘埃。
> 苏公杨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几度开。
> 华表又添新冢墓，粉墙犹绕旧楼台。
> 相逢不饮花应笑，子建何须赋七哀。

西湖情歌

西湖情歌七首，系周馥所作。周，字玉山，安徽省至德县人。久从李鸿章，曾官至两江总督。晚年在天津创办实业，与南通张季直（謇）齐名，当时有北周南张之称。歌词为：

湖山湖水起湖波，湖上风光近若何？
妾向湖心亭子望，四围山色碧于波。

学士桥头学士坊，桃花两岸斗芬芳。
问郎花好奴颜好？花纵嫣然不耐香。

退省庵环十里莲，石桥曲曲跨青涟。
妾心常比三潭月，到得湖心总是圆。

断桥却对花翁墓，锦带横眠水一方。
郎情休似断桥断，妾意终如锦带长。

漪园月老著灵签，士女如云展拜虔。
记得当年十五六，背人偷祝好姻缘。

妾家第六桥头住，郎在高峰上翠薇。
郎带秋风抛妾去，妾携明月载郎归。

岳王坟上柏苍苍，苏小坟前几绿杨。

儿女英雄各千古，多他裙屐爇心香。

我为略作说明如下：

第一首中所提到的湖心亭，在西湖中央。至谓四围山色，实只为三面。因西湖的东面，乃杭州市区，系属平原也。

第二首中所提到的学士桥与学士坊，皆在清波门外。其地有学士港，外通湖面，内达市区。清季以前，西湖游客早出暮归，皆由于此。汪元文作西湖四时游兴，以学士港看桃花，列为春游一景。并谓：“一村临水，四壁俱花。上巳清明，每集裙屐。入其中者，尘虑俱消。”但杭州桃花林最盛者，实为江干，几达万株。春日盛开时，自吴山或玉皇山下望，花团锦簇，蔚为大观。世人皆以桃花为轻薄，独曹志璜作《西湖六桥桃评》，谓：“莲宜暑，近于趋炎，似乞士。菊宜霜，近于炫饰，似狷者。梅宜雪，近于耐寒，似苦衲。桃则不然，不欲与凡卉同馨，亦耻与花王竞艳。贤者乐之，圣人取焉。浴乎沂，风于舞雩，疑赏桃也。”

第三首中所提到的退省庵，乃彭玉麟晚年在西湖居住之地，即在三潭印月，庵前有九曲桥。

第四首中所提到的断桥与锦带桥，均在白堤，知者甚多。花翁墓，在葛岭下。翁原名孙惟信，宋光宗时，弃官隐居湖山，自号花翁，名重江浙。公卿闻孙花翁至，争倒屣。长于诗。

第五首中所提到的漪园，乃宋代翠芳园，一名屏山园的遗址。明末为僧居，曰白云庵。乾隆南巡，赐名漪园。庵旁有月下老人祠。

第六首中所提到的第六桥，系指苏堤北端的跨虹桥，地近岳坟。高峰系指南北高峰，实只海拔300公尺，并不

足以言高也。

第七首中所提到的岳王坟与苏小坟，两者相距不远，知者甚多。以之代表儿女英雄，自属恰当。陈约斋曾题有一联，谓："小字偶相同，考古休凭吴地记；香魂真有托，结邻长傍岳王坟。"此联只见于陈子方镛的笔记，为他书所未载。

西湖杂诗九首，为曾伯厚所作，曾，福州人。其家自清顺治年间起，300年中，出诗家及散文家50人。源远流长，文风特盛。现代诗人曾克耑，乃伯厚之孙。诗为：

黄妃塔势突凌空，半似高僧半醉翁。
一样山头明夕照，雷峰多占几分红。

池边金鲫别多年，又到南屏访老禅。
为爱晴岚归缓缓，山钟敲破夕阳烟。

氤氲云气滃成龙，对峙幽岭翠几重。
绝似罗浮离合态，南高峰与北高峰。

二虎跑泉梦不差，残碑萧寺亦攲斜。
山僧欲疗文园渴，自涤铜铛瀹乳花。

灵鹫峰前路再经，泉声琴筑耐人听。
世间热客知多少，请坐东坡判事亭。

振衣登啸越天长，江色苍茫海气凉。
曲磴盘旋丛筱翳，无人知我上韬光。



河山南渡误平章，灯火笙歌夜未央。
蟋蟀金龙秋又到，西风何处半闲堂。

细调盐豉煮莼丝，叶嫩茎疏滑上匙。
莫使鱼羹夸宋嫂，菜羹风味最相宜。

故乡无此好勾留，廿载重来续旧游。
可惜空将西子比，未能随我载扁舟。

我要为之略加解释者：

第一首说的是雷峰塔。杭州人向谓雷峰如老衲，而全塔皆系红色，故喻之为老僧及醉翁，甚为贴切。

第二首说的是玉泉观鱼及南屏晚钟。抗战初期，杭州陷敌，日人将玉泉池中的放生鱼全数烹而食之。胜利回杭，寺僧补养，已不若昔年之可观。

第三首说的是双峰插云。

第四首说的是虎跑泉。

第五首说的是灵隐。《梁溪漫志》载："苏东坡任杭州太守，遇游西湖，多自涌金门泛舟，穿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吏牍自随，至冷泉亭，据案判决，乃与僚吏剧饮。"以热客而请坐冷泉亭，用典颇巧。

第六首说的是韬光寺，寺在灵隐登北高峰的中途。门悬一联，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第七首说的是贾似道的故事，贾氏的半闲堂，早已无存。

第八首说的是莼菜与醋溜鱼，两者均为湖上的名菜。莼菜滑腻，又名小荷叶。实际上，产于萧山的湘湖。

最后一首，用的是范蠡的故事。西施究竟是否在吴亡之后，为范载走，至今尚为疑案。



1926年，我在西湖，也曾写了些诗，谓之情歌可，谓之杂诗亦可。

诗为：

湖上杂诗

花开陌上踏青时，红杏村中舞酒旗。
养鸭人家临水绿，门前杨柳两黄鹂。

香似烧兰红胜霞，牡丹院落小桃华。
可怜无复雷峰后，多少斜阳总恋花。

绿杨人瘦若梅娇，无限闲愁带酒浇。
最是一庭春雨骤，红樱桃共绿芭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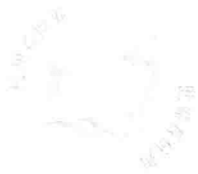
架上蔷薇吹醉吾，半篙新雨涨西湖。
为寻梅子穿芳径，淡淡烟堤芍药铺。

海棠经雨透胭脂，一雨柔情一柳丝。
翠燕尾分红绿影，东风吹皱谢家池。

莺嘴微红爱啄花，满园春色蝶来哗。
秋千索动黄蜂扑，半卷珠帘凭倚斜。

习风微雨意阑珊，无力东君花半残。
暗数新桐初乳子，深深记起望江南。

十分春色闹杭州，淡淡春山点点愁。
比觉落英飞满地，又教杜宇唤春留。



湖上即事

暖日柔风好放船，绿杨烟里杏花天。
柳丝为绾同心结，双桨湖波不羡仙。

垂杨曲水且停桡，不学捧心态自娇。
儿女青红宜记取，西湖自古把金销。

堤边油壁共青骢，沙暖泥融意万重。
笑傍檀郎临水照，桃花与妾孰颜红？

捣尽元霜缘自成，裴郎却幸遇云英。
而今低拜氤氲使，喜把湖山作定情。

湖上消夏词

湖上年年结伴来，凉风晚岸共徘徊。
当年此日长廊下，底事娇嗔避几回？

早起凭栏唱采莲，日长更向北窗眠。
倩郎梳洗黄昏后，共向门前唤小船。

双影娉婷分外明，荷灯故教逐双行。
波中并蒂舟中语，愿把莲花署小名。

为君歌棹为君羞，怪底痴郎窥未休。
颦黛最宜星下看，眉弯胜得月弯否？



十里铜街夜未残，几家丝管倚栏干。
瑶琴学得羞频奏，珍重郎前也一弹。

新莲烛下催诗煮，难得郎心比妾齐。
月影湾环人窈窕，西湖只在此墙西。

佛千先生词云：

西湖情歌

湖山处处，都是情人路。古今多少情人，写多少温馨句。　玉山梅月吾皆慕，更有适庐少主。旖旎诗篇自赋，自应加笺注。

踏青时，谢家池，柔情绾柳丝。好放船，唱采莲，而今不羡仙。　窈窕心，并蒂情，莲花署小名。夜未阑，倚栏杆，眉弯胜月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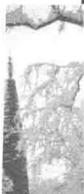
堤上花枝尽姓苏

我对于苏东坡，发生敬仰之心，是他两次在杭州任内的民生建设。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十一月，至七年十月去任，历时三年。其时，他为36岁至39岁，正值壮年。第二次到杭州任太守，在哲宗元祐四年七月，到六年六月回京，历时两年。其时，他为54岁至56岁，也尚未老。他曾说："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

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力行青苗、免役、市易及盐法等。地方骚然，违法者众。他于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次日即为小除夕。他说："值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可见其治事之勤。

他第二次到杭州任太守时，与上次相隔，已15年。新法虽已废止，而杭州却连续发生水灾。早晚稻的收成大减，粮食发生恐慌。次年夏季，又逢大雨不止。太湖两岸与钱塘江下游，均成为一片汪洋。农民移居丘墓之上，市街上可以行舟。他以官米办理平粜，救济灾民。并在大水退去之后，立即发动民力，以工代赈，疏浚西湖与城内的运河。又将西湖中所浚出来的泥土，在湖中筑了一道长堤，使北山与南屏相通。堤上建了六座石桥，使堤内堤外的湖面，仍能相连，而游艇也仍可通行。

这一条堤，后人为纪念他，称之为苏堤。这六座桥，由南至北，也由后人为之分别命名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与跨虹。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就在望山桥畔。历代诗人咏苏堤春晓的诗很多，兹录聂大年的一律：



树烟花雾绕堤沙，楼阁朦胧一半遮。
三竺钟声催落月，六桥柳色带栖鸦。
绿窗睡觉闻啼鸟，绮阁妆残唤卖花。
遥望酒旗何处是，炊烟起处有人家。

在苏堤的两旁，东坡遍植了芙蓉与杨柳。后人又在杨柳与杨柳之间，种了桃花，于是乃有一株杨柳一株桃之说。其实杨柳远较桃花高大，故必须在两柳之间，种上三株桃花，从远处看去，才能看出红绿相间。

在对日抗战时期，杭州沦陷。日人在苏堤种了许多株樱花。胜利回杭，我便通知杭州市政府悉予移去，并仍在杨柳与杨柳之间，补植桃花。次年春季，又回复了桃红柳绿的良辰美景。

运河在杭州城内，有15华里之长。自拱宸桥进入城内，而到菜市桥的断河头为止，这是大运河的南面最终点。《儒林外史》写匡超人与景兰江初到杭州，就是乘船而来，在菜市桥上岸。杭州城内的运河，本已淤塞，也是

昔日苏堤



苏东坡予以疏通，使其深度达八尺以上，船只可以通行无阻。

我国历代，多以文人知地方事。而文人因富有情感，常有民胞物与的心怀。加之所读圣贤之书，皆以经世用世为职志。所以凡有关民生的建设，尤其是水利与农田，皆特别致力。苏东坡在杭州任太守，后于白居易270年。白苏二人，皆以谪宦而到杭州，但二人皆并未因降官而玩忽政事。白居易也曾疏浚西湖，也曾以湖泥建了白堤，也曾在堤上建了断桥（原名段家桥）与锦带桥。并且因为白堤的建成，便得孤山与杭州城相连，故曰断桥桥不断，孤山山不孤。因而，东坡在杭州兴修水利，也可以说是受了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己晚年也曾说过："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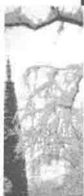
东坡两次在杭州，共为五年，写了300多首诗，平均每5天要写一首。这是指现在尚留存的而言，散佚的犹不在内。他在杭州所写的词，第一次约为40首，第二次约为30首。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任太守时，马中玉任浙漕。元祐六年，东坡奉召赴阙，马在席间作词送别。

木兰花令

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　　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断肠处。

东坡即席有和作：

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故将别语恼佳人，欲看梨花枝上雨。　　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



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距现在已将一千年。他逝世时只66岁，生前未能有机会再到杭州。但是他对杭州的怀念，却颇为深远。他曾有句谓：“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又谓：“寄谢西湖旧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与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的心境，后先如出一辙。

杭人对东坡的民生治迹，也极为怀念。至今在平湖秋月对面，犹有白苏二公祠，以纪念这两位诗人太守。又谓：“堤上花枝尽姓苏”，可见东坡的遗爱之深，弥足千古。尝有人以为东坡两次在杭州，只不过是饮酒、看花、吟诗、填词、啸傲湖山、平章风月。真是肤浅之见，不足



苏白二公祠

以言知东坡也。可惜的，是白苏二公祠，因1927年，教育部在罗苑设立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后因学生日多，校址不敷，该校便向浙江省政府要求租用。经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准其租用50年。抗战胜利回杭，校长改由潘天授担任。某日，潘校长约我至校参观，始知该校将二公祠用作学生的饭厅，桌凳横斜，杯盘狼藉。并见到白苏二公的像碑，亦已不在墙上，而横置在屋角之旁，幸未破损。我当面请潘校长予以扶正，并仍置于墙中，以便瞻仰。潘也觉得过意不去，满口承诺。但直至1948年7月，我离开浙江省政府，闻潘并未照办。

我也曾将所见白苏二公祠的情形，在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席上提出报告。我谓以白苏二公对杭州民生建设的贡献，竟不能保有其纪念祠宇，我等司地方之责者，实感惭愧。省府以原祠既一时不能收回，乃决定将西湖净寺北面的空屋，另为二公改建新祠。但后来查明，空屋系唐代的永明禅师塔院，产权属于净寺，也正在计划兴修，因而未成。乃再命杭州市政府，另行觅地。我交代时，特将此事列入事业交代书，请我的后任注意办理。

佛千先生词云：

堤上花枝尽姓苏

香山东坡，太守各风流。至今祠宇长留。一龛同住，精灵长在，相对豁吟眸。　　桃花百树，芙蓉千本，杨柳万丝柔。虽有甘棠，不如美卉，“堤上花枝尽姓苏”。

陆放翁的两首诗

陆放翁于宋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生于淮上。是日平旦，大风雨骇人。及其堕地，雨乃止。他71岁的时候，曾写有生日诗："少傅奉诏朝京师，舣船生我淮之湄。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他生的那一年，干支为乙巳。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较放翁后二日，是年干支也是乙巳。但是时间上，却相差780年。丁未年，宋高宗南渡，改元为建炎元年，其时放翁只三岁。放翁卒于宋宁宗嘉定三年，享年86岁。偏安之局，已过了80年，难怪他临死犹以北定中原为念了。他一生除了在四川10年外，所有的时间，都在江南。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早于放翁89年。放翁生时，东坡已逝世14年。东坡是四川人，而两度到杭州任职。放翁是浙江人，而一度到四川服官。东坡第一次到杭州是36岁，第二次是54岁，两次共在杭5年。放翁到四川是45岁，在蜀中10年。也就是说，都是他们的中年有为时期。他们当时所担任的，虽皆只是地方官，却皆以文人从政，而留下了许多惠政，使人民永垂不忘。杭州人为怀念东坡，说"堤上花枝尽姓苏"。四川人为怀念放翁，说"团扇家家画放翁"。这都是出自老百姓内心的衷诚爱戴，不是任何力量所可以勉强达到的。更难得的，是东坡离开杭州之后，曾有许多留恋西湖的诗句。而在放翁集中，也多有怀念西蜀的佳作。他们二人都是宋朝的大诗人，一在北宋，一在南宋。他们也都曾受到过奸臣的排挤，但他们的诗词文章，却都名传千古，这真是很巧合的事。

宋史本传载：放翁年12，就能诗文。他28岁的时候，试锁厅第一，而奸臣秦桧的孙子秦埙，名列第二。秦桧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事者又将放翁的名字，置在秦埙之前，桧显黜之。一直等到秦桧死了，放翁才有机会从政。却不料又在无意间，得罪了宋孝宗。据《齐东野语》载，史师垣告诉放翁一件宫闱的事，放翁不知保密，说给张焘听。张焘第二天对孝宗说："陛下新嗣服，岂宜与臣下燕狎如此?"孝宗觉得惭愧，便问张从何处听来，张说是陆游讲的。孝宗乃恶游，未几去国。

但是奸佞的人，虽则当时得意，而千百载后，却公道自在人心。尤其是诗文的光芒，永远照耀，任何人无法使其掩灭。

东坡与放翁，都是多产作家。他们的著作，读过的人太多，悉心研究的人也不少。我实在对放翁诗文的了解，并不充分。且就我所喜欢的放翁两首诗，略述一二。南宋以杭州为国都，放翁自然到过多次，也住过不少时间。我少时住杭，每逢春日，独多细雨,我就自然会想到放翁的一首诗：

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我于是想考证放翁当时听雨的小楼，在杭州什么地方？我查阅了不少的书，又实地去踏看方向，我才发觉那是在孩儿巷。孩儿巷在性存路的后面，为东西向的一条小巷。性存路在南宋的时候，为刑部的所在。岳飞的赐第，



也在其处。宋高宗与秦桧谋杀岳飞父子的风波亭，就在路的西端。杭州城不算太大，因为建都，现在的上城一带，沿城隍山直到宗阳宫，都已经划为大内。因之，民间所住的地方，多偏于中下城。放翁当年所住的小楼，当然早没有了，自也没有人留在巷中卖花。不过，孩儿巷虽然是小巷，却相当长，所以放翁说是深巷。既曰深巷，然他所住的小楼，自必在巷子的中部，不在巷的两端。至于卖花的，是女郎还是老翁，就无从查考了！曾有朋友写过“采茶女儿卖花翁”的诗句，我问他何以知道卖花的一定是老翁？由老翁卖花，尚有何情趣？他说：“因为采茶的一定是年轻女郎，而在同一句诗中，又不能连用两个‘女儿’，故只得偏劳老翁去卖花了！”相与大笑。放翁听雨买花的时间，应该是农历的二月与三月之间，那正是杏花春雨江南的季节。我在杭州的时候，西湖上多的是梅花、桃花、荷花、桂花与菊花，却独少杏花与李花。在岳坟的旁边，虽然有一家酒肆，名叫杏花村，却也并没有杏花。放翁为什么独喜欢买杏花呢？桃花盛开的时候，不也是会有春雨之夜吗？1946年春季，杭州一连下了28天的雨，我每天站在家中二楼向北的走廊上，看到雨丝雨点，滴在路上，泻在湖中，更飘到无数红男绿女的头发上、脸上、手上、身上。午夜我睡在床上，听那雨声，时张时弛，若断若续，催人入梦。

放翁的另一首诗，是我最爱读的，也是许多人知道的，就是：

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他这一首诗，是在杭州写的，还是在绍兴写的，我查不出来。但山重水复一联，却完全写的是西湖九溪十八涧的风景。从龙井到徐村，一定要走过九溪，而且峰回路转，水曲茶香。人人均须涉水步行，真是水清可以濯足。我少时在杭，最爱约同三五知好，在那重重叠叠的山中，随着曲曲弯弯的溪流，听丁丁冬冬的水声，赤着双足，在水中行走。一面诵着放翁的这一首好诗。这都是天籁，人间哪得几回闻！

西湖诗梦录

白发摊书似梦惊，某邱某水认题名。袖中东海言非大，纸上西湖眼更明。

少觉旧游浑记得，老关佳处尚思行。青鞋布袜犹鲜健，只待花时计便成。

——沈周：《观西湖百咏集感旧》

抗战时期，与西湖一别八年。这次来台，又已分离了多载。台湾地处亚热带，夏季较长。自大陆来者，均不习惯。而且台北夏初多雨，雨过又太热，我虽住在郊外的山庄度夏，没有感到炎热之苦。山庄花树四围，流水不竭，清幽绝俗，如居尘外。但是我仍然要常常想到西湖，总觉得假如现在湖上，又是多么快慰？梦魂常绕，头白未归。因此想到杭州，从南宋到近代，时历千年，迭经变革。眼帘所触、对卷凝思，竟恍如置身湖上，与山水烟柳，重相结合。身居海外，而能有此怀想，自可珍贵。

我想到杭州，就首先想念开辟西湖有功的白居易与苏东坡二位太守。白居易守杭时，夏天常到江干的观潮楼纳凉，曾有《江楼夕望招客》诗："海天东望月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楼消暑否？比君茅舍更清凉。"游西湖的人，很少去江干，而白太守却早就领略了江干的清凉福分。白又有《万松岭夜归》诗："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玲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楼阁渐移当路影，潮头欲过满江风。归来未放

笙歌散，画戟门开蜡炬红。”白在杭州做太守的时候，深入民间，《西湖梦寻》载：“刺史白乐天，啸傲湖山。有野客赵羽者，湖楼最畅。乐天常过饮其家，因即颜之曰醉白，在茅家埠，今改吴庄。一松苍翠，飞带如虬，真数百年物也。”倪元璐曾有《醉白楼》诗：“金沙深处白公堤，太守行春信马蹄。冶艳桃花供祗应，迷离烟柳藉携提。随时风月为常主，到处鸥凫是小溪。野老悠然同一醉，山楼何必更留题？”

白又常喜与和尚做朋友。灵隐与北高峰之间的韬光庵，本名广岩院。唐长庆中，有诗僧韬光，在院西结庵，后人乃以僧名名之。白有《长庆四年元旦韬光斋》诗：“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泸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来伴食，斋罢一瓯茶。”白又有《咏二寺门》诗，赠僧韬光。二寺门在九里松西，飞来峰口。盖当时灵隐天竺两山，由一门而入，现在交通情形改变，已不是当年情形了。白诗云：“一山门做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高僧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其后和者颇多，以董沄的一首为佳：“松林行尽见松门，花事三分过二分。高树鸟呼低树鸟，入山云笑出山云。峰前瀑布僧前落，竹里流莺寺里闻。忙处不知闲处好，红尘白浪正纷纷。”

苏东坡为杭州太守时，最会消夏。《梁溪漫志》载：“东坡遇游西湖，多自涌金门泛舟，穿湖而来，饭于普安院。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据案判决，乃与僚吏剧饮。”冷泉亭本是湖上较为凉爽的地方，为夏日办公的一好去处。苏东坡在西湖上建造了苏堤，堤上有六桥。但苏并未为桥立名，宋人诗词集中，都只说第一或第二桥，现有的六个桥名，乃系宋室南渡后好事者所拟。苏堤风景最好的



地方，在第三桥，也就是苏堤春晓的所在。聂大年曾有诗："树烟花雾绕堤沙，楼阁朦胧一半遮。三界钟声吹落月，六桥柳色带栖鸦。绿窗睡觉闻啼鸟，绮户妆残唤卖花。遥望酒旗何处是？炊烟起处有人家。"这是在楼内的诗。在楼外的，以陈郁的《苏堤晓望》诗为佳："荷边清露袭人衣，风里明蟾浴晓池。凉影润香吟不得，手攀杨柳立多时。"现在只剩下一座碑亭，亭中有康熙手书的苏堤春晓碑。但当雍正八年的时候，以亭隘未称观瞻，改建岑楼，复构曙霞亭于楼后。苏堤近年已改为马路，但不许大卡车行驶。第三第四两桥之间，建有回车道。杭州市政府因将浚起了西湖淤泥，填充到堤身的两旁，并且间隔地布置了花圃花坛，故曾有肥了苏堤之说。抗战时期，杭州沦陷，日人在苏堤种植樱花。胜利后，为居民自动除去，仍恢复了一株杨柳一株桃的旧景。夏晚散步，在苏堤上，较之白堤更有佳趣。

湖上原有苏白二公祠，即在平湖秋月对门。抗战时日寇占为伪警察训练所，胜利后由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作为校舍的一部分。某日，我往参观，见苏白二公的石刻像碑，均被横置在学生饭厅的墙阴之处，我曾迭次面请艺专校长，将其重行嵌入壁中，均未获其照办。昔日徐集孙曾有《咏智果寺东坡墨迹及参寥泉》诗："煮茗评诗岁月深，堂堂遗像篆烟沉。数间老屋关兴废，一段清名无古今。碑断乱云封字脚，井昏落叶覆泉心。斜阳影里夷犹处，仰止高风不敢吟。"这一首诗，也可以为今日二公像碑的事写照。

白居易做了杭州太守后，不思回家。他曾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陈师道做了钱塘尉，也不想再走，他有《宿钱塘尉廨》的诗："平湖绕舍山无盗，官舍长闲俸有金。安得终身为御寇，不辞儿女作吴

音。”可见太平盛世官闲民乐之概。

其次，我要想到湖上的花。苏堤的第一桥旁有花港观鱼，但是并没有花。壁有诗：“杨柳垂垂绿影斜，溪边茅屋尽渔家。西湖处处栽桃李，花港如何不种花?”西湖昔年曾有牡丹，现在不存。凤凰山昔有虚白堂，一作虚白亭，白居易曾有诗刻石堂上。堂前牡丹及紫薇两株，传皆系白公手植。白曾有《虚白堂》诗：“虚白堂前衙退后，更无一事到中心。移床就日檐间卧，卧咏闲诗侧枕琴。”《欧余漫录》载：杨仲宏一日游凤凰山，过宋大内，独步微吟，至披香阁址，拾玉牌一事，上有诗云云，仲宏为之怃然。诗为无名氏题，句云：“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一把柳丝收不住，和烟格在玉阑干。”这也是西湖曾有牡丹花之证。湖上又曾有紫阳花，在招贤寺，白居易有题诗，并序：“招贤寺有山花一株，无人知名。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种，因以紫阳花名之。”诗云：“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佛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我平时常爱到招贤寺，却不见有此花了。

近人看花忌折，但有时，折花也有折花的情趣。西湖的花，以梅最高洁。孤山的梅花，更为游人所争赏。凌云翰《游孤山和靖祠》诗，谓：“山有梅花山不孤，先生甘与鹤同癯。一抔黄土留前宋，千古清风属里湖。疏影暗香曾入咏，淡妆浓抹自成图。水仙祠下多秋菊，谁把寒泉荐酒壶?”曾有人绘和靖观梅图，和靖手持梅花一枝，吴澄题云：“一枝春信到孤山，冰雪肌肤不觉寒。月下水边看未足，折来更向手中看。”西湖秋日的桂花，集于满觉陇，也是游人争赏的地方。吴允嘉有看桂花的诗，也说到折桂的情意：“高秋渐觉酒怀宽，晓出探花露未干。隐士独分天上种，嫦娥只在月中看。不将艳色争黄菊，自有幽香斗

药阑。即此小山吾欲老，一枝折取报刘安。”吴看的桂花，在小辋川，是明朝万历年间参政吴大山的别业，地点在葛岭下。清朝初年，改为邵远平的别业，后并入惠献贝子祠。现在，祠与桂都早已无存了。花如果不折，也会自落的。尤其春天的桃花，开得盛，落得快。袁宏道有《桃花雨》诗：“浅碧深红大半残，恶风催雨剪刀寒。桃花不比杭州女，洗却胭脂不耐看。”杨蟠也有《涌金池》诗，谓：“涌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经十万家。”这是说涌金春晓的。而贡性之《见柳》诗，则说涌金春早：“涌金门外柳垂金，三日不来成绿荫。折取一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盖昔年杭人游湖，多取道涌金门。故春早春晚，均于涌金门外卜之。

西湖上的树，也是值得回思的。第一是松树，湖上有万松岭，又有九里松。这两处的松，现在都名不副实了。白居易有“万株松树青山上”的诗句，足见当年是确有万株松树的。岭下旧多腊梅，苏子瞻的诗谓：“万松岭下黄千叶，玉内檀心两奇绝。”南宋时候的大内，即与万松岭密迩。其时第宅居民，高下栉比。迭经战乱之后，州城既改，荡为空山，松亦无几。岭上原有报恩寺，后废。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参政周木，以寺址改奉孔子像，名万松书院。清初，康熙题赠“浙水敷文”四字，改名敷文书院。太平天国之役，毁于兵火。北伐以前，浙人议设杭州大学，即勘定敷文书院为校址。北伐以后，浙江大学成立，亦决定设永久校址于此。惟因国库支绌，迄未能着手建设。胜利后，蒋百里先生后裔为先生卜葬于此。松楸拂墓，岭上自此多一可传之人。至于九里松，系唐朝的刺史袁仁敬所植的松，以达天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苍翠夹道，藤萝冒涂。走其下者，人面皆绿。到了后来，据张京元的《九里松小记》，已经是：

“仅见一株两株，如飞龙劈空，雄古奇伟。想见当年万绿参天，松风声壮于钱塘潮，今已化为乌有。更千百岁，桑田沧海，恐北高峰头，有螺蚌壳矣，安问树有无哉。”盼望杭人从此以补植松树为要务。如每一游人捐松树苗一株，则万松立即可得，九里三行，不出二年，即可重绿人面了。松之外，西湖多竹，而以云栖的竹林为最胜。于石有诗云：“空翠凝寒不受埃，断崖千尺拥崔嵬。老僧倚树惊猿去，童子扫阶知客来。石径微因松露湿，茶烟远趁竹风回。禅家也辞吟边料，不种闲花只种梅。”竹之外，更多柳。柳也是宜于折在手中的，史鉴题《断桥分手图》云：“近水人家半掩扇，西山楼阁尚斜晖。断桥无数垂杨柳，总被游人折渐稀。”

我又常常回思到西湖上的庙，在湖上固宜看水，却更宜看山，而庙则多在山上。昔日的诗中，写看水最好的地方在问水亭，与环碧园，都在涌金门外。徐林鸿的《问水亭归舟》诗，写尽了儿女情态：“春潮正急柳丝轻，多少香车喜出城。日日纸鸢游碧落，家家竹马说清明。蔷薇觍面携儿去，艾芗梳头约伴行。小雨锦衣寒不着，凌波罗袜细无声。”董嗣杲的《环碧园》诗，则写尽了夕阳湖水的胜景：“绕舍晴波聚钓仙，五龙祠畔柳洲前。清虚不类侯家屋，轮奂曾资母后钱。三面轩窗秋水观，四时箫鼓夕阳船。揽将山北山南翠，独有黄昏得景全。”至在钱塘门外看水的地方，昔日有玉壶园与双清楼。玉壶园的地址，当在现在的菩提精舍的四面，太守赵与篡曾筑堂构。杜范有诗和赵，谓其尽得湖山之胜：“占尽春光好，湖山一览余。著身蓬岛里，纵目画屏如。我计还知错，君谋定不诬。他年同到此，卜筑莫踌躇。”双清楼的地址，当在今日的石塔儿头附近，汪莘有《秋日饮钱塘门外双清楼》诗：“西湖日日可寻芳，楼上凭阑意未忘。折取荷花三万

朵，作他贫女嫁衣裳。”现在圣塘路的南阳小庐，也极宜看水。阁悬一联，“近水楼台先得月，落花时节又逢君。”佳句天成，人人爱诵。

在湖上游山，可分为南北两路，北路自岳坟后，即趋入山径。岳坟在苏堤的第六桥（跨虹）下。其地早有市廛，袁宏道有《饮六桥酒炉上》诗：“流芳亭畔早如油，坠粉吹香历几秋。鄂国有祠争下马，西陵无主漫登楼。玉珑酿熟多酬直，土哺鱼肥易上钩。南北诸峰收不尽，明朝放艇过溪头。”陈孚的《湖堤感旧》诗，亦谓：“东风第六桥边柳，不见黄鹂见杜鹃。”除酒家外，尚有卖书画帖的店铺。昔项承恩屡试不第，遂隐于岳坟，携一女奴供爨，开小肆，杂置书籍画卷，并盆花竹石，索价颇高。李日华曾赠以诗：“西湖流水供濯足，南屏山色对梳头。月夜酣眠琴作枕，雪朝趺坐絮为裘。盆花巧作千金笑，壁画资高万户侯。何用更寻高士传，先生风格在林丘。”现在在岳坟前开书帖铺的，都自称为鄂王的后裔，其实没有一点高雅的气味。

历代题咏岳王的诗不知多少，我独喜高启的一首：“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成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抗战胜利以后，我曾参加过几次的岳庙春秋二祭，每次均由岳氏子孙，将家藏的岳王画像，悬在堂前。后人也有许多题咏，均不甚佳。薛季宣曾有《观岳侯石像》的诗，颇好。石像原在墓西的遗像亭内，亭废圮后，移在忠烈庙寝殿内。句云：“万死何如狱吏尊，威名盖世古难存。二桃岂是功高赐，一舸不容身退论。几为饮江思道济，谬因图像削王敦。沉碑千古蛟川恨，留与无穷客断魂。”至于随同鄂王的诸将，多在杭州有墓。张宪的墓，在仙姑山下，吴瓒有诗：“将军坟

墓久凄凉，一股精忠伴夕阳。寂寂松篁锁烟雾，离离禾黍散牛羊。遭逢盛世褒忠烈，整顿荒丘待表彰。料得英灵应不泯，千秋犹是镇钱塘。”

从岳坟分路入山，一趋灵隐天竺，一趋龙井九溪。我常爱走去龙井的路。每一回思，便如置身在九溪道上。张丹有在金沙滩遇驭鹿的口占，谓：“武穆祠前忽把臂，金沙滩畔各扶筇。君游灵隐我龙井，翠满南峰与北峰。”去南山的路，本尚可以由湖滨乘船至赤山埠，而后舍舟登陆，步行上山。我少时游南山，多循此路。赤山埠在苏堤第一桥西南，因土赤，故名。王稺登的《西湖竹枝词》，谓：“山田香土赤如沙，上种梅花下种茶。茶绿采芽不采叶，梅多论子不论花。”由赤山埠往定香桥，为昔年赴江干的大路。其后因公路修通，行旅乃皆经虎跑，定香桥遂少人知，但我却因此更爱定香桥的静趣。钱惟善有《定香桥访隐者不遇》的诗：“诵经声隔竹林闻，知有禅房远俗氛。野水菰浦藏小艇，寒烟树木翳斜曛。雨花台古龙归井，落月廊深犬吠云。不见故人归去晚，扁舟重过雪纷纷。”

龙井以茶著名，刘英有《谢龙井僧寄茶》的诗：“春茗初收谷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也知顾渚无双品，须试吴山第一泉。竹里细烹清睡思，风前小啜悟诸禅。相酬拟作长歌赠，浅薄何能继玉川。”西湖的庙僧，见客必敬茶。杨万里《题水月寺寒秀轩》诗，谓：“古寺深门一径斜，绕身洁面总烟霞。低低檐入低低树，小小盆栽小小花。经藏中间看佛画，竹林外面是人家。山僧笑道知侬渴，其实迎宾例瀹茶。”不过龙井寺僧所瀹的茶，却与寻常不同，因其就近采折，色香兼佳。我常想卜居龙井，明孝廉闻启祥曾在龙井山斋养病，有《入龙泓山居》二绝：“久别溪山倍有情，今朝扶杖独山行。半年耳目犹无主，错认泉声



是雨声。”“结得茅庵一丈悭，拟来枯坐掩禅关。那知一入清溪里，种竹栽花不得闲。”虽则不得闲，但能住在龙井，我仍愿意。

南山的庙，除龙井外，我喜欢法相寺与六通寺。法相寺在颖秀坞，《西湖小记》称其不甚丽而香火骈集。朱长春诗云：“独桥交野涧，深寺足秋筠。乘兴来游客，清言得上人。窗虚过鸟影，龛古见禅身。正坐高峰底，飞云落酒巾。”六通寺即在法相寺之旁，最早系晋天福间吴越王建。张纲孙有《同吴锦雯访六通寺》诗：“与君寻野寺，遥闻六通名。谷转云门峻，峰迴路石平。孤灯阴昼色，高树洒秋声。此日饶幽思，因之杖履轻。”我有一次于黄昏中叩六通寺门，不开。适另有青年男女游客一群，也敲门不应，遂与同归。我便想起了吴焯《游宁峰院》的诗：“偶为听泉向夜行，寺门未启客知名。乍来竹径坐孤阁，欲共龛灯话半更。风雨萧寥诗一轴，云山骀荡壁双清。频年我惯游吴会，裙屐偏教此处迎。”这真如苏东坡所谓：“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未入寺门，反较入门更有情味。

我最不想的，是湖上的庄屋。那些庄主虽有钱，却不解风雅。诚如董嗣杲的《梅坡园诗》所说：“墙拥双扉锁锦窝，溪声不敌树声多。谁家种麦曾名岭，今日寻梅且陟坡。万厦栋梁巢燕雀，四山风日养松萝。园丁自饱栽花利，月给杨家得几何？”园在小麦岭旁，系宋朝的杨太后宅，今早已无存了。但如庄屋能借给诗人画家住居，为无力在湖上建屋者，解决了一大困难，却又可加以称道。昔沈石田（周）住在宝石峰僧楼，为求画者所窘，刘邦彦曾有诗嘲之：“送纸敲窗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归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如果有几家湖庄，可以轮流借寓，则石田就可以避画债了。

我虽则爱游山，爱访庙，但一日奔波，仍不得不回到市区，而归途只可以乘舟代步，不能再苦双足。尤其夏日晚间，骄阳已减，更可以一波容与，载月归来。杨万里的《自普安寺晚泛归》诗："阁下微阴不碍晴，杖藜小倦且须行。湖山有意当君约，款束疏钟未要声。""烟艇横波柳港湾，云山出没柳行间。登山待侣游湖好，却是湖心看尽山。"归舟最好仍经南路，可以听到南屏的钟声。尹廷高诗，谓："缥缈雷峰隔上方，数声风送到幽窗。柳昏花暝游人散，付与山僧带月撞。"当那钟声滑过湖面而入于船舷的时候，真有人天同醉之概。我等是俗人，诚如杨万里《晚出兜率寺送许耀卿》的诗所说："兜率山深露气清，柳阴暗处藕花明。无端拾得闲烦恼，背却西湖又入城。"

我因为想到杭州，想到西湖，便信手写下了这么多字。是梦？是诗？自己明白。总之，梦是自己的，而诗都是他人的。用他人的诗，证自己的梦，也是一种新的写法吧！

凤舞龙飞讵足夸，钱塘遗事失宫娃。天教南渡支残局，人想东京续梦华。

朱鸟歌成空有泪，冬青种后已无家。与君鼎足藏三志，天水犹悬碧海涯。

——吴骞（兔床）：《和陈鳣得澶祐临安志诗》

湖山屐痕

我在杭州读高等小学及旧制中学，家住在西湖湖滨。学校中每年有春秋两季的远足。亲长来杭，因父亲多病，往往要我陪伴游湖。再以少年同学，逢到假日，也常有结伴同游之举，因以湖上的一山一水，一亭一楼，一船一桥，一寺一院，都为我们的双屐所踏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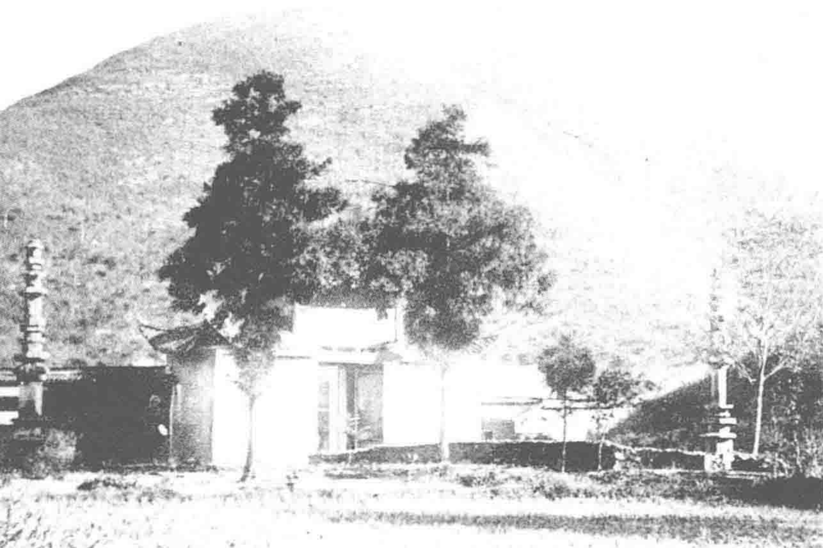
西湖的胜景，在山而不在湖。少年脚健，常爱作长途的山游。游山可分南北两路，北路出钱塘门，登宝石山，谒保俶塔，过葛岭，上初阳台，而后下至黄龙洞或岳坟，再过九里松，或绕道玉泉寺，而至灵隐寺与三天竺。南路出涌金门或清波门，过净慈寺，谒雷峰塔，绕法相寺至满觉陇，上烟霞洞，越杨梅岭，亦至三天竺。再有一路是出望江门谒六和塔，至云栖，而后上十里郎当岭，经虎跑寺，过龙井，下至茅家埠。无论走哪一路，都是清晨六七时出发，再回到市区，不但炊烟四起，而且灯火万家（这两句话是我们当时的中小学生，在记游文结尾时必用的语句）。

西湖游山，必须步行。虽则杭州有很好的山轿，以藤椅作轿身，直穿白木双杠，而萧山籍的轿夫，抬得又快又稳。轿夫在中途换班，不必将轿子停下，就在前进之中，已经换了肩，而坐在轿子中的游客，并不觉得。但这种山轿，只适宜于年长者或女眷。我们当时正值少年好胜，每次都是头戴白帆布帽，脚穿布鞋，在湖边临时折得杨柳枝条，削去外皮，便作为手杖，一路向山中走去。

西湖游山，不愁无憩足之所。山中多的是庵观寺院，

随时都可坐下吃茶，并且可以供应素斋。八大丛林的素菜，是有名的，其他寺院也都有素面素菜，足可充饥。走累了，就在庙中的长廊之下，或是客堂之中，睡上一觉。总之，尽兴而来，兴尽就走，不必预先排好游程。见庙烧香，逢佛叩拜，也不必预先排好时刻表，一分一秒都不能差池。有时候，一天走到了一二处。有时候，一天兼上了南北高峰。

西湖春季百花齐放，山色更为鲜艳。尤其是三四月之交，从虎跑到龙井，正值采茶时节。龙井村的人家不多，却散落得开，而家家都是采茶为生。山居女儿，提篮挈筐，高低错落在茶树丛中。虽则脂粉不施，却个个眉清目秀，衬映出湖山的天然颜色。尤其是茶农的家人，特别彬彬有礼。我们走累了，随便到那一家，都有新茶款客。所谓“明前”“雨前”，在大都市内异常名贵，而在茶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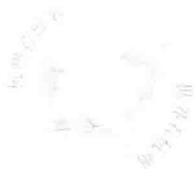
昔日虎跑头山门内



中，并不值钱。用瓦制的茶壶，煮开了山中的流水，泡上一杯，那茶色又绿又嫩，那茶香可远闻数里。所有烦尘俗虑，完全消除。只觉得世上名茶，能先天下人而尝得，真是一大福分。我们就这样一家一家吃过去，一直走到虎跑寺，和尚用寺中泉水煮开，泡龙井茶叶相款待，称为龙虎茶。而我们却少年好事，用罐子装了虎跑寺的泉水，再走向龙井寺，去泡茶吃。我们进入寺门，便向右一转，坐在有三间大的客厅内，四面都为浓阴所包围。厅外走廊上，另有一道栏杆。栏杆外面，杂花生树，群鸟争栖。大家走累了，或是坐久了，就走下山去，到九溪十八涧的源头处，洗一次足。在那重重叠叠的山中，随着曲曲弯弯的溪流，听丁丁冬冬的水声，那是天籁，人间哪得几回闻！

夏季，山中特别凉爽，尤其是大庙，多数在半山之上，庭院宽广，树木成阴。看和尚们晚课晨钟，焚香扫地，真是清凉世界。如果觉得登山太累，就可以在夏季的黎明，走到孤山放鹤亭，在长椅上，补睡一个早觉。亭的后面，长眠着梅妻鹤子的林和靖。亭的旁边，长埋着“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的冯小青。再过去，便是写《断鸿零雁记》的苏曼殊的千古佳城。对岸不远，就是“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的苏小小的芳冢，和尽忠报国的岳武穆祠墓。这一睡，睡在英雄、美人、高士、诗僧之间，却往往至人无梦。醒来一看，红日早经当午了。

现在回想到少年时代在西湖上的游踪，真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也写不完。



保俶塔

杭州西湖多寺庙，原亦多塔。如南北高峰，昔年均曾有塔。咸淳志载南高峰塔，天福中建，高可十丈。又载北高峰塔，在灵隐后山，唐天宝中建，高七层。但已迭经兵燹，均早已被毁。我幼年在杭，立在湖滨，只见有北面的保俶塔，与南面的雷峰塔，两塔隔湖相对。杭人称保俶如美人，雷峰如老衲。因为保俶塔建在湖的北面的宝石山上，经过几次的火灾，外层烧去了，只剩下了塔心。亭亭玉立，瘦削宜人。而雷峰塔则建在湖的南面的南屏山麓，却也是经过了火灾，而将塔心烧空，只剩下了外面残破的红色砖壳，有如和尚的百衲衣。

1924年秋天，雷峰塔忽然倒塌了。从此，西湖上就只有保俶塔，孤单地立在宝石山之顶。

宝石山，是西湖北面诸山的第一座山。出钱塘门不远，就到了山下。山并不高，拾级而登，也不费力。宝石山的原名是落星山，因为山上有落星石，石大数十围，块然无垠，望之如斫。钱武肃王为之改名为寿星宝石山，并命罗隐写了一篇封山记。孙应锵的《吴越纪事》诗，谓："怪石峥嵘号落星，封山遗事溯丹经。屏风曲院苍苔路，隐约摩崖旧刻铭。"就是指的这一件事。

至于保俶塔，乃系钱武肃的臣子吴延爽，在宝石山顶落星石旁所建。他请了善导和尚舍利，乃建了浮屠九级，并环以佛庐。原名宝所塔，又名应天塔。钱王又在塔旁，建了一所寺院，名为极乐庵，供奉钱氏三世五王的神牌，规定由钱氏子孙剃度者任住持。宋初，敕赐名为崇寿院，



一名圣寿禅寺。后又改名为龙恩院。民间则自宝所塔改名为保俶塔之后，也将此寺院，改呼为保俶寺。张羽曾有《保俶塔院》诗："赤兰闲倚化人宫，湖上春阴望不穷。百尺楼台空相外，万家城郭雨声中。斋房漏滴莲花水，讲殿经翻贝叶风。自笑世缘心似石，拟焚香柱问生公。"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已经是钱武肃王的孙子忠懿王在位。他原名为钱弘俶，奉召入都觐见。臣民希望他平安，并且能早日归来，乃将吴延爽所建的宝所塔，改名为保俶塔，隐有保护忠懿王的意思。忠懿王结果为宋太宗留住，未能回来。总算平安地在南阳国王府逝世，享年60岁。

民间关于保俶塔，却另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有一位嫂子，建此塔以祈求保佑她的小叔，也就是她丈夫的弟弟，故名保叔。一说是吴延爽原建的塔，后来倒了，由一位和尚名永保的，费了10年的时间化缘重行修建。一般人都呼

保俶塔旧影

永保和尚为师叔，因为系他重建的，故名之为保叔塔。孙应镠的《吴越纪事》诗，谓："宝石灵山枕碧湖，人思保俶起浮图。莫将僧号传闻误，九级玲珑挂绿珠。"可见这两种传说，都是不可靠的。

现在的保俶塔，是明朝的慧炬和尚重建的。因为永保和尚所修建的塔，在元末至正年间，已经被毁。慧炬重建的塔，只有七级，而不是原来的九级。他也重建了崇寿院，也就是保俶寺，后来又被火毁，塔的外层也烧去了。只有落星石，仍在宝石山顶，保俶塔旁，但是杭人已改称之为虾蟆石。因其形似几只大的蛤蟆，并列在一起。

清初，闽浙总督李卫，以宝石山形如翔凤，遂在保俶塔旁，建了一个亭子，名为来凤亭。这个亭子，现在还存在。秋清气爽时，岩石瘦削，风景特异。重阳登高，乃为最好的去处。厉鹗曾有咏宝石山亭的诗："雕亭高耸缓跻攀，一一峰峦佛髻鬟。更坐落星岩石上，犹言吴越旧封山。"周本孝也有《宝石凤亭》诗："宝石嵯峨结小亭，重重梯磴上高冥。壁通海岸疑流乳，岸卓云根认堕星。湖水四围涵淡白，岚光三面送遥青。天风戛击闻鸾吹，仿佛中宵和梵铃。"

佛千先生词云：

保俶塔

落星石，如虾蟆。宝石山，如凤凰。顶有保俶塔，亭亭着红裳。　　各占半湖光，南北喜相望；一自雷峰倒后，开奁照影凄凉。

雷峰塔

雷峰塔在西湖的南山，相传有雷姓者，住于南屏山的支脉上，因称为雷峰。至雷峰塔究竟系何人于何年所建，过去有若干不同的说法。而以吴越王妃，或黄妃所建，为最普遍。前者，见于《钱塘县志》。后者，见于《咸淳临安志》。

《湖壖杂记》谓："雷峰塔乃五代时所建，塔下旧有雷峰寺，废久矣。嘉靖时，东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纵火焚烧。故其檐级皆去，赤立童然，反成异致。俗传湖中有青鱼白蛇之妖，建塔相镇。大士属之曰：塔倒湖干，方许出世。"

著《长生殿》传奇的洪昉思（昇）曾记谓："杭州旧传有三怪：金沙滩之三足蟾，流福沟之大鳖，雷峰塔之白蛇。隆庆时，鳖已为屠家钓起，蟾已为方士捕得。蛇之有无，究不可得而知也。崇祯辛巳，旱魃久虐，水泽皆枯，湖底龟裂。塔顶烟焰薰天，居民惊相告曰，白蛇出矣！互相惊惧，遂有假怪以惑人者。后得雨，湖水重波，塔烟顿息，人心始定。"

白蛇与许仙相爱，而为法海和尚所破坏，是一则人蛇互恋的故事。人与狐鬼恋爱的传说甚多，《聊斋志异》中就有不少的记述。至人蛇恋爱，其假想更富有传奇性，因而也更成为西湖上的佳话。

雷峰塔为倭寇所焚，檐级既毁，人遂不能登临。塔砖外面全烧成红色，乃以夕照而成为西湖十景之一。民国初年，海宁杭辛斋先生曾撰文为记云：

时落日已隐山后，仅返照射入云际。红霞缕缕，与波

光相荡漾。南望凤凰诸山，蔚如佛头青，鲜润欲滴。而雷峰矗立其间，作肉红色，与岚翠掩映。平时颓然如老僧者，兹忽然如美女之出浴，媚冶艳丽，仪态万方。

1924年9月25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雷峰塔忽然倾圮，在塔砖中发见藏经，前有三行题字，计首行13字，次行与末行各12字。文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六月记。"乙亥，系宋太祖开宝八年。吴越国自钱武肃王以后，历晋、汉、周诸朝，最后纳土于宋，乃亡。刻经的时间，已亡国三年。至此，雷峰塔系何人何时所建，乃有了正确的答案。所刻的经文，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凡268行，并前后题记6行，共274行，每行10字。前题署下有画刻，右为佛三尊，左有一女膜拜。稍左，两人对立。其一，顶有佛光。其二，为女子合十南无。再左则殿宇，上有缨络，中悬宝灯，天华四散，下有山河大地。经本



雷峰夕照



卷成小束，置于塔砖之内，用泥封口。如果塔不倾倒，是不会发觉的。我看到过的藏经，有用淡黄色薄麻纸印的，有用白棉纸印的，皆不一定是真品。因为塔倒之后，有人在塔砖中发现了藏经，于是人人都到塔基去翻寻塔砖，打开厚重的红砖，寻觅经本。也立即有人，翻刻翻印，希售高价。

1924年秋，浙江督办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争夺地盘，发生内战。浙江省会警察厅厅长夏定侯（超），勾结福建省督办孙传芳，自浙闽边境进入浙江，以掮卢军之背。雷峰塔倾圮的时间，正是孙传芳军队到达江干进入杭州的时间。据说，当时轰然一声，杭州人民皆不知发生何事。其时，先君为避军阀内战的战祸，率全家住在上海。过了几天，才有人从杭州将塔砖的藏经送到上海来，给先君看，我也才第一次看到。先君向不收藏古董，看过也就还给送来的人带走。此后我曾多次看到，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在许多收藏家或朋友家中看到，真伪不辨，我也未曾留存。

据说，当年建造雷峰塔的时候，本拟千尺十三层。因财力不充，先建七级。并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到了清康熙年间，已只存五级。而塔之外围建筑，已全部被毁。所存五级，砖皆红色，乃系经过火焚之故。所幸者，砖大且坚，用泥封口而藏在砖内的经文，竟尚有完整者。惟钱俶当年系印有八万四千卷，应该是放在八万四千块砖中。到了塔圮经现的时候，决没有这许多完整的经卷出现，是可以断言的。至于雷峰倾圮之后，是否有白蛇出现，那就更无人知道了。

1929年，浙江省政府举行西湖博览会，曾拟就雷峰塔塔基建天文台，因经费无着，未能实现。抗战胜利之后，也曾有旅沪商人，拟发起募捐修复。因需款太多，亦未得成。至雷峰塔藏经真迹，台湾颇有收藏者。时经千载，价值可知。

佛千先生词云：

雷峰塔

古塔镇精灵，中有蛇美人，小白携小青。大士慈悲留玉音：古塔倒，便许尔，入红尘。　　蛇最美，宛转态，缠绵情。况修为苦辛，修道乃通神。宜结奇缘仙侣，生憎多事愚僧。

古塔倒，千载出藏经。经前刻画：佛三尊，一女拜盈盈；二像对立，一女南无合十，一佛顶上光腾；殿顶垂络缨，中悬宝灯，天华四散，山河大地光明。　　是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八万四千砖，精建浮屠七层；永充供养，历劫火，经犹存。贤王弘愿，功德叹无伦。

六和塔

六和塔，为杭州现在惟一可以登临之塔。塔建于钱塘江边月轮山上，又称为龙山月轮峰。系吴越王，就南果园建寺造塔。寺名开化，塔名六和。最初用意，系在镇压江潮。大概钱江大潮，每日子午两次，自海口入内，至此潮势已衰。我幼时尝随亲长，至南星桥看潮，可见江潮已不能上抵江干三廊庙一带。

据《杭州府志》记载：六和塔原为九级，高五十余丈。经历次兵燹，一再重建。现存者，系清雍正十三年，发帑鼎新，只存七级。全部用砖木建成，每层有木梯，人可以登至最高层。每层面面有窗，自窗中外望，则或为钱塘江，或为山岭。钱塘江自富阳以下，曲折如之字，故亦称之江。自六和塔上眺望江流，曲折益为明显。对江为西兴，乃浙东西来往孔道，村落可见。钱塘江大桥未建成以前，行旅咸赖义渡。大桥建成以后，汽车火车固可直达，但行人仍须搭乘渡船。大桥桥址距六和塔不远，公路后亦筑至寺前，游客乃可乘车到寺，不必如昔年之步行。寺并不大，塔则在寺内之左方，一若平地楼台，巍然矗立。

开化寺与六和塔，历代题咏之诗甚多。尤其是清乾隆帝，六次南巡，均曾到寺中，题有诗句，侍臣亦皆有和作，均载于《南巡盛典》。民国初年，俞恪士（明震）寄寓杭州，曾有六和塔诗：

铃语层层风雨寒，支筇人老怯凭栏。

之江到此霸图尽，病雁横空来日难。

肯与西湖作屏幛，可容东海镇狂澜。
潮痕不没云栖路，佛火墙灯夜夜看。

其第三句至第六句，最能道出六和塔位置的重要。盖我国各地建塔，除佛教上的意义外，实尚含有了望与指标的两种功用。故建塔之地，多为水陆交通要冲所在。六和塔建于杭州江干，其功用亦同。1945年10月，抗战胜利，我自浙东复员杭州，自桐庐乘民船下驶，远远见到六和塔塔顶，即知杭州已近在目前。八载归来，首先映入眼帘者，即为此塔。船再下驶，复经几折，方见到横卧江上之钱江大桥。同舟者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狂呼，此为平生所最不能忘者。

自六和塔下越岭而行，可达西湖南山之云栖。有寺名理安，以竹林著名。修篁万竿，人面为绿。亦可经九溪茶场，循十八涧而至龙井。沿途水石交错，游者须赤足而过。俞诗谓为西湖作屏幛，信然。

我最后一次看到六和塔，是在1948年冬季，到江干梵村，送陈布雷先生灵柩安葬。天寒地冻，行礼后即回城，未及再登临塔顶，一眺两浙。不久，离杭来台，除偶于照片中见到塔影外，久不知其情况何若矣！



里湖诸寺

西湖周围30里。其在白堤以北的湖面，称为里湖。

湖上多寺庙，南朝四百八十寺，尚不足以形容杭州及其附郊的寺庙之数。

西湖大庙，分布在三面的山中。以往湖上的交通，全恃瓜皮小艇。至于山中，则只有步行或坐轿子。抗战以前，湖上的马路，已经可以直达灵隐、龙井、虎跑、云栖、理安诸大庙，来往较前大为方便。这些大庙，均古木参天，庭院深广。不但僧舍宽阔，可以由和尚随时挂单。并且也有极为雅洁的禅房，与极为可口的素斋，可以招待宾客。

但是一般到西湖游览的游客，却多住在里西湖的寺庙，尤其以夏季度假者为多。取其距城较近，并且随时可以游湖。在钱塘门外的第一个大庙，是昭庆寺。这是与灵隐、天竺，同样可以启建水陆道场的丛林。最初建于吴越王时代，其后迭经兵燹，多次毁而复建，规制崇闳，并以芍药花著名。王涣曾有《昭庆寺看芍药》诗：

一半春光过牡丹，又开芍药遍禅关。
久辜往约违莲社，今续清欢到宝阑。
垂露几团花面湿，东风一阵燕泥寒。
酒边何味呈奇供，绿笋朱樱正满盘。

北伐以前，我曾在昭庆寺中住过一个星期。庭院深深，几与凡世隔绝。看和尚们晚课晨钟，焚香扫地，真是俗虑全消，超然物外。抗战胜利以后，在浙江省境内的日

军，全数缴械投降，军用机关就将投降的日军，集中居住在昭庆寺内。其房屋之多，可以想见。

自昭庆寺西行，一直到凤林寺，沿着里西湖，尚有不少的寺庙。规模虽则不大，但也皆可供游客借宿。其中如广化寺，是明初刘伯温（基）所复建的。自汉至明的历代先贤，皆予奉祀。并有六一泉，以纪念欧阳修。寺有张祜所撰的联句：

不雨山常润，
无云水自清。

又有集白居易句的一联：

烟波淡荡摇空碧，
楼阁参差倚夕阳。

与集林和靖句的一联：

白公睡阁幽如画，
张祜书碑妙入神。

但两联的集者，均不详。

又如智果寺，是苏东坡在杭州任太守时所复建的。盖东坡在黄州的时候，曾在梦中得句，谓“石泉槐火一时新”。待他到了西湖，看见智果寺的风景，竟与他在黄州梦中所见者相同，于是请他的朋友参寥子为住院，并约了诗友16人，到寺中分韵赋诗，一时称盛。

又如玛瑙寺，台湾连雅堂（横）先生曾于民国初年，率其公子定一（震东），在寺中住过一段时期。雅堂先生



谓："西湖山水之胜，出于天然，犹美人之不事雕饰也。"又函其夫人，谓："他日将偕隐西湖，悠然物外，共乐天机。"并附诗：

一春如梦复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
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但雅堂先生的移家湖上之愿，后来并未能实现。

再如招贤寺，供有来自西藏的玉佛。慈悲、庄严、圣洁，为我常去的地方。寺中尚有苏子瞻题的"蒙泉"石刻，极为难得。弘一法师圆寂后，曾有灵骨在该寺供奉，后移至法师当年出家所在的虎跑寺。

至于凤林寺，也规模宏大，可以启建道场，俗称喜鹊寺，寺内有君子泉。

里西湖的大小寺庙，均面临湖水。而在夏季，则水面尽是荷花。新莲新藕，是却暑的最佳果品。院中则多种竹，修篁万竿。僧房多属面南，悬有竹帘。晨起将竹帘半卷，则荷香扑鼻。晚睡将竹帘半卷，则新月入房。泡上一杯龙井茶，手摇细芭蕉扇，与二三友好，无所不谈。暑气全消，神思皆爽。而后持古人诗卷，倚枕入眠。其中雅趣，不是现在住在冷气房间中的人，所能想象与领会的。

佛千先生词云：

里湖诸寺

藏山庙多，棋布星罗。最喜里西湖，诸刹对清波。院内万竿修竹，门前十里风荷。　智果寺，东坡梦中得句；招贤寺，子瞻题碑可摩。曾约闺人偕隐，雅堂湖上吟哦。

湖上庄屋

杭州西湖，多私人别墅，称为某庄某庄。其在南山者，集中于苏堤之端，定香桥畔。曰高庄，曰廉庄，曰刘庄。

高庄，系杭州双陈巷高姓所建。西湖的庄屋，多属于他省或他县人氏。只有高庄，是真正杭州人的产业。高氏以经营茶叶起家，遂在苏堤之西，定香桥“花港观鱼”原址之后，于清光绪丁未年，建成别墅。名为红栎山庄，亦称豁庐，俗称高庄。园广十五六亩，前含山色，后挹湖光。布置精雅，引人入胜。万竿丛竹，尤饶娴静。临湖红楼，架为水阁。五色文窗，至为雅致。有一楼曰鸥渡，俯瞰园景，历落在目。俞曲园（樾）曾为高庄书联，谓：

选胜到里湖，过苏堤第二桥，距花港不数武；
维舟登小榭，有奇峰四五朵，又老树两三行。

高庄主人爱鹤，豢于庭中，不加樊笼。客至，则侧睨长鸣。其后鹤死，即于庭中立一鹤冢，由吴昌硕书碑。高庄之旁，有自然居，出售酒菜。

廉庄，与高庄望门而居，系廉南湖所建，名小万柳堂。后以负债，售于蒋氏，遂改名春晖别业，俗称为蒋庄。亭台位置，一仍其旧。有夕照亭，正对雷峰古塔。亭下长桥，跨水数十丈。另有西楼，为吴芝瑛夫人写经处。吴善写瘦金体，得者皆视同拱璧。庄旁为陈老莲的藕花居故址，后亦并入庄内。小楼一角，仍为旧状。抗战胜利之



后，国立西湖艺术专校借庄屋为教授宿舍。诗人画家，聚居其中，遂成为湖上雅集之地。

刘庄在丁家山下，园名水竹居，系广东人刘问刍（学询），于1909年建成，大厅曰恩荣堂。刘曾自撰联，谓：

> 五月荔枝香，千里乡心归未得；
> 六桥杨柳绿，两家春色共平分。

查良亦有题刘庄联：

> 先生何许人？天半朱霞，云中白鹤；
> 君言不得意，风情张目，霜气横秋。

刘以豪赌起家，曾在清政府，捐得候补道，二品顶戴。后亦以赌倾家，其所有之上海沧州饭店，与刘庄之

昔日刘庄

半，皆售于他人。刘有妾12人，乃在园中置一大坟庄，以其本人之墓居中，并为12妾，筑12生圹环绕之。待刘失败，除第十二妾外，皆纷纷散去。刘本人既逝，杭州市政府禁止在西湖中营葬。因此，其大坟庄乃皆为空穴，徒供游客之谈助而已。

另有宋庄与汪庄，亦皆著名。宋庄在里六桥金沙港口，原为杭州清河坊四拐角孔凤春香粉店的产业。建筑年代，与高庄同时。高庄豢鹤，宋庄乃蓄孔雀，此为杭州当时所不易常见者。宋庄占湖面极广，而楼台紧凑，花木局促。后售于郭姓，乃改名为汾阳别业。

汪庄在南屏净慈寺附近，原名清白山庄，系旅沪安徽茶商汪姓所建，其时当在1922年至1923年间。汪在上海所设之茶叶店，名汪裕泰。汪庄在建筑时，侵占西湖湖面甚多，杭人讼之于官，汪允俟其百年之后，将庄屋捐赠地方政府，作为公用，始免拆除。汪庄主人好琴，特在庄内建精室数楹，名曰琴堂。并雇琴工制琴，名曰汪琴。1928年6月22日，我夫妇第一次游汪庄，曾见有古琴多张。迨抗战时期，杭州沦陷。日寇在庄内驻军，并作为马厩。胜利之后，我军接驻，迭有换防，仍行养马。古琴早已无存，某日，琴堂正梁忽然折断，屋顶亦圮。原因是年久失修，以致梁木腐坏。幸未有人在屋中，未曾伤人。汪庄在战前，并以莳菊著名。山阪石隙，皆为菊花所布满，不知几千万盆。沦陷期中，悉遭凌夷。

至西湖庄屋之在北山者，则自钱塘门外始，为九芝小筑，为余姚旅沪商人黄楚九产业，俗名黄庄。为徐庄，系海盐旅沪徐姓之别墅。临湖数亩，屋少而精。为中行别业，原为王克敏第九妹之私产，因负债而归于杭州中国银行。占地不多，精致殊甚。为青莲精舍，为吴兴南浔刘氏所建。依山面水，极见匠心。山上多奇草，且植有何首

鸟。叶如爬墙虎，幽香若兰蕙。为秋水山庄，为上海名报人史量才之别业。我在以上各庄屋中，曾见有集句一联："近水楼台先得月，落花时节又逢君。"但已记不起是那一家了。为葛荫山庄，已在里西湖，与孤山隔湖相对，主人为洞庭葛氏。门临大道，双环常掩，往来均由湖道。盖荷花深处，刺艇相迎，其中另有佳趣。为杨庄，乃杨味春在清末所建。其在路右者，为孤云草舍，系吴兴刘梯青的产业。屋系砖造的红色五层洋式楼房，因建筑较高，故在湖滨就可以望到。1937年，朱骝先（家骅）先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以与屋主是同乡，故借住在其中。抗战发生后，许多重要的会议，也在此屋举行。我当时曾笑说既非草舍，也不是孤云。屋主题名，未免不实。朱先生说：孤云系因隔水与孤山相对，而山上有"孤山一片云"五字石刻。至曰草舍，乃属谦辞。



昔日蒋庄

杨庄与葛荫山庄，均系中国式庭园建筑。回廊曲院，布局不凡。在陷敌时期，湖上庄屋，均曾住日军，因之悉遭破坏。抗战胜利，浙江省通志馆由余樾园（绍宋）氏任馆长，馆系在战时于云和成立，复员之后，亟待有一馆址。且其所收集之文献资料甚多，亦需有一宽敞而安静之

处所，以便庋藏整理。我乃征得杨庄主人同意，由省府拨款修理，以为该馆办公地址。次年，接周惺甫（钟岳）先生信，谓吾浙大儒马一浮先生创办之复性书院，拟自四川迁杭，诸洽借院址，乃与葛荫山庄主人商洽，即获其同意。自是馆院相邻，图史互校。余马二老，亦相得极欢，成为浙江学派复兴之地。

马先生原名福田，晚年又自称蠲叟，浙江省嵊县人。嵊县马氏，以“福遵其初导正昭平”八字为世系，周而复始。马先生属福字辈，在当世辈分中为甚高。马氏后人有迁居杭州者，有迁居湖州者。但其谱名均仍照世系，可一望而知其辈分。我于马先生之经学造就，固久所景仰，但至书院迁杭，始得亲聆其教益。

1927年夏季，浙江省司法厅同人，假葛荫山庄公宴先君，我得随侍。时值黄昏，在庭院中，忽为黄蜂所袭。一时惊动多人，未得入席，先行送医。复性书院迁入之前，我忆及20年前旧事，特嘱工友检视树木，见有蜂巢，咸为除去。在杭之日，我常于晚衙散后，或休沐之晨，往访二老。小舟初系，二老已煮茗相候。于是背倚葛岭，面对孤山，文史纵谈，杂以笑谑。加之窗外柳色，湖上荷香，拂面者清风，照影者新月，每致忘归。惟某次，刘百闵兄由上海到杭，住在复性书院。我晚间往访，由大门进入,未曾注意门内台阶，较马路为低，以致倾跌，虽幸而未伤筋骨，但已须跛行，良久始得恢复，百闵兄至表不安。所巧者，我两次在葛荫山庄，遭遇意外。时间相隔，前后达20年。

西湖湖上的庄屋，经常对游客开放。任何人往游，侍者必奉香茗，勾留久暂，皆无不可。而庄屋的主人，经年难得一至，至亦未必久居，真正做到观皆自得，兴与人同的境界。



佛千先生词云：

小万柳堂

廉庄旧主知名，小万柳堂柳深。遥对雷峰塔，堂前夕照亭。忽讶红裳冶艳，明湖照影娉婷。　　度桥西行，长虹水上横。西楼净绝尘，芝瑛夫人，瘦金写经。更有老莲故宅，丹青千载扬芬。

水竹居

丁家山下刘庄，主人豪放荒唐。买得道员二品，居然红顶辉煌。　　豪赌兴，豪赌亡。十二金钗下堂。游人指点，十三生圹，空对斜阳。

三家庄屋

汪庄主人好琴，琴堂临水数楹。抚琴乃复爱菊，千花万蕊香清。　　青莲精舍，奇草有幽馨。孤云草舍，门对孤山一片云。

杨庄葛庄

樾园蠲叟，天下慕清光。劫后结邻湖上，借得杨庄葛庄。　　小舟载得诗人至，文史喜商量。茗边有，窗前柳色，槛外荷香。



四照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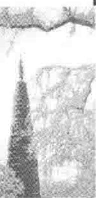
我在杭州时，常爱到外西湖的西泠印社四照阁品茗。

西泠印社在中山公园之旁，实亦系孤山向南方面的一角。

现在的孤山，只指从放鹤亭到西泠桥向北的一段，包括林和靖墓与一片梅林在内。在其向南部分，则划为中山公园与西泠印社，隔以短墙，互不相通。所以，从西泠印社的后山，可以看到孤山之麓的苏曼殊大师墓，却不能直接下达。而在后山的入门处，则悬有联句，为：

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
心心相印，因人传地地传人。

西泠印社是清光绪二十九年成立的，由丁辅之、王维季、吴石潜、叶品三等发起。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主旨，并推吴昌硕为社长。吴，浙江省安吉县人。只进了学，未能中举，遂纳赀为吏，分发在苏北安东县任典史，曾代理县令一个月。时先君适亦在该县任幕友，遂得订交。后来，吴在上海卖画时，常有画幅寄赠先君。我家住杭州青年里时，大厅正中挂的，就是吴氏手绘的铁网珊瑚图。吴氏于1927年冬逝世，享年84岁。其门弟子征集其遗作，为刊印遗集，我乃将该图寄去。此后我赴巴黎求学，回国后亦不知应向何人取回。至于其他画赠先君的作品，也在迭次变乱中丧失了。吴昌硕曾写有《西泠印社记》。也曾为印社写了门额，并写了一幅对联：



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
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瓮，一耕夫来自田间。

西泠印社建在小丘陵之上，入门有一敞厅，而后可分左右两路登山。在山上正南方向，又有一敞厅，就是四照阁，可以看西湖全湖的风景。大门内的敞厅，无门无窗，而四照阁则有门有窗，皆用玻璃。故光线极好，视线极远。在四照阁中，有香茗供应。杭州盛产龙井茶叶，加以用印社内的泉水煮沸冲开，又用瓷质的盖碗盛着。碗盖一开，茶香扑鼻。至茶色之清，茶色之美，自更不必说了。若有二三友好，不论阴晴雨雪，也不论晨夕春秋，在四照阁坐下，眺望全湖，品茗闲话，谈诗论文，平章风月，真是人生最大的福份。

西泠印社既以研究印学名，故对于印学的前辈人物，至为尊敬。印学原分为浙皖两派，浙派以丁敬为代表，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丁是钱塘人，邓是怀宁人，在印社中各有一石像，加上吴昌硕的铜像，称为三老。

在三老的石像与铜像之后，有一石室，名为小龙泓洞，内置东汉建武二十年的一块石碑。这是清咸丰二年，在我的家乡余姚县客星山周家出土的。从刻石到出土，经历了1800年。从出土到现在，又已将100年。余姚县志，称此碑为浙东第一石，碑额残缺，碑文尚存217字。这一方石刻在出土之后，运到上海，有日本商人愿出高价收购，运往日本。事为西泠印社的社友所闻，乃集资银元8000元，将其购得，运到杭州西湖社中，特辟石室，予以珍藏。

在山壁上，另有一个印藏，那是弘一法师于1918年在西湖虎跑寺出家以前，将他自己所刻自己所用的印章，在


四照阁

岩石上凿了一个洞，予以封藏。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河北省人，曾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音乐与美术教员。我于1920年在一师肄业，他已出家近两年了。

整个的西泠印社，面积只数十亩，因系依山势布置，故蜿蜒曲折，峰回路转。一路有乔木修篁，亭台泉石。除四照阁外，尚有蓟苏亭、仰贤亭（亭中有丁敬身像）、凉堂、宝印山房、观乐楼、题襟馆，皆散落在茂林修竹之中。又有华严经塔，瘦弱不高，却分为12层。自第二层起，每层皆有浮雕佛像。

西泠印社所制的印泥，为全国之最佳者。我平时对于文房四宝，向少留意。平时所用者，亦皆非上品。但每有友人游杭，常陪其往西泠印社买印泥，而我自己却从未买过。

佛千先生词云：

西泠印社

分占孤山千古青，处士与诗僧。龙泓洞，汉时碑，出土播幽馨。更有大师弘一，凿崖藏印，留与有缘人。
西泠印社，金石传芬，铸像三老尊。依山高下，有亭台泉石，修竹茂林。高阁嘉名四照，湖山都入吟樽。

楼外楼

西湖楼外楼之取名，当系自宋人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而来。惟宋人之所谓楼外楼，系泛指湖上的崇楼叠阁而言。一若山外青山，并未指明系某一座山者然。

西湖之有楼外楼菜馆,始于清代晚期，盛于民国。其地在白堤之尾，孤山之阳，公园之旁，与俞楼及西泠印社为邻。初系平房，后改建为三层楼房。登楼平眺，全湖在目。故实际上系楼上有楼，并非楼外有楼。

民国成立以前，因有驻防旗营，将杭州城与西湖阻隔。其时游湖人士，必须出涌金门，故涌金门外，乃为游艇停泊的码头，市肆也集中于此。其时最有名的菜馆为西悦来，茶馆为藕香居。杭州初有照相馆，名二我轩写真，均开设在此。

民国成立，旗城拆除，辟为新市场，杭州乃得与西湖重新连成一片。西悦来乃迁至新市场的迎紫路吴山路口，藕香居则告停业。自此游西湖者，多改道出钱塘门，过断桥，历白堤直至平湖秋月。平湖秋月只售藕粉，孤山放鹤亭只供香茗。如要用膳，则必须到岳坟旁之杏花村。但杏花村不临湖面，看不到山光水色。论地利，自以楼外楼为胜。

楼外楼的建筑，是中西合璧的木造房屋，宽敞轩朗。虽有三层，而要看湖景，则以二楼临街的座位为最佳。楼前有大树成围，修建环湖马路时，本来要伐去。为杭州市市长周象贤所闻，亲往察看，决予保留，遂成为当地居民的共同遮阳之树。车辆来往，也悉皆绕树而行。且因此树

保留，外公园门前的一株枫树与一树梅花，虽均在大路之中，也未因改筑马路被伐。一则在秋天，叶红似火；一则在冬天，花放宜人。

周市长是楼外楼的常客，凡外来游湖者，多拜访市长，市长也必须设宴款待，其地点则多在楼外楼。楼外楼的名菜无多，只不过是醋溜鱼、莼菜与抢虾等。当时杭州宴客，甚少大盘大碗，更少用整桌全席。加上游湖的人时间宝贵，要多有点时间徜徉于山水之间，不能在酬应上，太多花费功夫。所以不必劝导节约，自然就并不浪费。抗战前后，我与周在楼外楼同做主人的次数甚多，有时也做他的陪客。主客都很随便，几样便菜，一壶好的陈年花雕，就已经尽欢了。

楼外楼有一茶房，名阿丙，我迄不知其真姓名，是周市长最熟悉的。周去，一定由阿丙招待。主客几人，阿丙不待关照，早将酒菜代为备齐。不会不够吃，也不会多得吃不消。并且算账的时候，物既美而价又廉。我与朋友去吃便饭，阿丙知道我是周市长的好朋友，也能享受同样的最优惠待遇。

楼外楼主人雅好交结文士，备有极大极好的题名簿，请来宾签名。能诗能书能画的，就当场挥毫。如果另外用宣纸写，就嵌在四壁的玻璃框内。抗战胜利以后，我去看，好多墨宝，都并未因战争而遭损失。

醋溜鱼又名宋嫂鱼。据武林旧事载："宋淳祐间，每逢德寿三殿，幸游湖山，小舟时有宣唤赐予。汴酒家妇宋五嫂，善作鱼羹，至是侨寓苏堤，尝经御赏。人竞市之，遂成富媪。"可见宋嫂系来自河南，随宋高宗南渡。但其所制之鱼羹，是否即为今日之醋溜鱼，尚待查考。至宋嫂所寓者，系在苏堤，当系在今日岳坟与金沙港之间，而非现在楼外楼之地址。



楼外楼主人在楼前湖中，置一竹笼，内养活鱼若干尾，客至则现烹之。楼外楼旁，后开设有太和园；右邻俞楼，亦曾于抗战胜利后，开设菜馆。在灵隐寺山门口，又有天外天菜馆，均能制醋溜鱼，但均不若楼外楼者之可口。在新市场花市路，有孟永泰开设的天香楼，亦售醋溜鱼。抗战时期，孟移至上海开设。后又移至香港九龙吴淞街开设，此为西湖醋鱼自杭州出口之始。但因其鱼非出自湖水中，总觉得不及楼外楼者之鲜美。

1948年6月8日午，我与周市长在楼外楼，约自京沪来杭游湖之陈芷汀（方）与何叙甫（遂）二君便饭。二人皆诗画兼长者。陈为楼外楼主人即席绘墨竹一幅，并题一联：

楼外揽西施，风情最爱花雕酒；
坟前拜苏小，姤意难忘醋溜鱼。

今忽已20余年，周陈在台湾先后逝世，何闻亦死于大陆。此画此联，是否尚在楼中，则不可知了。

佛千先生词云：

楼外楼

楼外楼，一句诗，美名扬。水色映山光。难传贵客题名簿，不朽茶房记本杭。　　醋溜鱼，溜乃嫩，醋而香。南渡说沧桑，不道赵官家忍辱，却教宋五嫂留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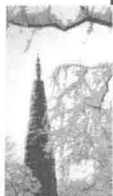
俞　楼

俞楼在杭州外西湖，系纪念清代浙江省的第一位学术大师，俞曲园（樾）先生者。

俞原字荫甫，于道光元年（辛巳）十二月二日，生于德清县东门外乌巾山阳南棣的喜鹊楼。祖父廷镖（南庄）公，是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恩科钦赐副贡生。父亲鸿渐（仪伯）公，是嘉庆丙午科举人。曲园6岁从母亲读书，就能过目不忘。7岁，与其舅父的第四女姚氏订婚。16岁，初应试补县学生。24岁，中恩科举人。30岁，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

他在应礼部试的时候，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其诗句有云：“花落春仍在。”时曾国藩任阅卷官，见句大为赞赏，说是咏落花诗而能够脱却衰飒气味，可与宋子京的“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存半面妆”相比美。35岁，初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按例，初入国史馆者，多自认编修列传，曲园独签名兼修志传两种。他说：“意在多研求清代的史实。”不久，外放河南学政。37岁，为御史曹登庸劾其试题割裂，被免官回北京。他百感交集，写信给曾国藩说：“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风行仍回，间符落花之谶矣。然穷途著述，已及百卷。倘有一字流传，或亦可云春在乎？”后来，用“春在堂”做室名，并为其著作的总称。

次年，曲园绝意仕途，南下苏州的紫阳书院讲学。后来又在上海的求志书院，德清的清溪书院，归安（今吴兴）的龙湖书院讲学。而以在杭州的诂经精舍，担任山长



达31年之久，真是前无古人的了。张佩纶、吴大澂、陆润庠、三多、章太炎、徐琪，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彭玉麟住在西湖三潭印月，时驾小舟来访，二人交往最乐。



俞　樾

曲园在这数十年中，一面讲学，一面著书，共成书250余卷。他说："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与假借。"所以他确可以当朴学大师之名而无愧。假如他当年不被御史参劾，一生升沉在宦海之中，决不会在学术上有这样大的成就，也不会留下来这样丰富的著作。所以一个人的际遇，幸与不幸，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曲园寿至86岁，其孙陛云，小名阿龙，于光绪甲辰科，以第三名进士及第。后典试四川，举经济特科。陛云之妻，即系彭玉麟之长孙女。陛云之子平伯，在北大任教多年，以研究《红楼梦》著名。

曲园讲学多年，但其经济情形并不佳。其在苏州的马医科巷房屋，是李鸿章、顾文彬等所赠。曾国藩尝谓："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李俞均为曾氏所特赏的人物。晚年，由门生徐花农等，为其筹款在西湖六一泉旁，建一小楼，面临外湖，就是俞楼，为其著书修养之所。曲园自己撰有长联：

合名臣名士，为我筑楼。不待五百年后，斯楼成矣。
傍山北山南，循地选胜。适在六一泉侧，其胜何如？

抗战以前，俞楼改建为西式三层楼房。抗战后，复租给别人开设菜馆，与相邻的太和园与楼外楼，并列为三。

曲园临终时，曾有自挽联：

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斯亦足矣。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落落，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乎。

佛千先生词云：

俞 楼

花落春仍在，好句足千秋。门下名臣名士，傍泉为筑俞楼。 儒将最风流，相访驾扁舟。成就名山著述，多亏御史弹纠。

杏花村

杏花村的开设，时在民国初年，但并无杏花。地在岳坟之旁，其左邻为凤林寺，为西湖八大丛林之一。店主似为余姚人，已忘其姓名。大门为当时之新式红砖建筑，门并不大。入门向左为一排平房，并无间隔。正中则为一茅亭，亦无门窗。据传说茅亭之下，本为一孤坟，肆主先在坟上建亭覆盖，乃渐渐将坟移去。

游客无论循陆路，或循水路自湖滨乘舟至岳坟，午刻必须用膳。在岳坟前面，亦有数家小食店，店主皆姓岳，传系武穆公后裔，无法详加考证。店既狭小，设备更属简陋。杏花村开设以后，生涯乃甚鼎盛。至其所售之酒，自系绍兴酒，有远年、花雕及竹叶青等。其时人多闲暇，得有时间品酒。故座上之客，虽则常满，但其中却不乏亘数小时不去者。

其后，在杏花村旁，有人建筑西泠饭店。民国以后，里湖先建有新新旅馆及惠中饭店，两处均面对湖光，与孤山隔水相望。新新旅馆为四层红砖新厦，在湖滨即可望见。惠中饭店屋虽西式，而有花木回廊，似较幽静。西泠饭店则全为西式楼房，在浓阴之中。凤林寺晚课钟声，清晰可闻。1931年以后，陈定山兄又在杏花村与西泠饭店之间，开设蝶来饭店。屋系新建，兼采中西建筑之长。盖定山兄原名小蝶，蝶来系其自称。开幕之日，约胡蝶与徐来自上海到杭剪彩。遂更符蝶来之名，盛况空前。抗战军兴，西湖沦陷，定山兄谓果真敌（蝶敌同音）来矣。胜利回杭，定山兄于残破之余，重加修葺，再行复业。友人中

有劝其改名者，定山兄谓今敌人已投降，何必更名？

饭店既多，杏花村之营业，自受影响。尤其楼外楼、太和园先后开张，面临外湖。登楼一望，全湖在目。加以白堤改为马路，敷设柏油，交通大为便利，游人乃咸在楼前停车。又有人租俞楼开设菜馆，屋虽不大，但入门有太湖石，并莳有花木。杏花村既不临湖，肆主又未知更求进步，遂在无法竞争之下，遭受淘汰。抗战以前，我于1937年10月，最后一次在其地晚饭，系应朱骝先、伍俶傥二氏之约。朱原善饮，是晚独尽数觥。胜利之后，重过其地，则门已不存，屋亦倾圮。若非素知者，几不能复识。

至在湖滨，以沽酒著名者，则为碧梧轩。来者皆真正善饮之客。坐高凳，把大碗，以花生、黄豆或豆干下酒。相对清谈，兴尽则各自言归。昔时物价低廉，所费无多。

佛千先生词云：

杏花村

杏花村，碧梧轩，记游踪。酒徒尽散，莼鲈空忆，惆怅对秋风。　　蝶来饭店最崇闳，开幕两星红。旧日风流少主，今朝海外成翁。

岳字草堂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0月，复员杭州。为整理西湖名胜古迹，每于假日至湖上游览。有时为视政之便，虽非假日，亦常在山水之间。

时杭州小学教育，亦正在复员之初。市立小学中，以设于新市场学士路与浣纱路间之天长小学，最为著名。私立小学，则以惠兴小学与弘道小学为佳。两校亦均在新市场。一在惠兴路，一在浣纱路底。

西湖周围30里，因住户不多，故小学甚少。龙井旁有龙井小学，在半山之上，立于其操场中，可俯瞰全湖胜景。校舍不大，但甚为整洁。学生不多，皆茶农子弟。因系生于名山之中，在茶丛中成长，个个皆眉清目秀，活泼聪明。我曾向当时杭州市市长周企虞（象贤）兄言，颇思晚年能到龙井小学任一教员，因我爱饮茶，而该校风景幽美，学生又极为可爱。周笑谓："君非师范毕业，无小学教员任用资格，此种清福，不能属君也。"

自龙井以南，皆称为南山。而西湖则以北山方面住户较多，尤集中于岳坟一带，竟缺乏一设备完善之小学。我某日过岳坟，曾问在岳庙前开设茶肆之岳武穆后裔，何以不送子弟入学校读书，则以附近无小学对。我乃以告之周市长，周谓岳坟之旁，原有精忠小学，以湖山春社为校址。创立于1924年，由黄文叔（元秀）先生主持其事。杭州陷敌，遂致停办。今当助黄复校，乃聘武穆王后裔岳邦麟任校长，于1947年夏开学。岳在之江大学教育系肄业，热心校务。有学生110余人，皆免学费。岳氏子孙及清寒

子弟，并杂费亦免收。惟自岳坟以迄灵隐，其间共有九华里，住户亦逐渐增加，另无小学，我久思能由杭州市政府再设一所，而市府困于经费，无能为力。

1928年春，先君逝世，在石莲亭营葬。我常往督视墓穴工程。每自湖滨乘瓜皮小艇，至岳坟登陆，而后步行，或换乘人力车，经九里松而至墓地。在过岳坟约里许，辄见道左东山街，有一玻璃圆顶房屋，类似天文台，屋亦系圆形，而颜其门曰卐字草堂。虽曰草堂，实系西式建筑。每当夕阳在山，数里外望之，圆通光明，射澈湖面。某日，特下车入内参观。有一老者司阍，谓屋主姓卢，粤人，住上海。此屋乃系专为绘奉佛像而建者。乃见全屋满绘壁画，系西方极乐世界图，共有千佛。画者为陈晓江，晓江病肺，画510尊而殁，余由张聿光补成。其所以用玻璃圆顶者，乃为采光计。我虽无宗教信仰，但其所绘背景，庄严美丽。壁上诸佛，皆具妙相。至感宗教与艺术相结合，诚足动人。圆屋之后，尚有平房若干间，亦皆宽敞整洁，布置不同凡俗。

1945年，学生张正方来访，张原籍杭州，战时应特种考试及格，分发浙民厅服务，从我任事，方只18岁。其后赴厦门大学升学，我只闻其已大学毕业，但迄未见及。张谈及住西湖卐字草堂，因其与屋主为亲戚，顺为其看管房屋。我问其在抗战期间，房屋及西方极乐世界图有无损失？张谓房屋略有破损，至壁画仍属完整。因日军多信佛，不敢毁弃之也。未数日，我遂与正方同往参观，果如其言。

1947年10月，我到上海，因正方之介，往访卐字草堂主人卢志学先生。卢在沪开设天丰药厂，谓草堂系其尊人所建，用以供佛者。尊人逝后，由其保管。但因厂中事忙，甚少至杭。我乃劝其创办小学一所，以利附近儿童入



学，卢当即慨然同意。19日，卢约金润庠、吴蕴初等，与我至厂午餐，即席宣称捐产兴学，并接开发起人会议，推我主席。通过学校名称为范德小学。以卢君任董事长，其妹夫任校长。卢君除将草堂全部房屋土地捐作校址外，并捐当时法币5亿元，为修理及设备费用。董事15人，我亦名列其一。我谓我系现任公务员，依法恐不能担任。卢君谓非君一席言，不能有此校。作育英才，乃最大功德，务请勿辞。

次年春季，小学开学。4月18日，我至草堂再详观壁画，留连甚久。同行者有佛教人士与艺术家，为我一一解释画中旨趣。我谓卢君兄妹，能以草堂兴学，使人人有书读，此乃真正之现实的极乐世界也。

龙井茶

我于西湖南山诸寺，最爱法相与龙井。法相在南屏山麓，地名颖秀坞。院中植秋海棠甚盛，又有老樟一株，双干挺出，皆大十围，其本殆不可量。法相寺僧所制素斋，味极可口。然非熟友事先相托，则不轻易下厨也。

龙井寺并不大，却完全掩蔽在茂林修竹之中。天台宗大师辨才法师元静，于退休后，住于寿圣院。院去龙井一里，凡山人有事于钱塘，与游客之至寿圣者，皆取道井旁，法师乃即其处为亭。关于法师在龙井退居的情形，杨延恩在其所写的《延恩衍庆院记》中，叙述甚详。杨谓："众山环绕，景象会合。断崖泓澄，神物攸宅，龙井岩也。势将奋迅，百兽窜慑，狮子峰也。"可见狮峰与龙井，系属并称。而狮峰茶，亦为龙井的特产。若以清泓澄澈，味甘且洌的龙井的泉水烹之，则其色青碧撩人，芬芳扑鼻。饮之，肺腑清快，全身舒畅。

龙井茶的采摘时期，均在每年二三月间，最迟不超过四月。茶叶的价值，须视品质而异，最上者为小芽，如雀舌鹰爪，茎直纤挺，号黄金芽。其次是拣芽，乃一芽带一叶者，俗称一枪一旗。再次系中芽，为一芽带二叶者，俗称一枪二旗。至于带三叶四叶者，因叶已老，全作粗茶。关于龙井茶的记载，以程淯撰赵熙书的《龙井访茶记》，最为完备。原件系一手卷，我曾在友人处见之，并予抄录。

程系江苏吴县人，字白葭。他于清末，自北京到杭州，在西湖建一别墅，名曰秋心楼。赵系四川人，字尧



生，是清末的御史，以弹劾盛宣怀而得名。

赵于清宣统二年秋，应程之约，来游杭州，住在秋心楼，写有不少的纪游诗。《龙井访茶记》，系程于宣统三年所撰，而由赵书之，为杭州或西湖各种志乘所未载。全文如下：

龙井以茶名天下，在杭州曰本山。言本地之山，产此佳品，旌之也。然真者极难得，无论市中所称本山，非出自龙井；即至龙井寺，烹自龙井僧，亦未必果为龙井所产之茶也。盖龙井地既隘，山峦重叠，宜茶地更不多。溯最初得名之地，实惟狮子峰。距龙井三里之遥，所谓老龙井是也。高皇帝南巡，啜其茗而甘之，上蒙天问，则王氏方园里十八株，荷褒封焉。李敏达《西湖志》称：在胡公庙前，地不满一亩，岁产茶不及一斤，以贡上方。斯乃龙井之冢嫡，厥为无上之品。山僧言：是叶之尖，两面微缺，宛然如意头。叶厚味永，而色不浓。佳水瀹之，淡若无色。而入口香洌，回味极甘。其近狮子峰所产者，逊胡公庙矣，然已非他处可及。今所标龙井茶，即环此三五里山中茶也。辛亥清明后七日，余游龙井之山。时新茶初茁，绽展一旗。爰录采焙之方，并栽择培溉之略。世有卢陆之嗜，宜观斯记。

土性

沙砾也，壤土也，于茶地非上之上也。龙井之山，为青石，水质略咸，含碱颇重。沙壤相杂，而沙三之一而强。其色鼠羯，产茶最良。迤东迤南，土赤如血，泉虽甘而茶味转劣。故龙井佳茗，意不能越此方里以外，地限之也。

栽植

隔冬采收茶子，贮地窖或壁衣中，无令枯燥虫蛀。入

春，锄山地，取向阳坦，不渍水。陆坡，则垒石障之，锄深及尺，去其粗砾。旬日后，土略平实，检肥硕之茶子，点播其中科之。相去约四五尺，略施灰肥，春夏锄草。于地之隙，可蓺果蔬。苗以茁矣，无须移植。第四年春，方可摘叶。

培养

三四年成树，地佳者无待施肥。硗瘠者，略施豆饼汽堆肥，以壅其根。防草之荒，岁一二锄，旱则溉之。

采摘

大概清明至谷雨，为头茶。谷雨后，为二茶。立夏小满后，则为大叶颗，以制红茶矣。世所称明前者，实则清明后采。雨前，则谷雨后采。校其名实，宜云明后、雨后也。采茶概用女工，头茶选择，极费工。每人一日，仅得鲜叶四斤。上下采工，一两六文。

焙制

叶既摘，当日即焙，俗曰炒越，宿色即变。炒用寻常铁锅，对径约一尺八寸，灶称之。火用松毛，山茅草次之，它柴皆非宜。火力毋过猛，猛则茶色变赭。毋过弱，弱又色黯。炒者坐灶旁以手入锅，徐徐拌之，每拌以手按叶，上至锅口，转掌承之，扬掌抖之，令松。叶从五指间，纷然下锅，复按而承以上。如是展转，无瞬息停。每锅仅炒鲜叶四五两，费时三十分钟。每四两，炒干茶一两。竭终夜之力，一人看火，一人拌炒，仅能制茶七八两耳。

烹瀹

烹宜沙瓶，火宜木炭，宜火酒，瀹宜小瓷。壶所容如盖碗者，需茶二钱。少则淡，多则滞。水开成大花乳者，宜取四凉杯挹注之。杀其沸性，乃入壶。假令沸水入壶，急揭盖以宣之。如经四凉杯者，水度乃合。

香味



茶秉荷气，惟浙江安徽为然，而龙井为最。饮可五瀹，瀹则尽斟之，勿留沥焉。一瀹则花叶茎气俱足，再瀹则叶气尽，花气微茎与莲心之味重矣，三瀹则莲心与莲肉之味矣，后则仅莲肉之味。啜宜静，斟宜小盅。

收藏

茶既焙，必贮瓮或匣中。取出窑之块灰，碎击平铺。上藉厚纸，叠茶包于上，要以不泄气为主。

产额

龙井岁产上品茶，如明前雨前者，千余斤耳。并粗叶红叶计之，岁额亦止5000斤上下，而名遍全国，远逮欧美，则赖龙井邻近之茶附益之。盖自十八涧至理安，达江头；自翁家山，满觉陇，茶树弥望，皆名龙井。北贯九里松，至栖霞，亦名龙井，然味犹胜他处。杭城所售者，则笕桥各地之产矣。

特色

龙井茶之色香味，人力不能仿造，乃出天然，特色一。地处湖山之胜，又近省会，无非常之旱涝，特色二。名既远播，价遂有增而无减，视他地之产，其利五倍，特色三。惟其然也，山巅石隙，悉植茶矣。乃荒山弥望，仅三三五五，偃仰于路隅，无集千百株为一地者。物以罕而见珍，理岂宜然。

佛千先生词云：

龙井茶

龙井寺，有高僧，傍龙井，筑小亭。黄金芽，汲井烹，不待卢仝牛饮，一杯两腋风生。　龙井佳茗，天下驰名。清帝昔南巡，御赏喜尝新。最上品，有王家园小，狮子峰尊。

西湖阮大

我住杭州时，曾多次访求阮氏在西湖上的遗闻轶事。曾遍阅各种志书笔记，只在1926年出版的胡寄凡所著《西湖新志》中，找到了有关阮大的记载。原文是：

宋小若云：壬戌癸亥，寓居西湖之钱王祠，与渔者阮大为邻。时余只一仆，有事辄呼之为佣。一日，至其家，见案头有诗一纸，询诸其妇曰：吾夫之所为也。遂携以归，次日问之，曰：偶然游戏耳。索其稿，坚不肯出。诗云：

放浪西湖二十年，饥来吃饭倦来眠。
今朝检点传家物，只有蓑衣最值钱。

垂老难将积习除，入城向友借残书。
到家妻道晨餐缺，淡月疏烟夜打鱼。

此老殆隐于渔者也。

宋小若不知是何时人。昔人谓：金陵卖菜翁，亦有六朝烟水气。这一位渔翁阮大，吐属不凡，无愧为竹林七贤阮籍阮咸之后。我之敢于断定他是六朝以后之人，因文中曾提到钱王祠，是纪念钱武肃王的。其建筑，已在宋代也。

在西湖湖心中，有阮公墩，这是与三潭印月及湖心亭，同为湖面上浮起的三个岛屿。彼此之间的距离，适成



为不等边的三角形。而以三潭印月的面积最大，湖心亭次之，阮公墩为最小。

阮公墩，在湖心亭之南。清代，阮元抚浙时，浚湖所掘之土，堆集于此，故名。《西泠怀古集》有阮元的序，谓："北山至南山，相距十里，湖面空旷。三潭以南，遇风作，无停泊处。适浚湖，因仿坡公筑堤之法，积葑为墩，为游人舣舟之所。郡人植芙蓉其上，呼为阮公墩，以比安石东山，则余不敢当也。"

阮元任浙学政时，曾于贡院门首撰联：

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
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

下联最能道出士子交卷后之心情，故久为文士所传诵。西湖已有白居易与苏东坡先后所筑之白堤与苏堤，亦皆系以浚湖所得之土为堤基。白堤为自东向西，苏堤为自南向北，杭州市政府于1934年至1935年间，将浚湖所得，加堆于苏堤两旁，曾有人谓肥了苏堤。阮元不再筑堤，而堆成小墩，自属别出心裁。但当时所种之芙蓉，则早已无存。

俞樾所著《春在堂随笔》，曾谓："彭雪琴（玉麟）侍郎谋筑屋于阮公墩上，亲履行之而泥土甚松。以篙刺之，应手而入，始知其不可屋。笑语余曰：此真软公墩也。"盖照杭州口音，软字与阮字同。

抗战胜利之后，我与杭州市长周企虞（象贤）兄，遍历湖上诸胜。察视胜迹，抚慰居民。周市长当时以阮公墩上毫无建筑，墩之四围，野草丛生，颇思先遍植柳树，可供系舟。再建一亭，供游客上岸休息。卒以战后百废待举，未及实现。

1948年7月，浙省府改组，我卸任。邵祖恭兄自上海寄诗，谓：

> 浙中政法出高门，上溯擘经家学尊。
> 王谢尚知争不得，湖山端让阮公墩。

他日归去，当思有所建设，为我阮氏在湖上增添佳话，亦所以在墩上竟老友周前市长之遗志也。

佛千先生词云：

西湖阮大

只有蓑衣最值钱，高士隐风烟。上溯阮家史乘，似胜竹林二贤。或拟无名渔父，浩歌曾笑屈原。　堤姓白，堤姓苏，墩姓阮，喜同传。科场胜事，出门一笑，下笔千言。爱士传经贤抚，犹留贡院名联。



昔日阮公墩

湖心亭

幼时，从赵敏栽先生习国文，赵每诵“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的诗句。我每次游湖，常爱在湖心亭登岸小息。

抗战期中，西湖蒙不洁者八年。胜利之后，我经常与杭州市长周企虞（象贤）兄，去访视名胜古迹受到破坏的情形，并分别先后予以修复。当我们踏上湖心亭的时候，看见一座新建的庙宇。入内一看，原来是财神庙。企虞兄说：“这太俗气了，应该拆除。”我说：“湖心亭原来房屋不多，游客每感缺少游坐之地。现在敌伪有这样一所建筑，拆之可惜。不如将财神菩萨请走，改为观音大士殿。并再补种些花木，供游客观赏。”企虞兄当表赞同，事也就这样决定，交由杭州佛教会弘伞法师去办。

湖心亭本来有好多的对联，陷敌时期，多遭毁损。我记得有一联的下句，是：“有多少青红儿女，停桡都学捧心来。”而上联却怎样也想不起来。1952年，易君左兄在香港创办《新希望》周刊，我乃托他在该刊上刊一征求启事，果然有不少的人应征。首答者，为该刊读者唐文标君。次答者，为读者杨正庸君，君左兄均曾予给奖。原来联句的全文，是：

一碧浸孤亭，看参差烟柳楼台，绕岸几人沽酒去。
明漪比西子，有多少青红儿女，停桡都学捧心来。

可见我连下联，也并没有记得完全。

此后，我记起了骆成骧所作的一联：

万井桑麻中，点缀六桥烟柳；
一城灯火下，辉映十里湖天。

及金眉生（安清）作的一联：

春水绿浮珠一颗，
夕阳红湿地三弓。

1954年，上官美博小姐，又抄来了湖心亭的两副对联，谓系当年游湖时所录者。

一是：

宛在中央，曾领湖山题八社；
为留佳处，平分风月对三潭。

一是：

亭与湖心相掩映，
月从波面鉴空明。

易君左兄曾于少年时期，在湖心亭养病，曾有《自题小照》的诗：

霸住湖心土一堆，群山环抱郁风雷。
年来嗜酒成天性，权把西湖作酒杯。

真是何其豪也！并曾写有记载说：“湖心亭在西湖水



中央，三面青山，一片银波，清光幽绝。”

抗战胜利之后，他重到湖心亭。又曾写道：“战后重游，湖心亭已完全换了新面目，楼阁掩映，花木参差。我往年所住的一栋屋，改为观音大士殿，香火甚盛。我想，假如我不搬走，长住此间，也许化成一个观世音，消受人间香火了。又在奉母来游时，母坐庭前，饮茶看山，我持竿钓。忽得白鱼一尾，活跃跌地。母放在清水盆中，命我题诗。乃向僧人索笔，立成一绝：

金桂银波抱小轩，凄情一梦十年前。
湖山最是留人处，钓得鱼儿上画船。”

湖心亭

君左兄又系小词：

当年养病西湖上，雁唳芦花荡。而今又到湖心亭，过去鱼儿依旧在波心。　采菱船漾垂杨线，醉靥红绒艳。人生无病即神仙，化个鱼儿飞上采菱船。

佛千先生词云：

湖心亭

绿浮珠，碧浸亭，湖心巨盖张。三面青山，六桥烟柳，千顷波光。　把西湖，作酒杯，笑诗人太狂。泊舟最是留人处，一岛水中央。

月下老人祠

西湖南山白云庵旁，有月下老人祠。门悬一联谓：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集古人词曲名句，固如天衣无缝。而其胸怀之高雅，更不可及。游湖仕女，多往膜拜。不论已婚未婚，求得一签，可作种种譬解，以互相笑谑。

白云庵即漪园，宋时名翠芳园，又称屏山园。明末改用今名，毁于清晚期。由丁嘉鱼（丙，字松生）倡议重建，并添建月下老人祠，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落成。清末，住持意周和尚，原为革命党人。在对日抗战期中，又多方掩护我游击健儿与地下志士活动。不幸为敌人发觉，多方搜捕不得，遂纵火将庵屋烧成平地，月下老人祠亦连带被焚。胜利回杭，我思将其复建，民间亦有愿捐款兴建者。1946年10月，余樾园（绍宋）先生见访，谓顷在坊间，见有月下老人画像册页，特借来送我一阅，以为复建之参考。我见其上有题辞，谓："海宁陈公子，游吴中，梦见月下老人，向伊婉求香火。归塑其像，送入城东门尼庵中，一时供养甚盛。名流赋诗成帙，吴拜经先生寄至荆南，长溪社友，各赋诗词，以为迎神送神之曲。"我以此册所绘所咏者，乃系苏州之月下老人，并非杭州西湖者。惟画属佳作，诗词亦多可诵，遂予抄录，而仍将原册页面还樾园先生。樾园先生谓：天下月老，谊属一家；香火之

缘，无分彼此。后闻该册为杭州劳动路101号张文魁先生购去，我遂不获再见。

原题诗词之前，有一长序：

粤自周官媒氏之司，邠龠斧柯之咏。线以针而始引，火缘石而能然。惟夫冰下有言，才叶凤凰之卜。蹇修为理，方开孔雀之屏。然而事隶人间，权归天上。山名撮合，非关太乙之窥。使是氤氲，不藉长庚之堕。从此并肩私语，良宵盟向天孙。前乎碧落红墙，掌判全凭月老。试询青鸟衔书之故事，知非诺皋志怪之虚词。则有许史天亲，潘杨世戚。姻联卫乐，村号朱陈。秦嘉缄徐淑之笺，德曜并鸿梁之案。无嫌葑菲，合附茑萝。所异者，乐陵满氏，缔婚东海王源。曲逆陈平，获取妇人张负。刘碧玉小家之女，嫁得汝南王。赵才人嫣然无双，归于厮养卒。诗人老去，艳说莺莺。公子归来，偏怜燕燕。以门楣之隔绝，更年齿之相悬。乃一随玉杵之久要，即似彩云之乍合。冥冥有主，宛宛相从。御沟流水，人言红叶为媒。月夜吹箫，我识彩绳系杖。所以缱绻情殷，绸缪意结。古今谁察，报功之典久虚。肸蚃攸凭，香火之供非妄。讵同妖梦，雅近新闻。托颍川公子之一言，冀桂酒椒浆之永奠。从此越中仕女，共识牵丝隔幔之缘。浙右词人，竟赋待月迎风之句。兔床翁传来荆水，嘱诸公盥露而分题（吴骞，号兔床，缄浙人新咏诗词邮寄）。鸳鸯牒且会济尼，与大士慈云而并祀（塑像尼庵）。嘉庆壬戌四月二十五日，阳羡汪玉珩撰。

原题诗词为：

七言律　宜兴　储成章　达君



鸯鸯配合似由天，管领朱陈在一编。
几缕红丝能赎命，三生碧海事前缘。
手持无限风流案，梦绕他家玳瑁筵。
从此莫教还错配，人间天上总团圆。

五言律　吴上翰

梦中传韵语，鸳牒事纷纷。
凡此三生簿，先教一老闻。
才人嫁厮养，新妇配参军。
近日氤氲使，春祠拜夕曛。

洞仙歌　宜兴　潘允喆　迁云

无端一梦，望仙翁香像。香火尼庵净供养。悄声祈，臣本好色登徒。期绝丽。愿缔红丝两两。　老人含笑答，万紫千红，惯说桃花易飘荡。试看古今来，名士倾城，能几个妇随夫唱。只赐汝无盐伴罗衾，做蝶眷鸳俦，白头相傍。

高阳台　荆溪　任安上　礼堂

梁孟风高，徐秦致婉，多翁缔出良缘。一缕红丝，牵来费尽缠绵。无端□□□春梦，被桃花引入仙源。倚风前，想遍丰姿，觅遍沉檀。　流传供向尼庵好，看焚香顶礼，第一樊川。绿叶成阴，凝眸枉盼婵娟。深情碧海量还浅，愿生生长住情天。两相怜，从此天涯，少了啼鹃。

七言律　荆溪　周星垣　洁庵

云郁霜眉下九天，星冠玉珮俨神仙。
摩沙虹霓绳千尺，管领鸯鸳谱一编。
须信离鸾原怨耦，早知引凤属良缘。

梦中私语分明记，众此心香瓣九然。

人月圆　常州　周迪　耦塘

鸳鸯谱领鸳鸯侣，华发老仙翁。陈抟梦里，吴刚月下，共此情悰。　　塑成香像，一肩风月，万种花丛。从今记取，有情孔雀，庵里相逢。

一萼红　宜兴　徐腾蛟　海玛

白头翁，掌人间鸯谱，韦固昔相逢。任尔山陬，凭他海澨，红丝牵住芳踪。便得朱陈缔好，双飞蛱蝶，尽日舞花丛。寄梦叮咛，颖川公子，香火求供。　　因此沉檀刻像，向尼庵早晚，顶礼雍容。才子飘零，红颜憔悴，每伤路陌西东。愿从此，别开情界。遍尘寰，怨旷尽消融。自在流转，渐看瞻拜来同。

月上海棠　荆溪　万之蘅　瑱为

情通慧海情有托，奈分明流年暗中阁。不系红丝系闲愁，自行缠缚。而今祝英遗双凫，枉却。　　辉煌灯火城东角，似春华朝夕递开落。鹤氅星冠，步蟾光，甚时逢着。心香炷，愿乞先生秘签。

七言律　荆溪　潘兆熊　璜溪

鸯鸳谱牒注年年，管领人间离恨天。
不少朱陈谐燕婉，几家秦晋致缠绵。
赤绳系处金为屋，白石贻来玉作田。
别有痴情向君乞，花须长好月长圆。

七言绝　青浦　方肇炎　葆青

忆昔吴城蓦遇时，朝朝月下盼红丝。



鸳鸯别谱旋惆怅，一种相思诉与谁？
铜雀曾传锁二乔，也思配合觅鸾胶。
六张五角般般错，忍看青梅满树梢。

当樾园先生将月下老人画册送给我看的时候，适为先岳丈钱逸尘公所见，他乃也为题了一首词：

多丽

杭州月下老人祠，毁于寇劫。忽见老人塑像图及题词序诗等，为题一阕。

吊仙祠，仙乎来听余辞。念阴阳，缊絪缱绻，鸿蒙开辟因之。怎颠倒，情天鸾凤。轻撮合，孽海鲸鲵。玉玦悲遥，金闺惨绝，欢场故遣变泥犁。偏剩得，白头怨偶，双泪怨红丝。凭余愤，应挥慧剑，斩尔媒司。　　只今番，荒祠经过，仙翁仿佛通词。道天游，神州在宥；赠芍药，溱洧栖迟。石上三生，江边双珮，东坡只恨不时宜。姻缘簿，于今交代，风月任平持。还应否，还予祠宇，附尔情痴。

我复建杭州西湖月下老人祠的计议，因抗战胜利之后，急要之事甚多，未能即办。而西湖凤林寺僧，竟未得杭州市政府之许可，在白云庵的正殿遗址上，擅自建了一所月下老人祠。此事我初得之于传闻，1948年6月14日，参加杭州辛亥首义的黄文叔（元秀）先生来看我，才获得证实。文叔先生说：“兄拟在白云庵遗址，兴建辛亥革命纪念馆，并已由杭州市工务局开始绘图。但其上现已建有月下老人祠，纪念馆可否稍为旁移？”

我说：“凤林寺僧未得许可，擅自建祠，以谋香火收入，并占用与革命历史有关的白云庵原址，应予拆除。”而文叔先生笃信佛教，与寺僧有来往，再三谓当由杭州市

佛会设法补救，我一直到11月17日下午，始得暇赴风林寺僧所建的月下老人祠一观，真是屋矮墙低，布置简陋。老人塑像，短小粗俗。签诗更是任意涂改，文句多不通顺。此为我抗战后第一次到白云庵遗址，也是最后一次到。因不久我全家即行移台。

杭州月下老人祠的签诗，原有100则。一说系俞曲园（樾）先生所手辑，皆采用成语。文字典雅，意多双关。一说系俞氏所辑，原只55则，后由越州金可庵续辑45则。抗战期中，祠既被毁，签诗自亦化为灰烬。我虽则尚能记得几则，究难完全。胜利回杭，晤及金维坚先生，他听说我要复建月下老人祠，就将他昔年手抄的祠签送给我。金先生系金华县马鞍山人，其时任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长。并且写了一篇白云庵月下老人签词考，在当时杭州出版的《胜流》半月刊发表。我本想在老人祠复建之后，分请名书家100人，每人手写一签，制以锌版，用桃花签精印。凡入祠求签者，均可人手一纸，携归保存。

1948年6月12日，接到署名孙文蔚的来信，说是月下老人祠原来的签诗太少，愿意续辑100则，亦需要否？我立即复信欢迎，请其将新制签句寄来，此后就没有再得其来信。

金维坚先生所送给我的手抄签诗，后来也失去了。1951年，易君左兄在香港创办《新希望周刊》，我乃托其在该刊上刊文征求，居然得到一位住在香港的读者署名恭之的回信，附来签诗原句，但只有55则。我乃到处找《胜流》半月刊，在这之前，我曾托友人将《胜流》合订本，共7卷，先带到台湾，送给台湾省立图书馆。待我到台之后，往馆中取阅，则已经缺了第三卷与第五卷。其未缺的各卷，也为借阅者裁剪得不成篇幅。在未缺的各卷中，没有金先生的原文。我又听说中央研究院藏有《胜流》第三



卷，遂即托友人往查，仍未觅得。则金先生的大作，可能系刊载在五卷上。

1971年8月，在嘉义省立女中任国文教师的李达先生，写信给我说，他曾看到过金先生在《胜流》上发表的原文，但是他手边也没有《胜流》半月刊。不过他曾将后45则的签词，也就是金可庵所续辑的，抄录了一份，并且转录寄我。于是100则的签词，方才又得成为完璧。照续辑的签词以观，金可庵也是一位学识极有修养的人。他既是续俞曲园之作，其人必与俞同时，或后于俞，也可能是俞氏的弟子。因俞的文名太大，而金的续辑，虽则可与俞的原辑并美，却知道金的为人者甚少。惟既称越州，当系绍兴人，除此即无其他线索。可能在金维坚先生的文中，对这位金先生，曾有介绍。金的原文现既尚未能查到，我也无法再作更多的查考了。

西湖白云庵月下老人祠签词100则全文，如下：

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三、宗庙享之，子孙保之。

四、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五、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

六、风弄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

七、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八、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也。

九、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十、有道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十一、自剪芭蕉写佛经，金莲无复印中庭。清风明月

长相忆，玉管朱弦可要听。多病不胜衣更薄，宿妆犹在酒初醒。隔年违别成何事，卧看牵牛织女星。

十二、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十三、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十四、谁为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十五、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

十六、意中人，人中意，则那些无情花鸟也情痴，一般的解结，枝头学并栖。

十七、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十八、非特内德茂也，盖亦以外感之助焉。

十九、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二〇、何如，子曰，女器也。

二一、十亩之闲兮，桑者闲闲兮。

二二、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二三、只一点故情留，直似春蚕到死，尚把丝抽。

二四、两释累囚，以成其好。

二五、可妻也。

二六、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二七、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二八、夫妇也，昆弟也。

二九、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三〇、话别无长夜，相思又此春。瑶姬不可见，巫峡更何人。运石疑填海，乘槎欲问津。遥情每来往，谁共尔为邻。

三一、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也。

三二、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三三、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三四、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

三五、夜静水寒鱼不饵，笑满船空载明月。

三六、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三七、妻也者，亲之主也。

三八、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三九、惟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

四〇、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

四一、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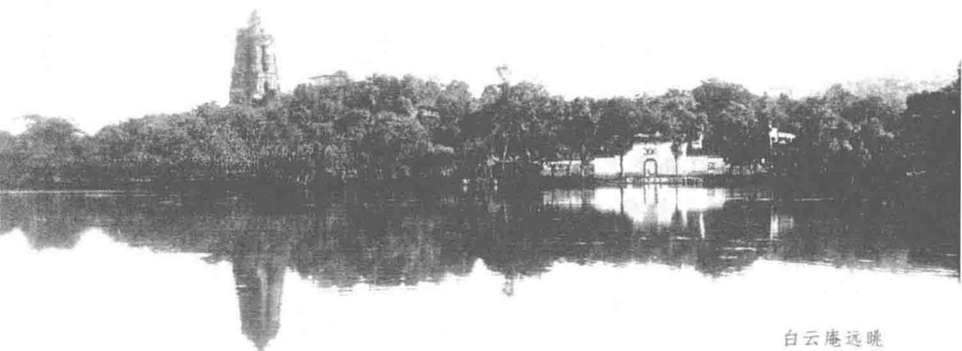
四二、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四三、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四四、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四五、不愧于天，不怍于人。

四六、害女红者也。



白云庵远眺

四七、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谁是状元郎？

四八、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

四九、两世一身，形单影只。

五〇、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五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五二、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五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五四、不思旧姻，求尔新特。

五五、永老无离别，万古当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五六、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五七、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五八、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

五九、心苟不愆，何恤于人言。

六〇、不知其人，视其友。

六一、嘉耦曰配。

六二、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六三、齐大，非吾耦也。

六四、在幽闺自怜。

六五、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六六、再，斯可矣。

六七、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匪必瑰奇伟丽者也。

六八、天下多妇人，何必是。

六九、利有攸往。

七〇、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

七一、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七二、白云初晴，幽鸟相逐。

七三、恨相见晚也。



七四、则去偷香窃玉上用心，又不曾得甚。自从海棠开，想到如今。

七五、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

七六、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七七、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七八、泯泯棼棼，罔中乎信，以覆诅盟。

七九、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八〇、经之营之，不日成之。

八一、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八二、姑舍是。

八三、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八四、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八五、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八六、便如凤去秦楼，云敛巫山。

八七、是非吾所谓情也。

八八、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八九、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九〇、你往事已沉，我只言自今。

九一、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九二、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九三、巧言令色，鲜矣仁。

九四、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九五、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九六、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

九七、昨夜江边春草生，艨艟巨艦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九八、他思已穷，恨不穷，是为娇鸾雏凤失雌雄。
九九、必先苦其心志。
一百、花好、月圆、人寿。

佛千先生词云：

月下老人祠

天下多少庙，此庙独千秋。中外神仙无数，此老最风流。红线小，法力大，系鸾俦。情天可补，功与女娲侔。

莫错姻缘，都成眷属，人人此福当修。代神言，大手笔，出俞楼。多情大宪，恨未金身重塑，喜能签句全蒐。

月老祠签一

人之好怪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恨相见晚也。
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其能降以相从也。

月老祠签二

亦不可行也！　东家墙而楼其处子。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匪特内德茂也，盖亦以外感之助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月老祠签三

乐莫乐兮新相知，求我庶士，莫待无花空折枝！
求则得之，其甘如荠！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江南柳

又是春天了！这是我离开江南之后的第24个春天。

回想我当初离开江南的时候，冬寒未尽，西湖孤山的梅花尚在开放，断桥上的雪也尚未全融。到了台湾之后，春天才来，就在台北的春雨绵绵中，接到朋友从杭州的来信，报告湖上的春讯。他说：

今年的春讯较早，白堤上的新柳，已经发芽。每当走过堤边，我爱故意的走到柳树的下面，让那新发的柳枝，轻轻的在我的面上，拂来拂去。因为我爱他的新生嫩绿，愿意接受他的抚摩。过去，你常说：我们要爱护这新的嫩芽啊！记得有一次，你因为好久没有到西湖上，当你走上断桥的时候，看到断桥与锦带桥之间的沿堤柳树，不但已经飞过了杨花，而且老干成荫，将堤面上的阳光，都遮住了。你回来对我说：九十春光，竟轻易地过了。这话，在今天说来，尤使人有老大飘零之感。

又是24年了！写这封信的朋友，隔在大陆，生死不知。我也仍在台北，年年未定归期。

每年到了春天，总特别勾起了更多的乡思，与更多的乡梦。

昔人每以桃红柳绿，形容江南的春天。但是桃花不能与杨柳相比,桃花开花的时间很短，虽则鲜艳，却并不高雅。春尚未尽，已经是落红点点，逐水而流。明人袁宏道的诗句，“桃花难比杭州女，洗却胭脂不耐看”，是一点

不错的。所以，我在江南，却爱看柳树。从南京的台城柳，到杭州的西湖柳。从发芽、抽枝，一直到丝垂满地，飞散杨花，皆是极有情趣的画面，我都爱看。昔人在杭州，每出涌金门去游湖。而春天是否已经到来，春光是否已经老大，皆以涌金门外的柳枝成长情形为断。出了涌金门，不远就是柳浪闻莺。柳枝因春风的吹动，而能成为绿色的波浪，其美可想。

历代诗人咏柳树的诗词，不可胜举。我最喜爱诵的，是宋代词人周邦彦的《蝶恋花》词，共六阕，皆用同一个韵。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均有和作，也皆和韵。周邦彦所作的，有两阕最好：

小阁阴阴人寂后，翠幕寒风，烛影摇疏牖。夜半霜寒初索酒，金刀正在柔荑手。　　粉薄丝轻光欲透，小叶尖新，未放双眉秀。记得长条垂鹢首，别离情味还依旧。

晚步芳塘新霁后，春意潜来，迤逦通窗牖。午睡渐多浓似酒，韶华已入东君手。　　嫩绿轻黄成染透，烛下功夫，漏泄章台秀。拟插芳条须满首，管教风味还胜旧。

在方千里的和作中，也有两阕最好：

漏泄东风消息后，短叶长条，著意遮轩牖。嫩比鹅黄初熟酒，染匀却费春风手。　　万缕筛金新月透，入夜柔情，还胜朝来秀。采笔雕章知几首，可人襟韵无新旧。

一搦腰肢初见后，恰似娉婷，十五藏朱牖。春色恼人浓抵酒，风前脉脉如招手。　　黛染修眉蛾绿透，态婉仪闲，自是芳闺秀。堪惜年华同转首，女郎台畔春依旧。



除此而外，宋人欧阳修的《双调望江南》，也最脍炙人口。有人说，此词并非欧阳修所作，乃系他人冒用他的名义的。惟无论系何人的作品，总是一阕好词，也最可以表达我们久别江南的心境。我因记不清全文，曾打电话给易君左兄，请其代查，他就手抄见示。不料，君左兄忽然病逝，此页乃成绝笔。

双调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抗战期间，杭州陷敌。名诗家余樾园（绍宋）先生有《忆西湖春柳》诗两绝：

万缕千条漾碧晖，湖山犹是昔人非。
凭谁寄语多情絮，莫使因风到处飞。

□嫩金色软于丝，撩乳春心不自持。
弱质岂胜攀折苦，未知留得几多枝。

余先生应我之请，画了一幅西湖柳送给我，并将这两首诗题在画上。他说：绘柳较之绘竹为难。因竹枝竹叶，多系向上伸张，而柳枝柳叶，则须绘出其下垂之态也。他这一幅画，全部用白描法，摇曳生姿。婀娜之中，兼具刚健，见者皆诧为神笔。所惜者，此画竟在台湾佚去。我想，总有一日，会获得珠还的。

佛千先生词云：

江南柳

江南柳，藏朱牖。短叶长条，染匀却费东风手。
蛾绿透，双眉秀。脉脉风前，一搦腰肢初见后。



湖上春深

杭州西湖的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每届清明已过，立夏将临，也就是春末夏初，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季节。杭州初春多雨，夏日苦热。一年好景，除去秋高气爽的时期之外，就是湖上春深的时候了！

要知道九十春光，是否将尽，那就要先看杨柳。如果丝垂满地，飞散杨花，则春天就快要完了。而要看杨柳，又当先出涌金门。何以见得？且看贡性之的诗句：

涌金门外柳垂金，三日不来成绿阴。
折取一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

在北宋的时期，已经有涌金门。门在民国成立以后，业已拆除。现在只有涌金桥，还存在于湖滨路与南山路之间。而由涌金桥引进来的湖水，乃成为浣纱溪。沿溪两岸，均植有杨柳树。每到农历四月，则沿溪的柳树，也都花絮遍飞，老干渐已成阴，将溪面上的阳光，渐次遮没。那下垂的柳条，飘拂在水面上，这就是表示成长了。

西湖并不完全是游观之地，其本身即具有灌溉的水利作用。江南水乡，到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皆甚忙碌。且看宋朝范成大的《村庄即事》诗：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在西湖的金沙港，有省立蚕桑学校，专收男生。有杭州市立女子初级中学，专收女生。女子蚕桑讲习所，则在杭州市内的横河桥。养蚕是家庭的副业，蚕宝宝不容易侍候，因而养蚕的少女少妇，皆很辛苦。到了春蚕成茧，则男人们下田插秧的时候到了。秧针要细，秧行要齐。随手插来，皆如一幅美丽的绿色图案。

春深了！西湖的春天花季，也已结束。但是虽则开到荼蘼，花事并未完全了却。兰花、荷花、桂花、菊花、梅花，还要一批接一批地点缀湖山，使诗人有吟不完的诗句，画家有画不尽的粉本。春深了！春天开的花皆已结子，陆续上市。梅子、杏子、李子、桃子，堆满了市摊。再下去就有枇杷、樱桃及杨梅，陆续地出现。

春深了！西湖的新茶也已上市。最嫩最香的，是雨前与明前，那是在谷雨与清明两个节日之前所采摘的。产量不多，极为名贵。看刘英的《谢龙井寺僧寄茶》诗，可以证明：

春茗初收谷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
也知顾渚无双品，须试吴山第一泉。
竹里细烹清睡思，风前小啜悟诸禅。
相酬拟作长歌赠，浅薄何能继玉川。

至于一般的龙井绿茶，在龙井村的茶户人家，皆可以随时供应。龙井村住户不多，皆以种茶为生。到了采茶时节，山居女儿，提篮挈筐，高低错落，在茶树丛中。虽则脂粉不施，却衬映出湖山的天然颜色。游客经过，茶农就用自制的茶壶，煮开了山中的流水，泡上一杯，以为佳宾解渴。那茶又绿又嫩，那茶香可远闻数里。所有烦尘俗虑，完全消除。游客可以一家一家吃过去，不必付一文



钱。一直走向九溪十八涧，脱下了鞋袜，涉水而过，到了九溪茶场。在那茶亭中，却悬了一副木板的对联：

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
东东丁丁泉，高高下下树。

这本来是俞曲园的诗句。用在此处，真是恰当极了！

春深了！湖上的笋味更好了！西湖多竹，因而多笋。湖上寺庙，照例供应素斋。而素食之中，总离不开笋味。春笋切成转刀块，拌以麻油酱油，鲜美无比。如要想吃荤，则王润兴饭馆的春笋鲥鱼，最为可口。但无论素吃荤吃，所用春笋，皆须新出土如指尖大小者，才能显出其鲜嫩。诗人余樾园先生曾对庙中的方丈说："法师餐餐请我吃笋，真是吃得我胸有成竹了！"可见湖上笋味的普遍。

春深了！而我们却尚在台湾。台湾的春季苦短，夏季太长。离开西湖已经24年，真是教我如何不想她。

佛千先生词云：

湖上春深

采茶时节正春深，新茶香，山泉清，家家笑迓游人，一杯坐竹阴。采茶女，不施脂粉，好颜色，是天生。
又一峰，又一村，忽使眼为明。九溪十八涧前横，重重叠叠，曲曲折折，喜听百琴鸣。濯我缨，濯我心。



六月荷花

杭州西湖，夏季苦热。因为三面环山，湖水竟日为骄阳所晒，热气无法散开。故虽至深夜，湖水仍温。

但在诗人的笔下，则夏日的西湖，却极为美丽：

>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是一首流传甚广的诗句。而西湖的荷花，却集中在三个地带。

第一个地带，距湖滨最近，也就是在白堤与里西湖沿湖马路之间。如乘舟行，则可穿越断桥，而到孤山或到里西湖的招贤寺前上岸。这一带湖面上，夏季开满了荷花。游人可以先将瓜皮小艇，停在断桥桥孔下，清凉无比。而后乘兴在荷叶丛中，徐徐划行。

看荷花宜在清晨，因为荷花是天微明时开放，待天已大亮，则荷瓣又行复合。最好天方黎明，即行穿过荷丛，而将小舟系于孤山放鹤亭下。人就上岸，在亭中藤椅上躺下。这儿有新冲的藕粉，新沏的龙井茶。藕粉带粉红色，茶则系碧绿色。用藕粉以代早点，再品尝了名茶，便可在亭中，补睡一个早觉。晨风徐来，荷香欲醉。

第二个地带，是岳坟前面的湖面，也是苏堤的北端。苏堤有六座石桥，每座桥孔之下，夏日皆停满了游船。有藉此纳凉的，也有采摘莲藕的。清香扑鼻，沁人肺肝。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就在岳坟与苏堤之间。曲院在南



宋时，本名麯院，近九里松的洪春桥。当时系取金沙涧的水造麯，以酿官酒。清康熙时，改在跨虹桥旁，另建一亭，引流叠石，盘曲可观。又加建了敞堂三楹，并在堂的东面，建了迎薰阁与望春楼，西面则建了复道重廊。地址既已更易，也不再造麯酿酒，却种满了荷花。第三个地带，是三潭印月，又名小瀛洲，内外都种满了荷花。登岸以后，上九曲桥，过十字亭，到湖楼上小坐，却见迎面悬了陈承鋆所作的一副对联：

> 四面荷花三面柳，
> 一城山色半城湖。

其荷花之盛，可以想见。

这时候，就有采莲女郎，送上新采的莲蓬。并用刚折下来的荷叶，托上新切的生藕片。这些生藕片，切成一样厚薄。用手取起，一片一片，还是藕断丝连。藕吃完了，便将荷叶盖在头上，以代凉帽。

在苏堤与三潭印月的内外湖面上，经常有女郎轻摇的采莲小舟，她们低唱着采莲曲，一面随时用双手到水中采藕。却真是出污泥而不染，纤纤玉手，从未拈到水底的香灰泥屑。她们卖莲蓬，卖切藕。也卖荷花，由游人携归插瓶。也卖荷叶，供游人持归作粉蒸食品之用。也卖藕粉，用湖水煮之。细而不腻，入口即化。

在湖滨的酒肆中，有藕粥卖，那是用藕及糯米煮的。再加红糖，香甜可口。也有蒸熟藕卖，那是在藕孔中，填满了糯米。煮熟后再行切片，而后拌以白糖，松而且软。因为藕中有孔，故食之可以通气。无论生食熟食，均属有益。

荷花通常为淡红色，如为白荷，则较红荷为名贵。其为一枝两蕊者，则称为并蒂莲。有两朵皆为红色者，有皆

为白色者，亦有一红一白者，均极为美丽。杭州大宅，每于天井中置荷花缸若干只，中植莲花，多为并蒂。花时置酒邀客，分咏赋诗，称为盛事。曲院风荷的湖面上，也多有并蒂莲花。芙蓉出水，对对迎人。清晨月下，每易使人神往。

周敦颐作爱莲说，喻荷花为花中的君子。君子的情怀，每每高洁自赏，不合时宜。

1971年农历六月，明夷诗社在台北举行雅集，王家鸿先生即席命题："忆玄武湖荷花，不限体，亦不限韵。"我立即声明说："我系一向三句不离本杭，我所忆的乃是西湖的荷花，而不是玄武湖者。"王先生说："兄可以用忆西湖荷花为题。"我乃于十五之夜，写了四首七绝：

六月西湖忆旧游，荷香遍绕小瀛洲。
燕支水煮新莲粉，染得诗心别样柔。

六月西湖忆昔年，荷香吹动晚风前。
短篷每系苏堤下，爱听邻舟唱采莲。

六月西湖忆昔时，荷香十里正催诗。
人来曲院花前立，水是新开并蒂枝。

六月西湖忆昔人，荷香廿载隔丰神。
情怀高洁如君子，来岁花时应可亲。

我诗写成后，寄给几位朋友看。熊雪松（式辉）先生从台中来信说："捧读新诗，顿觉荷香扑鼻。暑热困人，恍惚身已飞到西湖去矣。遵和四绝，录呈哂正。"他的和作是：



六月西湖忆昔游，卅年前到小瀛洲。
采莲船隔田田影，只听歌声一片柔。

六月西湖忆昔年，轻舟拨趁晚凉前。
三潭影印团圆月，满袖风香阵阵莲。

六月西湖忆昔时，邻舟少女欲撩诗。
荷花采得娇盈把，笑掷游人各一枝。

六月西湖忆昔人，杭州何事此关情。
临行犹说难抛却，应为荷花惜淡亲。

李渔叔先生在台北，旋亦以诗见寄：

毅公作忆西湖荷花诗，有句云：燕支水煮新莲粉，染得诗心别样柔。爱其意新美，亦作三绝句，并以奉寄。

菡萏香浓十里秋，与郎湖上掉轻舟。
南风吹动燕支水，比似侬心一样柔。

小船摇入碧云深，水枕横时露滴襟。
数朵湖心最惊绝，老鱼知妒定应沉。

梦断圆荷泻露声，棠阴湖上记栽成。
水仙亦盼公归去，莲女犹应忆姓名。

以写《黄花魂》传奇闻名的湖南萧纯白先生，也依原韵，和作了四首：

结想西湖托胜游，遥情一片系芳洲。
众香妙语风荷影，沁入诗肠寸寸柔。

千里莼羹感岁年，乡心不觉动秋前。
苏堤此日丝丝柳，谁系扁舟去赏莲。

蝶舞莺歌忆胜时，银湖夜静最宜诗。
天魔解得游人倦，玉笛横吹上月枝。

风雨瀛洲忆故人，亭亭可似旧丰神？
离骚一曲思君子，待得春回再与亲。

农历六月，也是游夜湖的好时刻。尤其是十八夜间，



接天莲叶



杭州仕女，倾城出游。因相传观音菩萨，每年有三次诞辰，即农历的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与九月十九。二月正值春寒，九月已是深秋，均不宜夜游。故六月十九的观音诞辰前夕，乃为游夜湖的最佳之时。

在清代，杭州设有驻防旗营。只有每逢六月十八，可以城开不夜，容许游人在夜间游湖。民国成立，旗城拆除。无论日夜，不分春夏，已随时可以出游。但六月十八夜，仍因多年习俗，成为游夜湖的最高潮。

杭人于六月十八游夜湖，主要是为朝山进香。善男信女，早在数月前，即已准备。至诚者必须步行，由钱塘门沿里西湖，直至灵隐寺，共约20华里。沿途寺宇林立，须逢庙烧香，见佛即拜。进香者多身背黄布口袋，中置香烛纸马，以及零钱，备布施庙前乞丐。抵达灵隐后，多即在庙前席地而坐。口宣佛号，以待天明，抢烧头香。既还心愿，兼得佛佑。

民国成立以后，自湖滨至灵隐兴修马路，并有民营之永华公司，行驶公共汽车。但六月十八夜间朝山进香者，仍系步行。而公共汽车于过岳坟后，因步行之香客拥塞于途，行进只得缓慢。即有乘客，亦宁可下车步行，加入进香者的行列，向灵隐寺进发。

其不赴灵隐进香者，则必事先预定游艇，约定晚饭后登舟，在湖中荡漾。西湖除瓜皮小艇外，本尚有大游船，由舟子用篙撑驶。每船可容10至20人，中有大舱，可开筵席。我幼时因先母认为小艇不稳，加以家中人多，故每年六月十八之夜，必预定大船一艘，泊于湖滨第三或第四码头，以备全家夜游。我等则每嫌大船行驶太慢，不乐意乘坐。对舟旁小艇，欸乃一声，双桨如飞，辄不胜羡慕。及至抗战胜利，重回杭州，则湖中大游船，共已只余两艘。1946年春季，浙江省政府同人曾特雇一大船，在湖中盘桓

半日。物稀为贵，舟行过处，反引起乘小艇游湖者之艳羡。时代不同，心理亦异。

六月十八夜间，湖上满布荷花灯。灯以纸制，状似莲花。下托木板，并立一钉，上插红烛。由游客点燃后，沿湖置放。灯在湖中，随湖波起伏，灯影摇红，至为美观。放灯亦系佛教中习俗，谓可结善缘。游夜湖者必须放灯，或多或少，但必须为双数。另有人专备红烛，乘舟在湖中弋视。见有灯烛将灭者，即为补充。

湖上酒肆，于六月十八之夜，均通宵营业。楼外楼因面临外湖，食客最多。先君在日，每年必预定二楼临窗一席，招待亲友。平湖秋月与三潭印月，则有采莲女郎供应新鲜莲藕及藕粉。湖上各个庄屋，亦皆通宵开放。游客来观，守屋者必奉以香茗。

杭州夏季苦热，偶有大雷雨，必在下午。六月十八之夜，月色尚佳，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有风雨。藉佛诞而得有一夜之游，情趣极为难得。是夕既过，亲友晤面，必互道游夜湖之乐。其有纪游诗词者，则又互相酬唱，叠韵至于再三。一方面则又开始准备两个月之八月十八，到海宁去观潮的行程了！

佛千先生词云：

六月荷花

花也美，叶也美，难将菡萏比。况绿去千盖，朱霞万朵，清香十里。　　苏堤下，采莲歌起。手相携，笑指花开并蒂。阮郎老去，此情堪忆。

秋山秋月

西湖的风景，是山色胜于湖光。一般游湖的人，为时间所限，往往只能在湖面泛舟，不及入山选胜。

久住杭州或时间从容的人，则无不爱游山。游山固宜于春日，但秋天，却也是游山的好季节。

在西湖游山，可乘肩舆，但最好则是步行。西湖的山并不高，而且山路平整，均用大石块砌成。如果着了平底布鞋，任折一枝树枝，用作手杖。与二三友好，一路谈谈笑笑，走来就更不费力。

在西湖抬轿的，大多是萧山人。他们三人一组，两人抬轿，一人跟在后面，在路上随时换肩，以便换下来的人休息。这换下来的一人，也仍然跟在轿子后面，走过一段山路，再换上去。如果遇到体重较大的乘客，则以四人为一组，称之为双换肩。

西湖的轿子系用藤椅，围以白色纺绸的轿帘。微风吹处，轿帘就在山中飘荡。有时一列轿子都在上山或下山，这些白绸的轿帘，就好似一片一片的白云，在山谷中浮起，与绿树红花相辉映。

轿子的轿杠系用木制，木质须稍软。轿夫抬起来，轿杠会略带弹性。乘轿的人在行进中，除了随山路高低感到升降外，并且会因轿杠的轻微上下，而感到有如坐沙发上的舒适。

萧山轿夫多属年轻力壮，走山路如履平地。足穿草鞋，衣裤也多用白色，洗得很干净。他们在山路行进中换肩，乘客并不会觉得曾换过人。他们惟一的缺点，就是一

路走，一路互相对骂。他们并不是真有什么事要争吵，只是骂惯了，不骂就没有力气抬轿。骂的话都十分粗陋难听，幸而骂中还是常带笑语，加之用的是萧山方言，乘客多不易了解。

山中多的是庙宇，也有坟庄。杭州本地人，每年清明节与冬至节，必须祭扫祖坟。而祖坟均葬在山中，因之必须入山。上坟是一件大事，全家男女老幼，都要参加。仕绅之家的祖坟，有墓道，也有坟庄。平时雇有工人长住，专司打扫，上坟时便为家人休息的地方。普通人家则必有坟亲，也就是在墓地所在的村庄中，结识一户农家，托其在平时打扫墓地，上坟时可以有地方坐坐。称之为坟亲，不但表示亲密，也表示尊敬。因为坟亲是经常代表子孙奉侍在地下的祖先的。除清明与冬至两个节日外，每年遇到祖宗的冥诞或忌辰，也要去上坟。在上坟途中或上坟以后，则顺便游山。所以，杭州人每年游山的机会，是不少的。

至于山中的庙宇，多有固定的施主。庙中的僧侣与住在城内的施主家中，经常保持来往。每逢菩萨生日，施主家中，要派人到庙中上香，施主也可以随时请庙中准备素斋，宴请亲友。尤其是逢到寿辰或丧事，以在庙中请吃素斋，最为合礼。

西湖有八大丛林，都可以启建水陆道场。也就是为施主准备身后的储蓄，以便于其死后，在冥中可以有钱使用。水陆道场通常是七天七夜，由高僧主持诵经，节目繁多。在这七天之中，庙中每日供应三餐，均为精美的素斋，施主可约亲友同享。亲友于应约之余，多顺道游览山景，晚间亦可在庙中住宿。

在西湖游山的人，随地可以见到庙宇，也就随时可以进入禅房。最少，可以喝一杯用本山茶叶新泡的好茶。需



要进餐时，也可以随时嘱咐准备素斋。因为沿途的庙宇很多，走累了就随时可以有地方休息，并且有茶、有面、有菜、有饭。所以游山，真是并不费力，也更不费事。

除八大丛林外，山中的素斋，以在南山的烟霞洞与法相寺为最好，尤其是烟霞洞，屋只数楹，由金复三居士居住。他常亲自掌厨，其味最美。胡适之先生于1923年，曾在烟霞洞金处，养病三个多月。金常为之治素斋，胡亦至为欣赏。胡曾写有诗幅，送给金居士。句为：

> 我来正值黄梅雨，日日楼头看山雾。
> 才看遮尽玉皇山，回头已失楼前树。

抗战期中，金仍住在原处，却受尽了日本人的欺凌磨折，但是他从不向日本军阀与汉奸组织屈服。胜利以后，我到烟霞洞去拜访他。他第一件事，就是从箱中取出适之先生当年亲写的这一首诗幅。他说："在沦陷期中，保存一张手迹，是很不容易的。"1947年，他80岁。他说：他曾两次写信到北平去，胡先生皆未有回信。盼我再去一信，告以想念之苦。他年事已高，晤叙机会，恐已不多。盼望胡先生早日到杭州来，与之聚晤。他并将再亲自为胡先生，烧几样素菜。其时金已很少亲自入厨，多由其弟子代劳。我将金居士的盛意，写信给在北平的胡先生。胡先生也曾写了一封长信致金居士，寄我转交，并且答应第二年到杭州来看他。哪知没有等到第二年，金居士便逝世了。至于玉皇山的李道士，于抗战前后，在山上开设素菜馆，喧闹杂沓，其情趣就比烟霞洞差多了！

我在杭州，爱游山，爱逛庙，而且多是步行，很少坐轿子。每逢秋高气爽之日，西湖南山的满觉陇，桂花盛开；山中的桂花栗子，也初初上市。从法相寺到烟霞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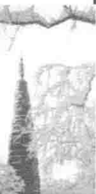
沿途都是游客。乘轿的，步行的，无不在欣赏这满山的秋容。

到了晚间，不能游山，则可以游湖。盖每年自七夕以至重阳，为秋高气爽之时，乃湖上最好的游乐季节。真是“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花好最宜秋”。而在晚间游湖，可以数天上的繁星，与湖滨的灯火。烟波一棹，意若神仙。农历六月十八，为观音诞辰前夕。七月十五为中元节，杭人皆例于湖中施放荷花灯，以度冤魂。自湖滨望去，湖上点点灯火，随波浮沉，煞是可观。而舟中游人，亦每至午夜，方始言归。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杭人以五色纸，糊贴三潭印月之潭孔，并于孔中置灯火。再以小舟绕潭划行，则水光波动，亦呈五色，至为美观。游客多在小瀛洲登岸，过九曲桥、彭公祠，再至三潭印月之另一端登舟。九曲桥中置一大太湖石，名“美人梳妆”。桥下全为荷花，红白相间。花外全为柳树，绕堤拂水。观柳宜于初春，赏荷宜于盛夏。迨至秋夜，只见柳干成围，荷枝直立。惟在月下见之，则犹如人影，摇拂相迎。

三潭印月为湖中岛屿，岛中又有湖面。平湖秋月，则为半岛。三面环湖，背倚孤山。游三潭印月，非舟不达。游平湖秋月，则可出钱塘门，过断桥，沿白堤，有陆路直达。抗战胜利之后，我住杭州，每于月夜往游。至则在庭前，置清茶一盅，与二三友好，抵掌狂谈。平湖秋月可观全湖景色，厅悬骆成骧作的一联，谓：

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
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

所谓后山山，系指孤山，为踏雪寻梅佳处。所谓前山明月，系指秋夜。盖月色皎洁，南山诸峰，咸入眼底。而



山峰倒影，直入湖心。有若翠屏列幛，万笏相朝。我爱诵者，尚有石治公集句的一联：

欲把西湖比西子，
更邀明月说明年。

江湘岚作的一联：

佳趣此偏多，量来秋水平篙，照我全身都入画；
吟怀闲不得，携有清风两袖，看花沿路去寻诗。

及彭玉麟作的一联：

凭栏看云影波光，最好是红蓼花疏，白蘋秋老；
把酒对琼楼玉宇，莫孤负天心月到，水面风来。

我幼时在杭，尊长不放心夜中游湖，故行程不能太远。每当秋月之夜，则常与友好坐于湖滨公园旁码头石阶上，听拍岸水声，清脆有节。月光人影，相互映照，最不能忘。

佛千先生词云：

秋山秋月

山也好，水也好，重重翠嶂，三面将湖绕，游人往往叹匆匆，游水多，游山少。　　足徜徉，供流憩，多少庙。休说春山如笑，诗人即爱秋光，桂香飘满山中道。

烟霞洞

西湖香积厨无数，烟霞洞，美誉著。居士调羹，大师养疴，三月山中住。　　黄梅雨，看山雾，忽失楼前树。小诗曾赋，历劫迹犹存，应使碧纱笼护。

湖上秋月

秋月光最清，清光西湖多。穿六桥，绕三潭，登半岛，小舟泛万顷银波。　　问青天，歌水调，忆东坡。弄影舞婆娑，对此琼楼玉宇，邀她月里嫦娥。



平湖秋月

吴山登高

“满城风雨近重阳”，虽是一句最好的诗，但在江南却并不尽然。重阳前后，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极少风雨。

杭州西湖，三面环山。重阳要登高，本不愁没有地方可去，但是杭人还是喜欢上城隍山，也就是吴山。

城隍山在杭州城内，与西湖诸山之在城外的不同。从清河坊转入大井巷，可以上山。从藩司前入粮道山，也可以上山。

城隍山上山的石级，平坦宽阔。山既不高，走来更不费力。《儒林外史》写马纯上——马二先生，从嘉兴到杭州，就在城隍山上，遇见了匡超人，在摆拆字摊。

《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写道：

城隍山就是吴山，就在城中。马二先生走不多远，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几十层阶级，走了上去。横过来，又是几十层阶级……看见一个大庙，门前卖茶，吃了一碗。进去，见是吴相国伍公之庙。马二先生作了个揖，逐细的把匾联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没有路的一般。左边一个门，门上钉着一个匾，匾上有“片石居”三个字……

又转过两个弯，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后面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看，隐隐望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

的，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的，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

走上去，一个大庙，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庙。……又是一个弯，又是一条小街，街上酒楼面店都有，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店里贴着报单，上写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

又往上走，过这一条街，上面无房子，是极高的一个山冈。一步步走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得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水鸭子浮在水面……

再走上一箭多路，只见左边一条小径。……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钻进一个石罅，见石壁上多少名人题咏……遇了一个小石桥……又有一座石桥。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过桥去，见是个小小的祠宇，写着丁仙之祠。

《儒林外史》为安徽全椒的吴敬梓所著。吴著书时，为清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之间，迄今已有二百六七十年。他所写的杭州城隍山情形，到现在并无多少改变。只是山上没有了任何书店，而却多了一方石碑。

我在杭州时，不但重阳要上城隍山登高，就是平时也常喜欢上山走走。山上的拆字摊还是很多，其中有无现代的匡超人在坐着，就不得而知了。

抗战胜利之后，复员到杭州。已经8年没有登过城隍山了，于是再上山去走走。自大井巷上山，在山上街道之端，有人将右面的山石，磨平了一人高的一块，深深地刻了“火牛劫”三个大字，并用红朱填满，异常醒目。既无



款识，也无年月。我当时就懂得火是属丁，牛是属丑，火牛就是丁丑，丁丑就是1937年。这一年，抗战开始。冬季，杭州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下面写一个劫字，是说日人在杭州的残暴荒淫，民不聊生。这一块碑，是在沦陷期中刻的，而敌伪竟然不知。刻碑者必为有心的爱国志士，可惜未留姓名。此后我每与亲友上城隍山，必陪他们去看一看这一块代表杭州人在抗战期中的血泪的三字碑。

我最后一次上城隍山登高，是1948年9月21日上午11时，我与朱骝先（家骅）先生自粮道山上山，由大井巷下山。朱先生说：他尚系1926年上过吴山，已经22年了。我也陪他去看了“火牛劫”的石碑。

佛千先生词云：

吴山登高

城中有山，吴山乃尊。城隍赫赫威灵。祠宇多，伍公不朽，丁仙无名。更小街热闹，怪石峥嵘。　　读外史，记儒林，抄来一段文。依稀景物，思古发幽情。马纯上选文曾卖，匡超人测字难寻。

踏雪寻梅

1946年冬季，杭州雪下得很大。我家朝北的庭中，先君曾植有腊梅一株。胜利回杭，家中衣物均在战乱中失去，可谓空无所有。独此株腊梅，却更为茁壮。花放之日，香闻全院。我因幼时曾到孤山踏雪寻梅，已多年未有此机会，乃与家人作孤山之游。既曰踏雪，必须步行。最好出钱塘门，过断桥，慢慢向孤山走去。但因母亲年高，诸儿幼小，只得乘车前往。至于寻梅，则本不必费心，因孤山梅树，连年有人补植。抗战胜利之后，我也曾与杭州市市长周企虞（象贤）兄，补种了多株，其中也有腊梅。故山前山后都是梅花，远远就可以看见，也远远就可以闻得。

我们在雪地之上，梅树之下，摄了一张合家欢。我并且题了一首诗：

> 八载风霜存铁骨，一湖冰雪访仙胎。
> 天伦乐胜林和靖，奉母偕妻率子来。

来到台湾之后，我将此诗写给祝芾南（绍周）先生看。他擅写梅花，立即画了一幅墨梅见赠，并将此诗录于画幅之上。

杭州看梅花的地方，还有灵峰寺，寺有来鹤亭。要从岳坟走路到玉泉，再从玉泉走三里路，才能到达。

寺悬有联句，为：



南北高峰天外笔，
东西流水屋头琴。

灵峰的梅花都种在大殿旁的一方平地上，不若孤山之有丘陵，树乃得有高下。梅树也并不多，但绿萼红心，在琉璃世界中，益见高雅。老僧以雪水，烹龙井茶飨客。碗盖一开，则雪片与梅瓣，自空跌入，就成为天然的香雪茶。

在杭州附近的临平超山，则有唐梅与宋梅。1948年3月7日下午，我夫妇约竺藕舫（可桢）与郑晓沧（宗海）两先生，赴超山观梅。竺率其女公子竺松，我夫妇率大元

作者一家在孤山探梅

大仁两儿。晓沧先生自复员回杭州，住在白堤尽头罗苑，与平湖秋月为邻。屋虽破旧，却能挹全湖之胜。水面风来，我常往访之作长谈。我本尚约袁道冲（荣叟）先生同行，袁，浙江桐庐人。其祖父袁昶，因反对义和团，为慈禧太后所杀。袁时在上海，因已与友人约定赴苏州邓尉探梅，复我一函，谓："超山之行，期以来年。"及至来年，未得再往。故我生平，只得游超山一次。

超山距杭州50公里，车出清泰门后，先沿申杭国道行。至乔司，转入杭州至塘栖公路。过临平后，尚有9公里。车至半山亭，停于宝慈寺前。宋梅一株在寺门外，半干已枯。着花有五瓣者，亦有六瓣。相传皆为六瓣，且有七瓣者，实均不确。唐梅在寺内殿阶下，干心已空，着花不繁。我甚欣赏庭中的两株绿梅，其一花密如伞，又一则枝干曲折有致。寺门外有吴昌硕墓，内子甚称赞其选地得宜。我等再步行登妙喜寺，再登至玉喜寺，与杭州玉皇山等高。沿山有梅园，有竹林。下望则为一片平畴，而左右诸山，均不及其高，此或为"超"山得名之由来。我对同行者谓："我等现立于超山之顶，则尤为超绝矣。"是日天未降雪，但黄昏时有微雨，乃匆匆下山，登车返杭州。将到临平，路过安隐寺。寺门前有安平泉，苏子瞻曾有诗咏之。诗句刻石，置于壁中。寺门内亦有唐梅一株，较超山者为茂，此为我等事先所未知者。客堂新葺，四壁悬有画梅多幅。颇多佳作。所惜天色将晚，不能久留。返抵杭市，已下午7时矣。

1971年五六月间，台北市南海路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七友画展。在展出品中，有郑曼青（岳）君画的劫后超山宋梅图，系作于1970年。先是在1935年，郑君曾绘有超山古梅图一幅，由其师武进钱名山先生题金缕曲一阕：



世上多奇屈，有超山，报慈寺里，古梅宋植。正是花时罹大难，乱刃从头摧折。有衲子，护花尽节。谷口子真为此画，带千年香雪三年碧。与天地，不磨灭。　　名山题句犹如昔，也复似插天枝干，槎枒旁出。台海漫漫兵火下，恰被杜陵收拾。可听得篇终霹雳？今日衰翁生气尽，便题诗无复惊人笔。还君画，一悽恻。

此图在抗战期间，为一杜姓者所得，因见有名山先生题词，乃请刘毓琳君送请其再题。其时，名山先生在上海陷区，遂更为一词。忠义之气，跃然纸上：

超山宋梅天下绝，铁骨沈沈点冰雪。
一朝蚁贼窥山中，兵刃无情乱摧折。
山僧殉花有奇节，佛地千年埋碧血。
谷口郑子真，追摹出胸臆。
依然雪玉散槎枒，使我披图三叹息。
愿君一为抚吴钩，若要护花先杀贼。

此图在1949年可能失落。故郑君又于1970年，补绘一幅，并将名山先生两次所题词句，悉书于上。

佛千先生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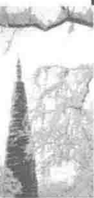
踏雪寻梅

处士坟，放鹤亭，古梅高下成林，孤山铺满银。
灵峰寺，来鹤亭，梅花绿萼红心，冷艳散幽芬。

武林掌故新记

抗战胜利之后，重返杭州，见风景不殊，湖山无恙，为之欣然。惟湖心亭于敌伪时代改建为财神庙，红墙高耸，俗不可耐。乃商杭州市佛教会改为寺宇，祀奉观音，并将围墙改漆黄色，围以绿柳。西湖本已有财神庙，在孤山之巅。游山者见财神高踞于林和靖墓之上，每觉不称。然其地稍偏，不若湖心亭之居于西子中心也。前人曾有诗谓："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广寒宫中，不见嫦娥，而由财神独据，实太煞风景。湖心亭原有一联，战乱中失去，犹记其联句为："一碧浸孤亭，看参差烟柳楼台，绕岸几人沽酒去。明漪比西子，看多少青红儿女，停桡都学捧心来。"

西湖多庙祀，其能传民族正气者，端推岳庙。庙中本已多楹联匾额之属，游客题壁者尤多。每年两次粉刷，犹不能尽去之。抗战期中，敌伪组继人员于发扬民族正气联句，未敢移动。但另新增楹联甚多，致使大门正殿，悬无隙地。胜利回杭，乃请岳庙管理委员会约请文士，加以甄别。凡敌伪人员所增者，即文字尚属可取，亦悉予卸除，盖岳帅有灵，必不愿见。原有楹联亦重行整理，凡题者为人不可取或其文字欠佳顺者，皆加淘汰。我意岳庙诸联，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为最佳，盖昔之责和议者，每谓咎在秦桧，其实桧系逢迎宋高宗之意旨，如二帝果真回朝，高宗之帝位即不能继续。而岳飞则日以迎二帝为言，自为高宗所不满矣。下句用一望字，以示收复中原之未能成为事实，乃武穆之所大痛者。



平湖秋月，系西湖十景之一，距市不远，水陆两路均达。面对全湖，背倚孤山，为游屐乐驻之地。1927年以后，有人于庭中建一三角形碑，上刻有三民主义字样，无人敢言。敌伪占杭州八年，亦未拆去。此碑与中山公园前湖中之所谓博览会纪念塔，同为湖上之二丑。盖宣扬主义，亦宜择地为之，建筑亦宜美观，方足为湖山生色。今乃恶劣如此，人人见而生厌，于宣传功效，适得其反。民国初年，平湖秋月有一卖茶女郎，明婉善解人意，毕倚虹曾赠以诗云："古木阴中系短篷，女儿十五倚春风。燕支水煮秋莲粉，欲染郎心似妾红。"曾为一时所传诵。

西湖胜迹，在抗战期中多获保存，独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全部被毁。盖敌伪时期，疑其中住持与我游击部队有关，下令搜捕，住持逃至丽水，当地流氓遂争相入盗。杭州木材，均来自上江，战时水道被封，木材昂贵。凡无人住守之建筑，木材皆被拆，屋乃随毁。劳动路（原名运司河下）孔庙楠木大殿，建于南宋，亦因此被拆，楠木改制为棺，高价出售，皆伪官与奸商勾结所为也。胜利回杭，我曾拣得某某木行等出售楠木棺等实证，请高等法院以勾结汉奸盗卖公产论罪，乃法院竟以不起诉了之，令人叹息。今孔庙之大殿，乃明伦堂之原址，盖敌伪将楠木殿拆毁后，移先师神位于堂中也。孔庙的乐器，则幸由管理员吴石琴于沦陷时设法陆续秘密移出，另行保管，未为汉奸所得。抗战胜利，吴全部呈交政府，仍置庙中。

西湖胜迹集中于北山一带，南山除雷峰塔外，白云庵实为游观最宜之处。雷峰既圮，庵又夷为平地，南山一带，益觉荒落。在辛亥起义以前，革命党人每以白云庵为集会之所，以掩饰清吏耳目。徐锡麟赴皖之前，有志于革命同人，即在庵中为之置酒饯行。据当时曾参加之吕公望先生言，徐氏尝即席致词，谓法国革命，历七十余年始告

成功；中国革命方在萌芽，如不有人先行牺牲以为提倡，焉能成事？此去决不生还，惟望同志努力，以竟其志。徐氏气概轩昂，言辞慷慨，举座为之肃然。古人谓易水高歌，当不是过。徐氏后果践其言，而浙省革命前辈，亦确能继其志。辛亥之役，陈英士先生等，时到杭州与同志商谈，亦曾屡到白云庵与会。白云庵住持同情革命，因以愿假庵屋为志士聚会之所。抗战期中，杭州沦陷，复屡掩护我游击队人员，为日人所知，下令逮捕。住持僧人不得已退避后方，我曾在丽水郊外的三岩寺遇之，谈杭州地下工作者情况，及其为日人迫害情形，我曾誉之为革命种子。

白云庵旁，原有月下老人祠，专司人间男女恋爱婚姻之事，平时膜拜顶礼者甚众。抗战期中，祠亦被毁。首义纪念馆建筑时，曾计划于馆后复建，惜未及进行。惟另有俗僧未得杭州市政府许可，即自盖一月下老人庙，屋陋而低，使人不能立足。所奉之月老像，复俗不可耐。最可恶者，竟将原有之99条签诗，全部篡改，多黄色诲淫之语，以视俞曲园氏原作，语皆出诸典籍或诗词名句者，不可以道里计。俞氏原签句，或谓只44条，另55条乃他人所续。抗战胜利后，曾有金维坚君以原签句全文见示，并录登《胜流》半月刊。我曾拟约海内名书家99人分写，用桃花笺精印，置于复建之祠中，供游客求得后，携回作为纪念。月下老人祠原有联句，以曲对曲，可谓绝唱。句云：“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因缘；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

关于纪述杭州的书籍，向以《武林掌故丛编》的内容为最丰富。丛编系杭人丁氏所辑，举凡南宋以来有关杭州的记载，咸行搜入。书共分11集，装成83册，用木版精印。前有谭钟麟俞樾袁昶三人的序文。谭序谓：“余以同



治丙寅出守杭州，值大乱甫平。欲求向时翠华巡行之处，仅得其仿佛。又11年移抚是邦，而湖上苑囿台榭，与琳宫绀宇，金碧相映者，稍稍修葺，渐复旧观。今去浙又五年矣，三竺六桥，时萦梦寐。钱塘丁松生征君博闻多识，嗜书成癖，文澜阁所藏，皆其所搜罗也。”所谓文澜所藏，盖指四库全书而言。太平天国占杭时，四库书多于兵乱中散佚。乱平，丁氏于街头巷尾，逐渐搜得，以之归还阁内。虽仍有一小部分残缺，但其劳已不可没。丁氏世居杭州头发巷，迄今言头发巷丁家，仍无人不知。俞樾（曲园）时在杭主讲诂经书院，序文中谓：“余幼时侨寓临平，即在武林城外50里而近，有唐氏莲伯子兰两昆仲修临平志，得十余帙，皆厚如巨甓，乃乱后无一字之存矣。使其犹在，得刻入丁氏此编，不亦美乎。”临平在南宋时已有名，《乾道临安志》中有记载。今属杭县，沪杭铁路所经过。浙西各县，市镇多有志，如吴兴的南浔、双林、菱

文澜阁

湖、乌镇是。临平镇虽不大，而亦有志稿，惜乎未传。袁昶，桐庐人，庚子拳变时，以反对重用拳匪被西太后所杀。浙人后在三潭印月立祠祀之。其哲嗣道冲先生（荣叟）学问极好，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中国旅行社总社任秘书，年已60，步履鲜健，每年必出游名山大川，归而写游记。袁序谓："近日阮文达、谢蕴山、章实斋诸公，论修方志，于艺文门最所注意。经史子集四部之前，必冠以旧志及关涉一方掌故之书，使载笔者述事信而有征，择言典而不陋。是编盖师其意，别开丛书家面目。"俞袁两序均作于清光绪九年，谭序作于十二年。是则斯书之刊行，距今亦已近80年了。

从编所搜的书，因非出之于一人所写，故并无系统可言。在编排上，似亦缺乏体例。或系随搜随刻，不能预定先后。如第一集中有《理安寺志》，而至第十一集，方有《灵隐寺志》。灵隐寺在历史上较理安寺为早，规制亦远较理安寺为崇闳，若系有系统编印，理应《灵隐寺志》在前，或将寺庙志汇在一编之内。全书卷帙浩繁，且所记述的杭州，自南宋到清初，历数百年之久，湖山不变，人事多更。因此在今日看来，有许多篇幅，已无参考价值。但也有一部分，尚可发人深省，或供人低徊者，乃随手摘录，并附以己见。

第一集中刊有宋周淙撰的《乾道临安志》，这是最古的杭州志书。原书系乾道五年编纂，共三卷，末附札记一卷。现在通行的，都是翻刻本，如《校经山房丛书》本，竹书堂重刊本，旧抄本，式训堂本，乾隆三十九年影写本，粤雅堂本，四库本，及本文所述的《武林掌故丛编》本。但竹书堂重刊本是根据真正的宋本刻的，前有乾隆的御题诗："南渡亡仇久论之，最初舆志始观兹。武林掌故因堪考，宋纸存刊乃更奇。官署宫城宁复昔，吴山越水镇



如斯。临安四度亲访古，当面失哉此细披”。从这首诗中，可见乾隆也并未看到真正的宋刻本。《临安志》中载杭州户口为261692，口552670。此项记载，恐有错误，盖平均每户只得两口，中国向为大家庭制，平均数决不只此。是否只计算男丁，未计算女口，故数字如此。现在杭州市的人口亦为50万人左右，惟目前杭州市的范围，较远当年的临安为小。如临平镇，当年亦属临安，今则属于杭县，而不属于杭州市区。第一集中尚有一部《南宋都城纪胜》，著者不署姓氏，但自署曰耐得翁，其书成于端平二年，皆记杭州琐事，如市井、酒肆、食店、茶坊、瓦舍众伎、园苑、舟船、闲人等。此书曾收入《四库全书》，在四库总目中有提要，注明系内府藏本，并有乾隆的御题道：“宋自南渡之后，半壁仅支；而君若臣，溺于宴安，不以恢复为念。西湖歌舞，日夕流连，岂知剩水残山，已无足恃，顾有若将终焉之志，其去燕巢危幕几何矣。而耐得翁为此编，惟盛称临安之明秀，谓民物康阜，过京师十倍；又谓中兴百年余，太平日久，视前又过十数倍，其时于安危盛衰之机，亦甚矣哉！然彼或窥见庙堂之上，不能振作，为此以逢其所欲；亦知其书必流笑于后世，故隐其名，而托于乌有之论乎？”又题诗谓：“一线南迁已甚危，徽钦北去竟忘之。正当尝胆卧薪日，欲作观山玩水时。后市前朝夸庶富，歌栖酒馆斗笙丝。咄成耐得翁传录，可似兰台两赋奇。”书中所纪，皆系南宋当时情形，可以看出南北文化交流的痕迹。如记食店，有云：“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即河南）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南食店，谓之南食川饭分茶。盖因京师人开此店，以备南人不服北食者。”杭州至今尚有羊汤裹饭，实系从河南传入。又如记茶坊，谓：“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

暑天兼卖梅花酒。绍兴间，用鼓乐吹梅花引曲，用旋杓如酒肆间。正是论角如京师量卖。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茶坊悬挂书画，我幼时尚见之。现在则若干大茶坊下，往往开有书画店，供人浏览。

杭州的西湖游船，在全世界为最美。因其大小长短，均刚适合三五人游览之用。但南宋时代的游船，则甚为巨笨，《都城纪胜》书中，记舟船谓：“行都左江右湖，河运通流，舟船最便。而西湖舟船，大小不等。有一千料，约长五十余丈，可容五百余客；五百料，约长三二十丈，可容三五十余客。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无论四时，常有游玩人赁假。舟中所须器物，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暮则迳归，不劳力，惟支费钱耳。其有贵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致耳。”用这样大的船游西湖，势必难于转动，决不能得春水如同天上坐之乐。第一集中另刻有歙县汪汝谦（字然明）的《西湖韵事》《不系园集》《随喜庵集》各一卷。汪生于明末，死于清初。不系园与随喜庵都是汪氏所造的舟名。不系园造成之日，主人曾有记谓：“自有西湖，即有画舫。武林旧事，艳传至今，其规制种种，已不少考识矣。往见包观察始创楼船，余家季元，继作洗妆台，玲珑宏敞，差足相敌。每隔堤移岸，鳞鳞如朱甍出春树间，非不与群峰台树相掩映。而往往别渚幽汀，多为双桥压水，锁之不得入。若孤山，法埠，当梅花撩月，莲唱迎风，令人怅望。”足见在汪氏的时候，西湖的船虽较南宋能容500人的大舟已为缩小，但仍不能畅达全湖。汪氏所造的不系园，仍长六丈二尺，广伍之一。汪记谓：“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橱，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外为台，台上张幔。花晨月夕，如乘彩



霞，而登碧落。”像这样的船，是否能穿越苏堤六桥，仍属疑问。舟成之后，有名沧浪道人黄汝亨者，为立约款，颇具风趣。约前有小序，谓：“友人汪然明，家不素封，习非矜艳……以舟制递更，罕兼胜具。小舠恰受，未纾容与之怀；巨舰高张，有碍幽遐之讨。乃缘心匠，指授良工。长仅十寻，横方九尺。可坐可卧，任锦缆以徐牵；以遨以游，依林屿而放泊。风流共赏，主客齐欢……敢陈约法，庶惬同心。代为函谷之封，无致虚舟之触。”约文为：“十二宜：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箫、琴、清歌、名茶、名酒、肴核不逾五簋，却驺从。”尤以末两项为最有意义。另有九忌，为：“杀生、杂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俳优作剧、鼓吹喧阗、强借、久借。”也定得很有道理。抗战胜利后，浙江行政学会曾定造了一只游艇，落成的时候，适为春尽之日，乃命名为留春艇。虽则没有像黄汝亨这样明定约法，但同人咸能自行约束，每年稍加修理，停在湖滨的码头上。随喜庵似较不系园为轻小，汪氏自己虽亦有记，却未提及舟的制造形式。记谓：“余昔构不系园，非徒湖山狎主，实为名士来宾。时当黄贞义先生休沐南屏，主盟风雅，因有九忌十二宜之约。时骚人名士，高僧名姝，啸咏骈集……方再易岁，而贞义先生溘然长往，宜忌虚榜。即一不系园，不胜今昔之感。嗣后复作楼船，董元宰宗伯颜曰随喜庵。规制叠更，台阁窈窕。来吾庵者定作随喜想，余何复备九忌之条?”大致时代愈往下移，西湖的船愈趋于轻俏。民国初年，西湖船已只有大小两种。大的仍可坐二十人，并可在舟中张设筵席，四围镶以五色玻璃，舟子用篙而不用桨。我幼时最不愿随同尊长坐大船游湖，因为关上了窗子，看不见湖光；船又走得慢，一天到不了几处。后来，西湖上的大船日少，到了抗战胜利之后重回湖上，只剩了两艘。

我们为了送一个朋友的行，却特别去雇了一只大船，在湖上荡了半天。

《武林掌故丛编》中所搜集的著作，不外三类：一类是志，如：《乾道临安志》《理安寺志》《广福庙志》《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塘栖志略》《孤山志》《西溪梵隐志》，《正续崇福寺志》《淳祐临安志》《清波小志补》《大昭庆律寺志》《元妙观志》《扬清祠志》《凤凰山圣果寺志》《金鼓洞志》《城北天后宫志》《捍海塘志》《灵隐寺志》。一类是记，如：《钱塘先贤传赞》《古杭杂记》《西湖韵事》《流香一览》《武林旧事》《西湖纪述》《杭群庠得表忠观碑记事》《吴山遗事诗》《崔府君祠录》《七述》《南宋古迹考》《云栖纪事》《孝义无碍庵录》《游明圣湖日记》《客越志略》《定香杂著》《西湖游记》《银瓶征》《龙井显应胡公墓录》《客杭日记》《湖山叙游》《北隅掌录》《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西村十记》《西湖梦寻》《韬光庵记游集》《南漳子》《东城杂记》《湖船录》《西湖月观记》《横山游记》《新门散记》《湖壖杂记》《紫阳庵集》《春草园小记》《武林新年杂记》《定乡小识》《西湖杂记》《南宋院画录》《苏祠从祀议》《西湖记游》《翠微亭题名考》《南宋馆阁录》《宋学士题名录》《月令约读书社约》《胜莲社约》《云栖放生录》。再有一类便是诗文，如：《钱塘西湖百咏》《不系园集》《随喜庵集》《重阳庵集》《西湖修禊诗》《南屏百咏》《钱塘湖山胜概诗文》《西湖卧游图题跋》《南湖倡和集》《湖墅杂诗》《金牛湖渔唱》《西湖百咏》《西湖八社诗帖》《养素园诗》《西泠仙咏》《西湖杂诗》《西湖竹枝集》《武林怡老会诗集》《鳌峰倡和诗》《武林草》《柴氏西湖百咏》《复园红板桥诗》《东郊土物诗》《江乡节物诗》《兰因集》《山游



倡和诗》《钱塘赋》《西泠仙咏》《俞楼诗记》《西溪百咏》《西湖秋柳词》。因原编并不分类，又无总目录，故查阅甚不方便。在其所搜集的这些书之中，志的部分尚有几种足供参考的价值，记的部分因时过境迁，读来已不容易与今日的杭州相印证，而诗的部分内容最差。多少年来，咏西湖的诗，已不知道有多少。但求其真能状西湖之美者，并不多觏。我最爱明朝有一位韩国使者所写的西湖诗："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图犹欠费功夫。"若一般游客到了湖上，非人写一首不可，本属多余。乃甚至百咏，一景一题，一题一诗，几全成为按名点唱性质，自更无好诗可得了。如再一人咏之不足，彼此倡和，限题限韵，勉强凑成一集，不但不能为湖山生色，抑且有污西子。丁氏收集的功夫固不可没，惟不加审辨，一律传刻，从使卷帙浩繁，读者见而却步，连本来可诵的诗句，也没有人翻读了！

民国以来，坊间虽则出版了不少的杭州指南或西湖导游一类的书，但编得好的却极少。尤其若干游客，对于我国历史的知识与文学的修养，都很缺乏。他们看到一座一座的坟，一座一座的庙，并不觉得有什么足资流连的地方，更谈不上凭吊。因此我就常想要好好地重编一册指南，要富有历史性，与文艺性，而后游者人手一册，才知道这些坟中葬的是英雄美人，庙中祀的是贤臣文士，于以引起了崇拜之心，与思慕之感。

拱宸桥

拱宸桥当系以在城北而得名，桥本身系石制，为高拱形。其地原为大运河杭州城外之终点。所有内河小轮，皆集于此，可通嘉兴、湖州、苏州、上海及沿线乡镇。民殷物阜，桑麻遍野，素为蚕丝出产之区。桥旁有张大仙庙，香火素盛。

中日马关条约，辟杭州为商埠，以拱宸桥为日本通商场。日人设有邮局，及内河轮船。浙路公司另建江墅支线，以利钱塘江与大运河两者间客货运之联络，长不足10英里，于清光绪 三十三年农历七月十五日通车。每天午前八时与午后二时，各往来两次。所定票价分三等，头等每人大洋一元二角。以当时之物价言，可谓极昂，可能系不希望有过多的人到拱宸桥去。

在拱宸桥之日本商埠，除纵横几条马路，及若干幢上海式弄堂房屋外，迄无任何建设。因一般老百姓，多不愿与日本人交易，故市面萧条，居户寥落。

杭州既辟为商埠，英日两国，乃在杭设立领事馆。英领馆设于拱宸桥，日领馆反设于西湖宝石山下一小丘陵之上，地名石塔儿头。所谓石塔，可能系指保俶塔而言。虽其地势并不甚高，但日领馆之位置，仍为鸟瞰西湖全湖之好地点。事实上，所谓领事馆，乃系日本驻杭之特务机关。经常在幕后参与我国军阀内乱，纵横其间，使我政治社会，不获安宁。至其包庇滋事日人，横生枝节，处处与我地方政府为难，更属常见之事。举一例言，日人以拱宸桥商埠商业不振，乃自清光绪三十二年起，

在城内闹市羊坝头一带，开设西药房，渐增至五家。杭州商会以按条约规定，外人不得在内地杂居，亦不得在商埠以外经商，禀请农工商部阻止，无效。宣统二年，日商欺凌我老百姓，逼成聚众捣毁日人西药房事件。日方谓日人有被殴伤者，药房暂时停业，并由日本驻杭州领事池部，向浙抚增韫抗议。增告以杭州绅商学各界，激于公愤，团体坚固。药房如再复开，又酿祸端，不能负责保护。后由浙江交涉使王丰镐，与日领事再三磋议，日方始同意将日人所开设之丸三、仁信堂、近仁堂、重松及信浓等五药房存货，由中国照价收卖。日人全部迁出，房屋交还原主。

王丰镐，字省三。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学生，以反对教会教育，离校自行创办光华大学。王首先将其在上海大西路之私地若干亩，捐作创校校址。晚年，卜居杭州粮道山，为自藩司前登吴山必经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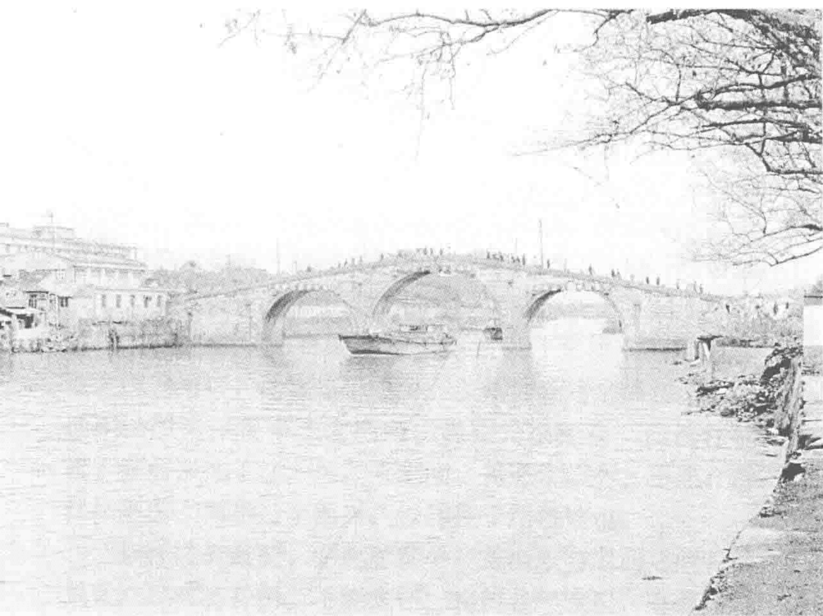
抗战以前，我曾数至拱宸桥。“五四”以后，参加游行示威，至英国领事馆。或乘内河小轮赴吴兴或上海，须至拱宸桥登舟。又在桥之左岸，有高氏花园，为当地名胜，尝往游览。我等亦常游行至石塔儿头日本领事馆门前示威，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日领馆人员，必将铁门紧闭。我等可于门外窥见有日警二三人，持枪守卫。游行学生皆系徒手，且无轨外行动，日警自不能开枪，故从未有流血事件。至平时我等游湖，必绕道不经过石塔儿头，盖不愿见日领事馆之大铁门，与其所悬之太阳旗也。

抗战期间，日人占杭州八年，未增添任何新建筑。且反因战时缺乏木料五金，将杭州旧家华屋，拆毁不少。有若干大宅，杭人称之为“墙门房子”者，四周围墙均尚壁立，但墙内房屋，均已拆成平地。且大街小巷，到处均垃

圾成堆，粪便盈地。英士街我家门口，垃圾横亘路中，高与楼齐。我政府乃命业已缴械投降之日军搬运，历数月方始打扫清除完竣。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浙江省内之日侨，有千余人，奉令由民政厅接管。我乃在拱宸桥设日侨管理所，集中居住，听候遣送。并聘曾在日本留学之徐子梁（浩）兄任所长，负责主持。1946年初春，我曾冒了寒风细雨，到所中视察，并约见在沦陷期中占用英士街我家房屋开设旭日酒家之松尾政太郎夫妇。松尾，大坂人，时已近70岁。我问其我家中家具书籍衣物所在，松尾答谓战争发生后两年，方到杭州，入屋时，只见有两位中国人住于门房中，其余空无所有。当系日军初入杭时，即已加洗劫云。

至石塔儿头之日本领事馆，则由杭州市政府接管，改



拱宸桥



为外宾招待所。所谓外宾，系指来自杭州以外地方者，并非专指外国人而言。庭中原植有樱花十数株，仍予保留。我每至外宾招待所，一入其大铁门，即忆及学生时代游行示威时在门前愤怒痛恨之往事。及立于庭前草地，眺望全湖，内心更不胜其痛快。

拱宸桥亦为我国秘密集社青帮的发源地。青帮源出于无为教，系罗清所创。罗为山东即墨人，生于明英宗正统七年。清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杭州北新关外拱宸桥，原为粮船停泊之所。康熙年间，有密云人钱翁二姓，及松江人潘姓，崇奉罗教，创立钱庵、翁庵、潘庵。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逐皈依罗教，渐成为秘密集社，名为青帮。

自元季起，杭州即有钱塘八景之说。而北关夜市，为其一焉。所谓北关，即系指武林门，经湖墅而达拱宸桥的一条长街，长十余华里。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四月，浙路公司在上海举行第二次股东会，即曾决议建筑自西湖至拱宸桥的马路，但迄未实现。直至1927年，杭州市政府成立后，方始建成。浙省公路局，并将全省公路总站，设于武林门，行旅乃益感便利。

钱江义渡

杭州南临钱塘江，自望江门出城，称为江干。最繁盛之街道，为南星桥。沪杭铁路设有车站，为浙东与浙西之货运中心。再上则为闸口，此为铁路终点，乃机车集中之地，亦为车辆调度之所在。

在南星桥车站之前方，有钱江第一码头，此为钱江轮渡渡船起讫之地。在昔铁路未通，浙西与浙东间之货物，胥赖水运。其由江山、衢县、兰溪、金华、建德而来者，则沿江下驶，以达杭州。并兼上溯至皖南新安江流域各地。自从清末战事以后，皖南商业势力，深入两浙。凡木材、茶叶及文房四宝，胥由徽帮经营，自皖南运来。两浙各县，皆有新安会馆。建筑华美，规模宽宏，斯即为徽帮经济力量之表现。杭州江干木行特多，沿江排列，一望无际，经营者多为徽商。

其由浙东宁绍两府所属各县，运杭货品，则必须渡越钱塘江，而以南星桥为集散地。商旅来往，亦必须乘舟渡江。1937年10月，钱江大桥通车，虽有两层，但一层行驶火车，一层行驶汽车，至徒步者或乘其他交通工具（如轿子）者，仍必须藉舟楫渡江。再则钱江大桥在西岸之起点，已近闸口，而在东岸之终点，则为新建之静江站。其地距一般商旅集中地之西兴，尚有一段距离。而钱江轮渡，则向来往于江干与西兴之间。盖通常旅客，不愿在静江站下车，再步行至西兴，以转往宁绍各地也。

钱江之有渡船，必起源甚早。盖浙东与浙西之间，横亘大江。非有舟楫，不能来往。相传昔年渡船，有官渡与



民渡，皆用人力行舟，搭乘者必须纳费。平民有时缺少川资，不能照纳，则行至中流，舟人即将其推入大江，随波东去。清季叶，有杭人胡雪岩（光墉）者，在渡江时，目睹舟子将无力付渡资者抛于水中，大为不忍。乃自誓谓他年苟能致富，必于钱江中自设义渡，免收任何费用，以利行旅。及左宗棠奉命收复浙江，胡任军需，果然大富。乃斥资办理钱江义渡，以了其昔年心愿。两浙人民，莫不乐道其事。胡氏之义渡办成，则原来收费之官渡与民渡，皆无人问津，遂被淘汰。

乃胡雪岩后以经商失败，竟致破产，自无力再行维持钱江义渡所需之费用。遂由地方士绅，集资接办。商旅来往，已养成不纳费之习惯，故仍只得免费。我幼时在江干见义渡船只，停满码头之旁，有专载人者，有专载货者，有专载轿子者。江上来往，不绝如梭。民国以后，改用小轮，速度更增，与南京下关至浦口间，及武昌至汉口间之轮渡，堪以比美。惟前两者系行于长江南北两岸之间，且须收费。此则系行于钱塘江东西两岸之间，且向不收费耳。

1937年12月，日军占杭州。钱江大桥于我军撤退时，自行爆破数孔，以阻日军前进。而日军占杭州后，封锁江面，于是我军与日军，隔江相峙者数年。其后日军渡江占西兴以至绍兴，但江面上除日军军船来往外，民渡迄未正式恢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江省政府特设钱塘江义渡复兴委员会，鼓励民间筹款经营，我亦为委员之一，而以杭州市商会会长金润泉（百顺）主持其事。金原籍萧山，久住杭州。初议向旅沪之宁绍同乡募款，久而无成。嗣乃呈准浙省府，由宁绍各公共汽车公司，照票价及运价代收一成，以为购买小轮修建码头及平时义渡费用。浙省公路

除干线外，多由民营。在代收款未征起以前，先由银行贷款。俾复兴工程，得以先行进行，义渡亦得以照常维持。

1948年5月4日下午4时，我至杭州市商会，出席钱塘江义渡复兴委员会会议。金润泉报告谓："工程尚缺一半。宁绍各汽车公司在客票下，代加一成。除鄞东公司毛懋卿，拒不照办外，其余各商车公司，已在客票及运费下代加，款亦已照缴。惟本年2月，省府为筹军用经费，而以交通复员费名之，在全省各公路票价下，带征一成。财政厅乃以客票下不能于一成以外，再加一成为理由，而于2月15日起，将原已收有相当成数之义渡复兴费取消。"我谓财厅此举，事先并未提出省府会议，故未及知。我闻人言，此事系公路方面主动。因义渡会当初要求之本年度经费，为30余亿。如以一成附加，则本年所收，不止此数。不如由省统筹，使义渡会不能直接收费，而宁愿于交通复员费内拨付之。但交通复员费，既作为库收，需先解财厅，因以公路局，亦迄未领到也。

我当时在会议席上建议：

一、在公路客票及运费下加成带征或代收，原均为法所不许。既可加收10%之交通复员费，又何必定要取消另一10%之钱江义渡复兴费。加10%，与加20%，其不合等也。况交通复员费，为全省各公路统收，时间并无限制。而钱江义渡复兴费，只限于宁绍公路，且于筹足工程必需款项后，即行停止。

二、如不许钱江义渡会续收，则当于收到交通复员费后，尽先拨补，以便工程进行。公路局以义渡会原送预算，只需30余亿。其实此须随物价上涨，义渡会自当随时有再请追加之必要。

三、如交通复员费项下不能迅拨，则当由省库另拨工款。



总之，省府既不先征求义渡会同意，而取消代征收入，自有补足其经费来源之义务。

与会同人皆以我言为然，遂推金润泉，再将经过情形，及我所提三项意见，与财、建两厅接洽。目前先行向银行借款，以维持业已在进行中之工程，并维持义渡。

犹忆胜利复员，凯归杭州。我全家自衢县乘舟，沿江下驶。某日到达桐庐，业已黄昏。本思在桐君山下，停泊一晚。因闻杭市各界，将于次晨集合一万余人，在南星桥钱江第一码头欢迎。乃连夜兼程放舟至杭，于午夜抵达码头。八载重归，欢欣可想。码头灯火齐明，已遍悬欢迎旗帜，以备次晨之用。我与家人登岸雇车，入凤山门，经鼓楼与清河坊大街，返抵英士街故宅。随即以电话通知各报馆，发布新闻，谓我已到杭，请各界勿再于次晨劳驾。并对各界盛意，至表感谢。

自胜利以迄，我曾数度来往浙东浙西之间，亦曾数度搭乘钱江义渡轮船。江上清风，至今似尚在双袖间也。

钱江大桥

浙江省向有浙东浙西之分，而以钱塘江为界。但是有若干县份，是跨越钱江两岸。所以东西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在清代，浙江分为十一府，通常以杭嘉湖三府列为浙西，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八府列为浙东。民国以后，府制废除。但是旧府属的观念，仍然存在。在旧省议会时期，金、衢、严、处的四府同乡会，设在杭州周公井，俨然是代表浙东的力量，以与浙西的省议员抗衡。至于宁、绍、温、台，虽则更在浙江之东，但与金、衢、严、处，却并不成为一体。

民国初年的省议会，就曾有建筑钱江大桥的决议案。终因军阀内乱，及建筑费用无着，迄未着手实施。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张静江（人杰）氏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原籍是吴兴县，属于浙西。但是他认为要消除浙东浙西多年的界限，只有建设直贯浙江的铁路。于是他决心不借外国款项，不用外国工程师，而完全以浙省自己的力量建筑。自省会杭州，经过绍兴、金华、衢县，而达浙闽接壤的江山，名为杭江铁路。但因大江阻隔，铁路不能过江。来往旅客，仍须搭乘轮渡。而事实上的首站，遂设在钱江对岸的西兴附近乡野。浙人因为纪念张氏建路的功绩，乃以其地车站，名为静江站。杭江铁路后来延长至江西南昌，再由南昌接通到湖南的株州，而与粤汉铁路相连接，并改名为浙赣铁路。

杭江铁路通车之时，张氏已交卸离浙。但浙人总觉得应该在钱塘江上建一大桥，使火车可以过江，而后浙东浙



西，才能真正打成一片。遂于1937年9月27日，建成通车。桥分两层，分别行驶火车与汽车，共用去建筑费法币500万元。款项来源，系向银行所组成之财团贷借。财团中，包括省方接洽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及四明银行，与铁道部方面接洽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本定于是年双十节，举行开桥典礼，但因8月13日，日寇已侵占上海，东南发生大 战，乃先行启用，典礼亦未再举行。又原拟车辆过桥，概须收费。预期12年可将建桥贷款，本利偿清。亦因战事军用车辆太多，未曾实行。

我于1937年10月10日，奉浙江省政府电召，自金华循公路到杭州。是为我第一次经过钱江大桥。不数日，仍过桥回金华。嗣因敌人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失利，杭州危急。军方要将钱江大桥，完全破坏，以免为敌军利用渡江。并派工兵团团长杨鲁源（澍松），持命令到杭执行。令文上有“即刻到杭，即刻炸毁，即刻返京复命”字样。时朱骝先（家骅）先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力持不可。朱谓：“建桥不易，抗战终必胜利，我方亦必须复员。大桥完成尚不足三个月，如彻底炸毁，此后将无力修复。只须炸毁桥墩一二座，使敌方无法利用通车，即已达到阻止敌人前进之目的。并可先将预定安置的36根炸药线放好，人可先行过桥到对岸。看到敌人上桥，再炸也来得及。并愿为之担负延迟执行命令的责任。”几经往返磋商，军方始同意炸毁大桥中间桥墩二座。因大桥的延期炸毁，使无数的人民、物资、车辆，得以安全通过，撤到后方，为国家保全了很多的元气，为抗战增加了极大的潜力。

大桥于1937年12月22 日，实行爆破。是晚我在金华，与浙江省政府同仁，在八婺女中，等候消息。杨鲁源从前方打电话来报告，谓已完成工作，举室为之黯然。是夜天气特寒，北风怒吼。室中置一火盆，了无暖意。后两日，

杭州即陷于敌手。

敌人进入杭州后，屡图修复大桥。但以原建图样，已为我方携走，无法设计施工。敌方后在工程杂志钱江大桥专号上，见到图样，以为可用。经细加研究，才知道只系初稿，且甚简单，与最后的大桥样式不同，仍无多大用处。直至1941年1月，敌军用船舶渡江，占领萧山绍兴之后，才利用桥的上层，修通了军用汽车道。遇有桥梁歪倒之处，即依其势而作坡形的道路。1944年1月，又才修通大桥下层的火车道。因桥身甚重，不易将桥梁举起，置于桥墩之上。乃将上层公路拆去5孔，始勉强将桥梁放平。但尚有两个桥孔，高低不平。敌人始终查不出原因，只能在铁路轨道下面，设法垫平。因此行车速度甚慢，且不能过分载重，但这种不平的原因，我是知道的。因为浙江省政府据报，敌人修桥，乃命令敌后的游击队，潜入江中，用鱼雷再炸毁了一座桥墩的桥柱。

抗战胜利之后，大桥未复，铁路未通，我自钱塘江水路复员回杭。1945年10月16日晚，首先看到桥旁的六和塔，次看到钱江大桥。同行的家人与友好，皆振臂欢呼。但大桥直至1947年2月29日，始得勉强复行通车，亦未举行仪式。可见修复之难，与朱氏当时决策的正确。如果真的彻底破坏，真是不知何年方得恢复。在复行通车之初，系将上层公路被拆的5孔，先用木板铺成单行道，只限于机动车辆，可以过桥。小轿车每过桥一次，收费5000元，客车1万元，货车2万元。这是当时货币业已贬值之故，并非收费特昂。至于铁路，则较此尚更后一年，始得通车。

梦归杭州

自从离开杭州，20余年来，常有思乡之梦。但是梦中情景，多属片断不连，且醒来亦即忘却，不复能忆。

1969年9月9日凌晨，梦归杭州。不但情景逼真，并且极有系统。醒来尚历历在目，不可不记。

我梦中所见，系奉父母，偕妻子，抱孙儿，四代同返。乘游览车入城，沿市河行驶至丰乐桥边。因正在拓宽马路，两旁市房均向后拆除。桥亦因正由拱形石桥，改建为平面水泥桥，暂不能行车。于是全家下车，步行过桥，并继续前行，直到官巷口。

全家由官巷口越过青年路，即见有一高楼，位于青年路迎紫路转角。我在梦中知道，此为杭州商务印书馆。该馆原只系两层楼建筑，而此次在梦中所见者，似有四五层高。其正门原面对迎紫路，我全家因已转入青年路，故未见到正门，只见到其沿青年路之一部分，系巨石高墙，未开有任何门窗。我在梦中，颇以为怪。因我全家急须回至青年里老家，故首先注意商务印书馆后面之房屋，见沿马路之泥墙，已改为红色砖墙。及抵家门，我手中抱长孙念中，并自袋中取出钥匙，打开大门。大门仍系木制，黑色双扇。我首先入门，并对念中言："汝现系我家下一代惟一孙儿，此屋收回，日后即属汝有。"于是父、母、妻、子、女等，亦皆进入宅内。但见原有房屋，均已变更，现系改为工厂。有许多女工，正在工作。见我等入内，并不以为意。我等亦即随意站立，观其工作，乃忽然惊醒。

先君逝世已40多年，先母亦已在大陆病故。妻、子、女、孙，皆在台湾。而梦中团聚，一若父母生前。青年里住屋，系先君于民国初年所建。我则于1915年，方由江苏兴化到杭州入小学，住第二进的楼上西面一间。立于走廊上，可以看吴山全景。而从窗中，则可以眺见西湖一角。先君曾将面临青年路之空地，建平房店面出租，其中有木器店与裁缝店等。

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原设于清河坊，此为杭州之商业中心。先君为该馆常客，每有新书出版，必亲自往购。及新市场开辟，该馆亦在平海路购有基地一方，当吴山路转角，面积为3亩4分，地形方整。但因其地并非商业地带，久思另觅一地，乃与先君商量，以该地与我家青年里屋地交换，并再津贴大洋1.4万元。于是商务印书馆乃在面迎紫路之我家屋后原空地上，建立新馆，门面四大间。我家亦在平海路新建住屋，于1925年秋，方行建成。先君毕生勤劳，而在此屋中，亦只住两年，即告逝世。我此次梦中全家所归去者，仍系早已让售于商务印书馆之青年里老宅，并非平海路之新宅。可见幼时生活所在，印象最深，是以能在梦中复现也。最奇者，我何以有大门钥匙？且昔日大门，有门房守候，亦从未有在门上安置锁钥者。

沿市河一带，亦为我儿时入学常经之地。我11岁入高等小学，即每日须过荐桥或柴垜桥。14岁入中学，则每日须由官巷口过丰乐桥，经大方伯而到省立一中。其后改入一师旁听，则沿市河向北，历油局桥、盐桥而至梅登高桥。其时，我家中有自用人力车两辆，长期雇有车夫两名。但先君不许我乘车赴校，无论晴雨、风雪，必须步行来回。因此我对街巷桥梁，均极为熟悉。

自杭州市政府于1927年成立，杭州市扩建马路甚多。



自官巷口至大方伯，早已改建为柏油马路，并改名为新民路。丰乐桥亦早已改为平桥。我幼时，官巷口每年必有火灾，商店于火后重建，必须自动退后三尺，此为地方之不成文法。因此拓宽道路时，从未发生困难也。

佛千先生词云：

尾　声

诗人说尽杭州好，重忆少年游。遍历环山名刹，尽经曲苑芳洲，处处总淹留。　当时初结凤鸾俦，双影喜临流。结发青春恩爱，齐眉白首绸缪，岁岁祝千秋。



编 后

杭州这个地方，宛若一个情人，离开了便会想她。这想念如酒，愈久愈陈愈浓烈。这是情感的真实，乐天、东坡如是，阮毅成先生也不能例外。离开杭州以后的阮先生因言必及杭州，得了个“三句不离本杭”的雅号，先生不以为谑，索性就把他的一个集子题名为“三句不离本杭”。也的确“不离本杭”，字字句句皆在西子湖畔萦绕，让那些有家归不得的游子动情，也让我们这些日日厮守西湖的幸运儿动容。

本书忆及的年份大致为1912年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书中涉猎社会、经济、文化、民俗诸方面，对于关注或研究杭州近代史的学者来说，亦不失为一份难得的资料。

关于此书的出版，阮大方先生的前言作了交代，这里只就几个具体细节作几点说明：1.纪年一概用公元，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2.地名，由于历史的原因，杭州的有些地名发生变化，如梅东高桥——梅登高桥，三郎庙——三廊庙……等，皆用现在规范的地名；3.原版《三句不离本“杭”》出版后，阮先生挚友、诗词学家张佛千先生为之题词达50首之多。此次一并付梓，以成珠璧之美；4.本版在原版的基础上，作了较多调整，并配置了部分图画与照片，征得阮先生后人同意，以“杭州版”推出，想会更受读者的欢迎。

此书付梓之时，我们要特别感激俞剑明先生，他是荐举此书的“伯乐”，又不辞酷暑百忙中为本书作序。小溪也好，大江也好，当我们取一瓢饮时，亦当记得俞先生的见解。